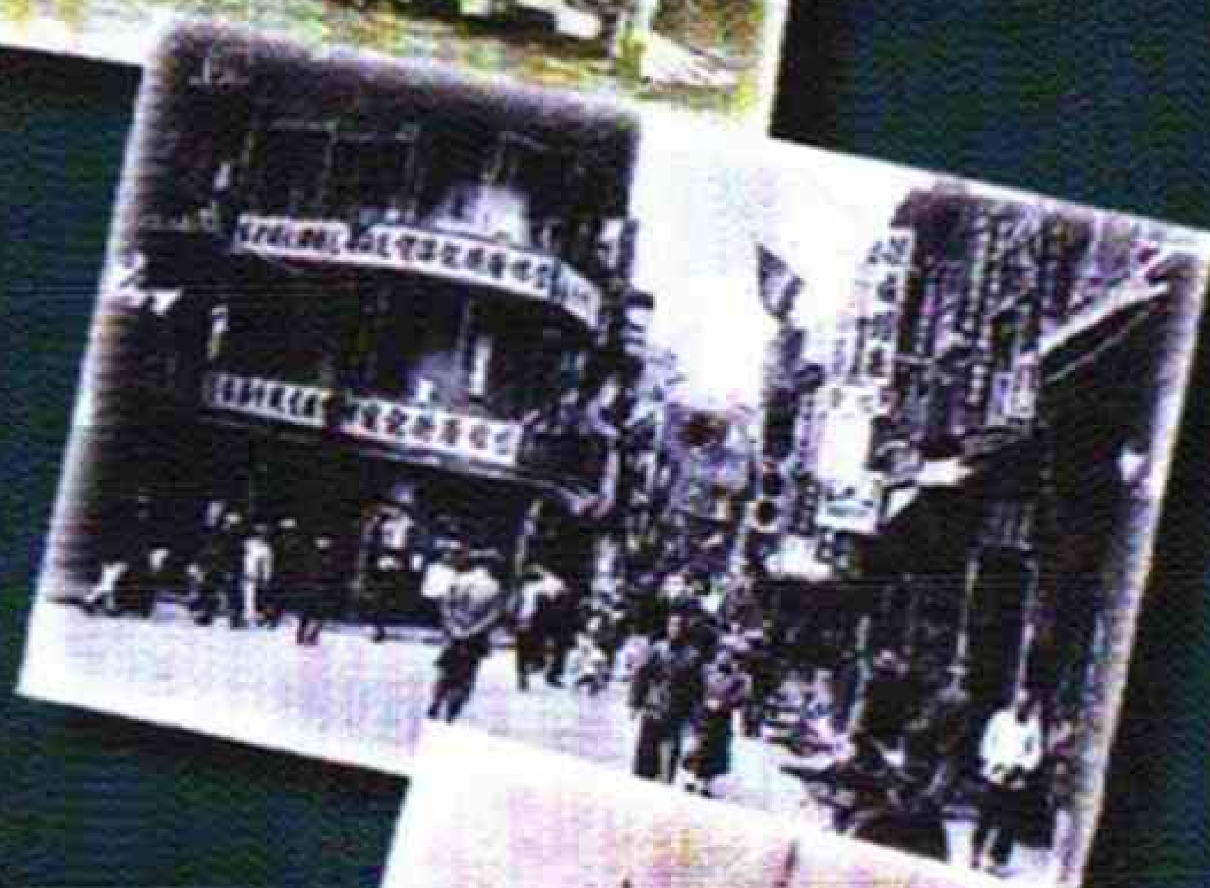


香港華商史







張曉輝

明報

香港華商史

張曉輝

總　序

大唐帝李世民曾說過：「以古爲鑑，可知興替」。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一書內更指出：「歷史是國家和人類的傳記」，可見歷史眞是人類社會惟茲惟大的頭等大事。

香港開埠迄今已有一百多年，竟然沒有一部完整的歷史！已故英國首相丘吉爾已有明訓：「回顧得越遠，可能前瞻得越遠」，但香港政府袞袞諸公卻當耳邊風，有人歸根於殖民地政府的怕挖瘡疤的諱疾心理情意結上，也不無道理。香港學界或文化界，研究香港歷史的大不乏人，但在資金匱乏的情況下，只有做各自爲政的個體户，力量有限，其成績如何可想而知。

八十年代末期，本人曾策劃了一套《古今香港系列》叢書，敦請已逝世的梁濤先生（筆名魯金）主編，還成立了由大學歷史學者及文化圈的「香港史」愛好者組成的編委會，陸續出了一批包括歷史掌古及風物誌的單行本。時至二十世紀末的九七年的今天，香港這塊「借來的時間和借來的地方」將回歸中國，

對過去的歷史進行有系統整理更成爲迫切的課題。鑑於此，本社特推出這套《香港歷史文化小百科》系列。

本系列所涵蓋歷史文化題材較廣泛，內容也力求豐富多彩。從地域史到街道史，從社會史到文化史，從行業史到方物誌……，均爲其收編範疇。

古人說：「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大戴禮記》），古羅馬人也說：「研究歷史是醫治心靈疾病的良藥。」這也是我們編這套書的旨趣。我們冀望爲已逝的時代留下一點史迹，誌記的那怕是香港人過去零碎的步履，大如社會的榮與辱、小如一個歡笑和一抹淚痕……，在在令人眷念，無他，作爲我們生於斯、長於斯的地方，縱使是街上的每一寸道路、每一方石頭，都包含着我們的一爿歷史，意味深長。

潘耀明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

目錄

一、香港華商的最初來源

從早期香港華商主體的來源考察，其主要源自華南沿海。開埠以前，港島只有幾千居民，大多以捕魚、採石及農耕爲業，大致分布於赤柱、筲箕灣、黃泥涌等地，而赤柱是人口最多的地方。據最早參與佔領港島的英國官員所描述；赤柱村是主島最大及最重要的村落，共有居屋和商舖一百八十間，這表明原居民中已經有人在從事商業。

英國佔領香港不久，即宣布香港爲自由港，加以擁有優越的地理位置，故能吸引商船和商人前來貿易。一八四一年二月，一批英商和傳敎士從澳門來港，接着開始建設宿舍、



1842 年，香港徽章以貿易為主題。（明報資料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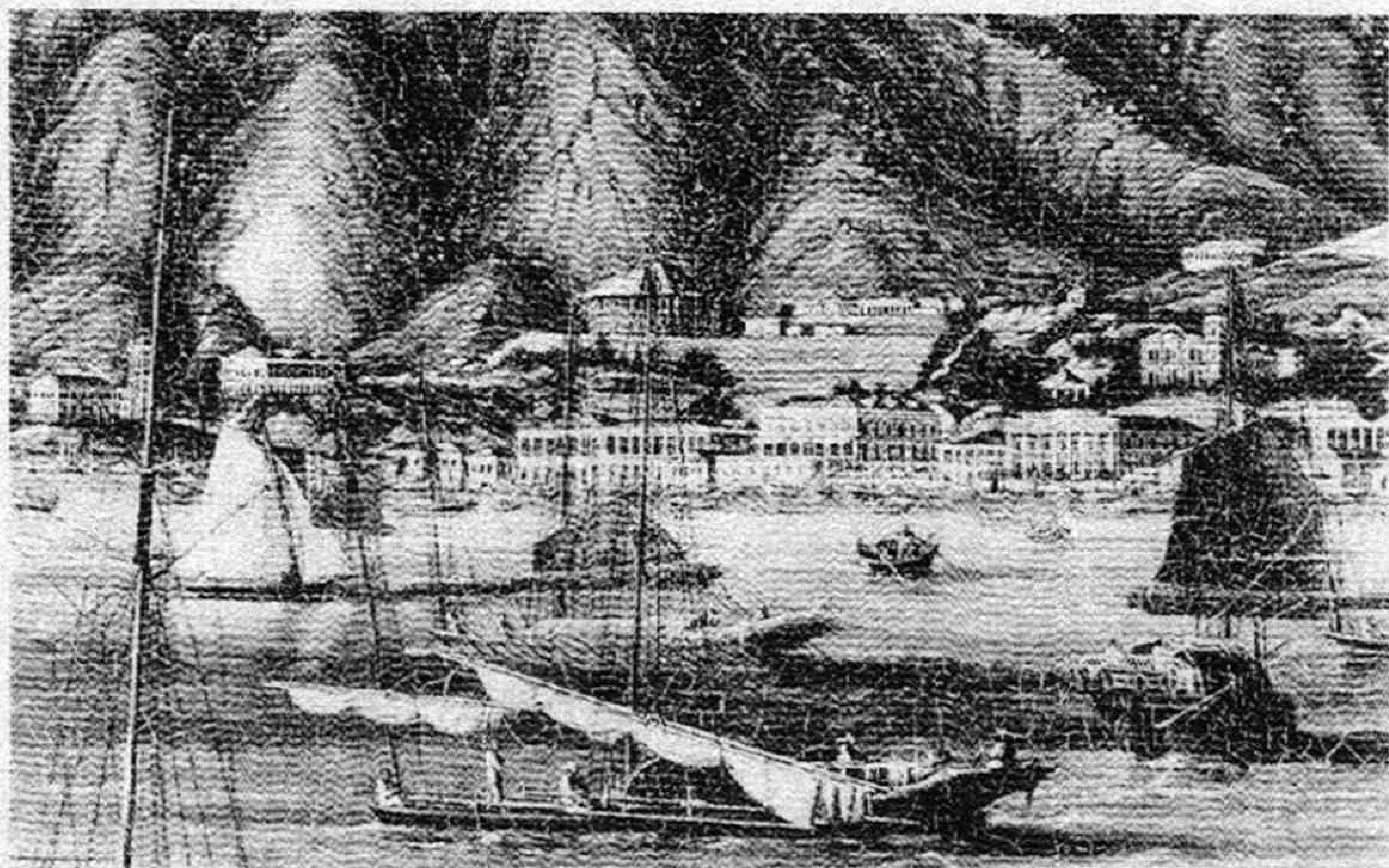
倉庫、露天商店等。隨後香港以外的地區也有很多中國工人到港，於是供給工人們衣食住行的商人也遷到島上。香港頓時變成一個新興的城市，外國人建了域多利亞城，中國人則建了稱爲「廣東慈善市」的市場，並以此市場爲中心形成了一個單獨的區域。

當時，廣州許多行商頻繁往來於省港之間，用木帆船將蔬菜、肉禽等生活必需品以及各種建築材料運上港島；不少華人小商販也從地理位置接近的廣東東莞、歸善（惠州）、新安等鄰縣遷港謀生，經營很興旺。這也是當時島上唯一的鮮蔬菜市場，華洋居民每日所需的副食品亦全賴這個市場供應。但剛開始並不順利，不久發生了一場大火災，廣東慈善市的大部分化爲灰燼，直到一八四二年五月才又重新修建。

四十年代中期，隨着城市建設的初具規模，香港經濟也逐漸運轉起來。市場零售商業一般都由華人經營，並有一定拓展。港島中環、上環及太平山街市成爲華商的營業中心，不斷有小店鋪開張。據當時有家報紙的調查，僅域多利亞城地區即有水果店、魚舖、米舖、飯館、藥舖、木器店、縫衣店、當押舖等共四十五家。這些店鋪大都是小本經營，以當地居民爲主要銷售對象，按中國傳統方式經營日常生活用品，本小利微，地位低下，其商業性質屬於前資本主義範疇。

至於中國內地的富戶，因香港治安狀況惡劣，前景不

明，一時裹腳不前。據英國人享利・西爾（Henry Sirr，一八四四——一八四八年間曾在香港）記載，初時香港人命、財產毫無保障，搶劫案竟在光天化日下發生。爲了吸引人們，港英當局在廣州遍貼街招，募人往港定居，有不少人因此而前往。如海陽縣（今潮州）人陳開泰於一八四五年到港，後搭草棚開涼茶店，幾年後同族人合資創辦富珍齋餅食店，專門代銷潮汕各類優質餅食，除在港銷售外，還轉銷南洋各地，生意興隆，成爲香港餅食業的元尊，楓溪歷來是潮州的陶瓷業中心，瓷工吳潮川在香港開埠後前往創設利豐亨行，專銷潮瓷，並以該行爲基地，將潮瓷轉銷往海外。他所開創的陶瓷業以後成爲潮商在香港的主要行業之一。吳氏家



十九世紀中葉香港的海灣。（明報資料室）

族在東南亞一帶遍設分店，竟成爲南洋巨富。

買辦也是香港早期新興的社會勢力之一。他們受僱於洋商，中介華洋貿易，在外國人在華經營的所有事業中，起了必不可少的特殊作用。早期香港買辦的來源比較複雜，主要由舊有公行人員，同洋商有長期業務往來的商人，素以洋行爲服務對象的通事，船民及鴉片商等充任。買辦大多原本活躍於澳門及珠江三角洲地帶，富有與洋行作交易的經驗。他們到了香港後，彼此互通聲氣，關係密切，並結成買辦世家和具有濃厚地域特色的排他性集團。

買辦比普通的華裔擁有更高的地位，他們托庇於洋商，利用中介人的有利地位，很快便積聚了巨額財富，成爲香港華人社會中擁有資金最多的一個階層。如英船買辦盧亞貴僅用十年時間，其名下的屋宇和店舖已遍百間，成爲早期香港華人首富。

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中期，買辦已是香港貿易經濟的重要支柱，也是當地進出口貿易中最活躍的因素。並且，隨着洋商的增加，買辦的人數亦不斷膨脹，作爲香港商業社會的特殊階層之一，買辦隊伍從四十至六十年代成長起來了。其中有些人投資自立行號，開始兼有商人的身分，這在六七十年代，已經是比較常見的現象。香港城市建設啓動後，投資地產可獲厚利，又富有投機性，引起了買辦們的興趣，他們很早即投入此項經營，甚至是香港房地產的主要經營者，名

聲較著者有盧亞貴、韋亞光（有利銀行買辦）、郭甘章、馮明珊（殼公司買辦），莫仕揚（太古洋行買辦）、何東、馮華川（中華匯理銀行買辦）等人。

太平天國運動時，華南局勢動盪，許多人口逃港避難，香港人口呈直線上升之狀。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英國割佔九龍、港埠得以擴展，早在清朝道光年間，九龍半島上的經濟已有了明顯發展。在道光二年（一八二二年）立於九龍侯王廟內的《重修侯王廟碑記》中，詳細列出捐贈者的姓名，其中店鋪名稱至少有一百個，表明那時當地的商業已經比較興盛，九龍劃入香港版圖後，使港商的隊伍更加擴大了。

港九歸併後，極有利於貿易和航運，是以吸引了更多的華人前來尋找機會。以一八五八年爲例，港島有居民七萬五千餘人，華人開辦的店鋪達二千餘家。這些店鋪包括雜貨鋪二百八十七家，洋貨店四十九家，行商三十五家，買辦三十家，錢幣兌換商十七家，米商五十一家，造船工棚五十三家，印刷所十二家，金屬匠鋪一百一十六家，木匠九十二家等，可見其旺盛之一斑。

與最初華商中資本雄厚者欠缺相比而言，這時的移民有許多是舉家遷徙的，特別是內地行商，富戶到港後，旋即買地開店及經商牟利，香港得到大量人力和財力的輸入，出現了開埠後發展的首個高潮。

此外，還有一個給了香港經濟很大推動的重要因素。十

九世紀中葉，因美國、澳洲發現金礦，內地經由香港出國的人數激增，每年多達數萬人，有力地刺激了華人社會的繁榮。香港逐漸成爲大陸居民移居海外的主要轉運站，當地商務益見興旺。因佔地利之便，廣州附近的大商行紛紛赴港設棧經營，拓展商業。如百年老舖何鳳池號於六十年代初即創設港棧，從事精刻華洋招牌匾額，承接油漆等業務。廣州朱廣蘭號是以經營熟烟出口爲主的大企業，約於七十年代創立香港分號，從早期報紙廣告可知，廣州、佛山一帶的藥行老字號很早即赴香港推廣業務，如天寶堂、德案堂、太和堂、杏園春、潘人和藥酒號、王老吉涼茶莊店、何熙明愼德堂、潘安裕堂、廣芝館、橘香齋、瑞昌號老酒莊、黃愼堂等等。



十九世紀末的德己笠街是小販聚集之地。（明報資料室）

因此，香港開埠之初，從內地赴港的商販、店主、買辦及富戶等，構成了港商的主體來源，由於他們的苦心經營，使早期香港經濟面貌得到改觀。十九世紀五六十年代，是香港發展進程的轉折點，華商的初興，打破了香港歷來以漁農爲主的經濟格局，改變了原有的社會結構。

二、轉口行商的興隆

近代香港是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轉運站，也是海外華僑與中國聯繫的橋樑。第二次鴉片戰爭後，中國沿海和長江的許多口岸對外開放，爲香港貿易開闢了廣闊的市場。一八六九年，溝通地中海和印渡洋的蘇伊士運河開通，橫越美國的中央太平洋鐵路建成。一八七一年，歐洲的有線電報也直通香港，國際商業，交通發生了巨大變革，在此情況下，處於優越地理位置的香港成爲東西方航路要衝，與世界各地的關係更加密切了，並進一步確立了它的中轉貿易港地位。早期華商運用傳統的經營方法，把遠洋貿易和中國沿海貿易連接起來，創辦了大批南洋莊和金山莊，它們分別代表着來自潮汕平原和珠江三角洲的商人勢力，並構成港商的中堅力量。

溝通南北洋的南洋莊

善於拓殖的潮汕商人看準了香港這塊地處華南要衝，外通五洋，內接大陸，洋船出入的貿易寶地，很快從各方聚攏來。最早開創香港南北行業的是原先從事中暹貿易的潮商。

陳煥榮和高楚香是創業時期兩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們都是澄海縣人。陳煥榮（字宣衣，外號佛），原本在紅頭

船（廣東屬遠洋船）上當船工，後自購帆船川走於國內沿海及東南亞各埠進行販運，成爲著名的紅頭船船主，人稱「船主佛」。他在一八五一年赴港創設乾泰隆行，址文咸西街，作爲其經營南北洋貿易的中轉站。

高楚香（又名高滿華、高廷楷）早在鴉片戰爭前即已從事中暹大米進出口生意。約一八五六年前後。他到香港接辦同鄉人開設的元發行，仍主營大米生意，同時亦兼營南北土產和輪船貨運。元發行就是高氏中暹貿易的中轉基地，爲了方便經營，他還在曼谷開辦碾米廠。

乾泰隆和元發行猶如混沌時期的拓荒者，它首開了香港華人南北行業的先河，爲香港成爲轉口貿易港奠下了一塊基石。陳、高家族都因積極參與香港、暹羅、星洲、潮汕區域性國際貿易而成爲華商巨富。高楚香是南北行潮州幫的領袖，而陳氏家族更保持了百年不衰之紀錄，乾泰隆行如今已成爲香港最有歷史紀念意義的一間商店。一九八五年，香港亞洲電視台還曾將乾泰隆行址拍成電視片播放，以供人們共同縈懷。

自乾泰隆和元發行樹立了成功的榜樣後，各地華商紛紛到港創業。此後，但凡華人開設專做南北洋生意的行號，大都位於文咸西街，故俗稱這條街爲南北行街。早先這片華人聚居區的簡易棚屋，也因商店雲集而改變了面貌。

香港南北行生意，實爲省港商務之巨擘。它將北線（中

國沿各埠）的絲綢、藥材、豆類、花生、食油、雜糧及土特產，南線（東南亞及南洋群島）的大米、香料、海味、珠寶、木材、椰油等運到香港，互通有無，再轉運出去。如此一來，香港逐漸成爲國內與南洋各地貨物的集散總匯，南中國海貿易圈的樞紐。可以說，南北行業對促進早期香港經濟繁榮具有卓越的貢獻。由於歷史的原因，從事這一行業的商家一直都以潮汕籍人士居多。



二十年代的文咸街是南北行集中的商業區。（《圖片香港今昔，香港三聯書店，1994 年版》）

橫貫東西方的金山莊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廣府籍商人爲主導的溝通東西方向的金山莊貿易也開始形成。金山莊是香港爲海外華僑華人代辦各項土產的「辦莊」（過去，爲人採購、代辦各種貨品的行業稱爲「辦莊」），主要推銷於美澳兩洲，通過代理代辦貨物、匯駁金銀，而博取一定的佣金。這個行業是隨着中國近代勞工販運和海外移民浪潮而發展起來的。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從華南漂洋過海到美洲、澳洲及南洋的人越來越多，海外各華人社區形成了一定的規模。於是，在唐人埠逐漸出現了一些店舖，專賣家鄉各種食物和用品，自然地就形成了一種物質需求關係，並需要源源不斷地從國內進貨。由於香港是華僑進出大陸的主要中轉地，因此便有了專門替海外華僑華人代辦各項家鄉品物的辦莊，這種行業雖以辦理世界各地華人社區需求爲宗旨，但其中尤以運銷舊金山（三藩市）爲多，故人們又稱其爲「金山莊」。可以說，金山莊的一端繫着海外華人社區，尤其是美國三藩市的華人社區；另一端繫着中國大陸僑鄉，尤其是粵閩兩省的僑鄉。

至清朝末年，香港金山莊除了經營購貨出口外，還接理商人或華人的匯兑，代理外國人向中國招工，即兼辦移民事宜。早期的僑匯，大都是經由金山莊辦理。華人在海外將款交給唐人埠的辦莊（多爲雜貨舖），由買莊設在香港的聯號

或固定的金山在辦理「駁匯」，包括有些商業款項也採用此方法來匯兌。「駁匯」的數額相當大，此項業務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其經營的特點就是強調信用。

面對中國勞工大量出洋的年代，香港金山莊由於熟悉海外的情況，故又經常受託招收中國勞工。直到二十世紀初，這種業務才隨着海外勞工販運的衰落而結束了。

金山莊行業也出過不少商業巨賈。如禮興號金山莊商人李昇，於一八五四年爲避戰亂而由廣東新會舉家遷居香港，以從事各種經營致富。在一八七六年全港頭二十名納稅大戶中名列第十二位，當一九〇〇年他去世時有遺產逾六百萬元，甚至比當年香港歲入還多一百八十萬元。堪稱香港華人首富。以李昇家族爲主組成的和興行金山莊（有時亦稱集成公司），一八七六年在納稅大戶中名列第十一位，而十五年後即躍居榜首。

華商實力增長的突出標誌

潮州商和廣府商大舉進入香港，南北行和金山莊相繼崛起，是十九世紀中葉香港華商實力猛增的突出標誌。此一階段，亦正當香港財富基礎形成時期。

一八五八年，香港官方在行業分類統計表中首次將「行商」單列，以示重視。當年只有三十五家，翌年增至六十五家，一八六〇年多達七十七家，二年間其增長逾倍。轉口行

商的勃興，確對當時中國和香港的經濟發展有很大的影響。如一八六四年，中國海關在報道有關廣州對外貿易的情況時，認為近十年來，「對外貿易的形態已經歷重大變化，以前差不多全部的貿易是操於外人手中，而且必要透過廣州成交。現在則不同，差不多全部對外貿易都是由國內商人經手，貨品則全部從香港購買，而直接運至內地各城鎮，再毋須通過此首府（廣州）」。汕頭的對外貿易情況，差不多同廣州一樣。同年，港督羅便臣在向英國殖民地部大臣滙報香港事務的文件中，亦承認：「香港今日的發展，是有賴在港的華人（他們）將香港變成中國沿岸貿易的中樞，中國華北和華南的產品，都在這裏轉手銷售到中國其他的地方」。當時，香港與大陸的雙邊貿易已經擴展到全國各地，貿易額在一八六六年時即已突破了一億英鎊。

南北行、金山莊貿易的興隆，促進香港的轉口貿易經濟活躍起來。華人轉口行商自身也得到顯著的發展，根據一八八一年度的香港政府年報，在一八七六年至一八八一年間，南北行、金山莊的數目從三百一十五間驟增至三百九十五間。在一個並不太長的時期內，它們的經營範圍涉及五洲四海，積累了大量的財富，遂成為港商的中堅力量。在以後成立的香港華人社團中，轉口行商與買辦旗鼓相當，同居於支配的地位。

轉口貿易是華商經濟的支柱，其營業的進退與香港整個

貿易的盛衰、經濟力量的升降，關係至爲密切。南北行、金山莊的成敗得失很大程度是受外部市場條件和整個國際環境的制約，儘管其在發展過程中，因受世界政治、經濟變動的影響，有過低潮和高潮，循環起伏，但總的趨勢仍是不斷前進。

一九一四年歐戰爆發，香港華商經濟又獲發展契機。由於列強各國忙於拚殺，運港的洋貨稀疏，華商經營的土特產行業都很起興旺，南北洋轉運貿易十分活躍。一九二八年，在潮汕本地經營的北貨南運業務因國內關稅提高而轉移到香港，使南北行業更爲興隆，據估計，該行業每年營業額不下千萬金。在金山莊方面，因美國未在歐戰中遭受損失，戰後經濟反而得到較大的發展。美國華人社會亦相對穩定，金山莊的業務繼續蓬展，一九三三年達到一百七十家，全行每年營業額約爲七八百萬元。

一九三八年十月，廣州淪陷，內地交通阻梗，採辦貨物、匯駁銀兩，胥受影響。歐戰再次爆發後，美澳來港輪船疏少，且運費高昂，華商運銷貨物尤受影響。大平洋戰爭期間，香港淪陷，商家星散，南北行、金山莊業務完全陷於停頓，留下歷史上黑闇的一頁。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香港轉口貿易又迎來興盛的歲月。其有利因素在於：因受大陸政局動蕩之影響，大批內地商人將資金、技術及設備轉移到香港，戰後物資匱乏，各國

政府普遍鼓勵對外貿易，關稅壁壘無形解除，形作一個自由貿易的時代，僑匯恢復，海華人多年來未獲家鄉物品，故一時需求量大增。於是香港金山莊又蓬勃發展起來，至五十年代初，其數量復增至一百六十多家。而南北行莊乃集中於轉口貿易及與此有關的金銀匯兌業上。但有一些人已另辟蹊徑，投資於工業、交通運輸、金融等行業，據香港潮州商會所發表的資料綜合統計，至轉口貿易最高峰的一九五〇年底，估計轉口輸出額佔全部出口的百分之八十九。

香港華商脫穎而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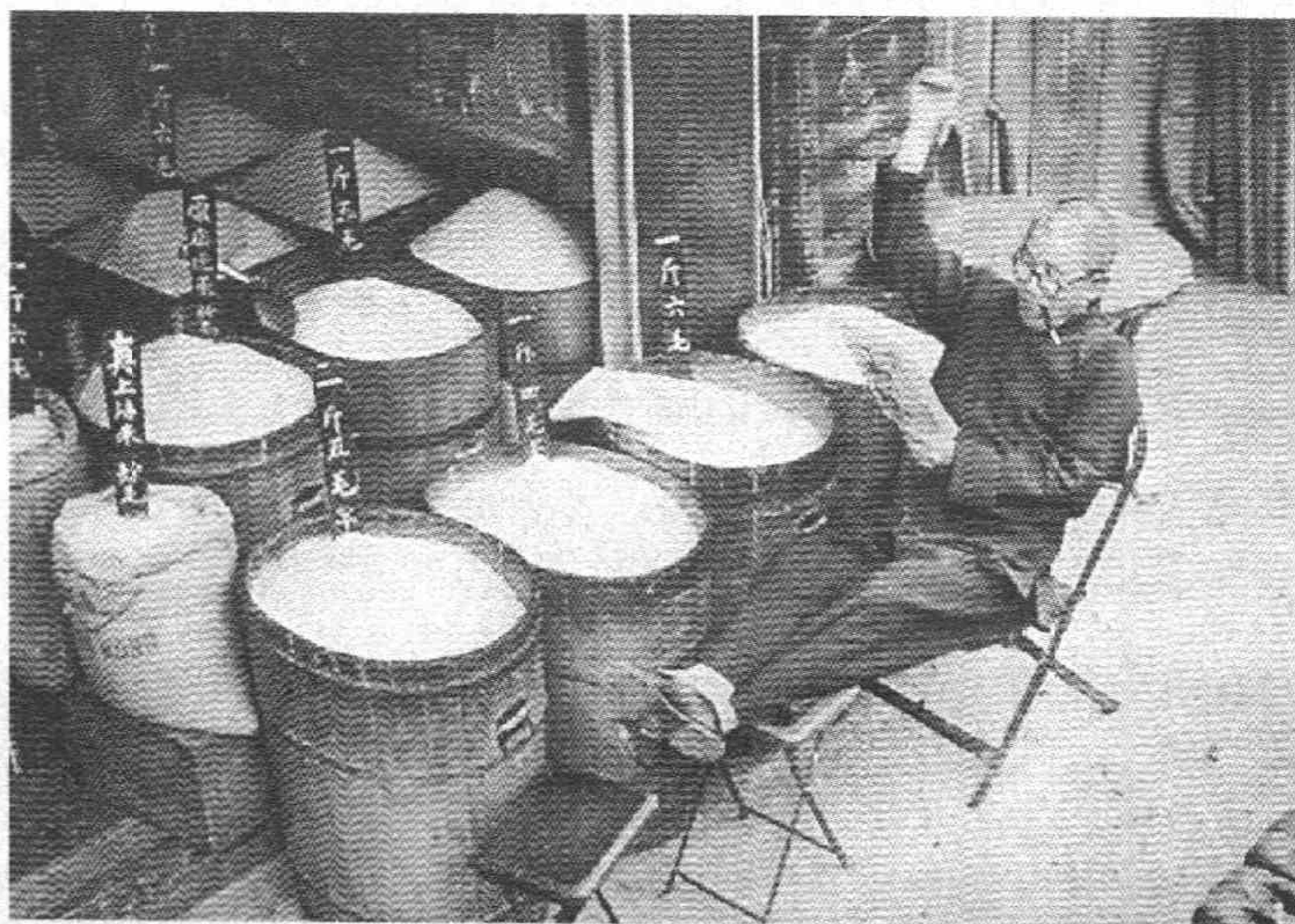
香港華商最早萌生於商業（尤其是從事於國際轉口貿易的行業），是由香港自然地理位置和近代中國對外經貿關係所決定的。廣東毗鄰香港，素來商業氣氛濃厚，粵商的向外發展現象極爲突出。如廣州《七十二行商報》發刊詞宣稱：粵地可謂「天然商國」。《潮州府誌》亦記載「潮民逐海洋之利，往來（海外）如履平地」。廣東商人善於經商，走南闖北，足迹遍布天涯，開埠後的香港正好給了他們向外拓展和大展身手的機會，地利與人和的特殊背景，有利其在港捷足先登，而主要脫胎於粵商的香港華商亦繼承了經商的傳統和擅長，以經營轉口貿易奠定了發展的基礎。

縱觀港商歷史，出身於粵籍者始終居於主流，早期粵商和港商是很難區別的，那時港商甚至就是粵商在海外的一個

分支。在清末，廣東商人許多都兼有港商，僑商的身分，在海外從事商業活動，據聞其「營業於香港者不下二十萬人」，而按香港人口統計，清末時最多也不過四十餘萬人，這充分反映了早期香港華人來源的地域集中性，華人社會高度商業化及粵商在港的優勢地位。

三、港島上的最大業主

香港開埠之初，以英商執經濟之牛耳。英國於一八四一年宣布香港爲自由港後，港府即着手建設海港城市、倉庫、碼頭等，以適應貿易日益擴大的需要。首先是輪船業和金融業的出現，如大英輪船公司香港分公司、省港小輪公司、太古洋行輪船公司、怡和洋行輪船公司、麗如銀行香港支行、渣打銀行香港分行、香港上海匯豐銀行等。它們都是以中轉貿易爲前提，主要對象爲中國內地，同時還大肆從事非法活



暹羅米每斤五毫半。（明報資料室）

動，將香港變成鴉片走私中心和苦力貿易中心。

最初二十年間，香港華商是以傳統的小本買賣爲主，各種店鋪紛紛開辦，使香港經濟面貌有了進一步改觀。當以經營中外轉口貿易爲特徵的南北行，金山莊興起後，華商勢力很快便趕了上來。在香港近代經濟史上具有致關重要地位的轉口貿易即歸功於這兩個行業的崛起，它們爲香港成爲轉口貿易埠奠下了基石。潮州籍商人除了經營南北行莊外，還長期控制着香港的米行、藥材行、瓷器行、紙行、茶葉行、涼果業、菜籽業、工糖業、柴碳業、匯兌和僑批等業。

香港食米基本依賴進口，南洋谷米運港銷售者，年値數千萬元之巨。經營大米進出口的大部分是以乾泰隆爲首的幾家南北行商號，每年入口大米近億包，除供應本港外，餘均轉輸往華南和日本。批發米商和大小零售米舖絕大部分也歸潮汕人經營，其推銷途徑，以內地爲大宗，其中僅廣東每年約需三千餘萬擔。

中國藥材一項，銷流甚廣，據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調查，其價值總額，每歲達七八千萬元。香港是中國藥材內銷及外銷的集中地。開埠初期，香港中藥材全由廣州運來發行，由於海外華僑華人生病仍是看中醫和吃中藥，故需求量很大，出現了辦藥材去外洋各埠的商號，如東京幫（安南）、石叻幫（星馬）、暹羅幫、爪哇幫及金山幫等，其購量極大。香港藥材行業幾乎清一色由潮汕人經營，每年生意以千萬元

計，曾是潮商在香港的最重要行業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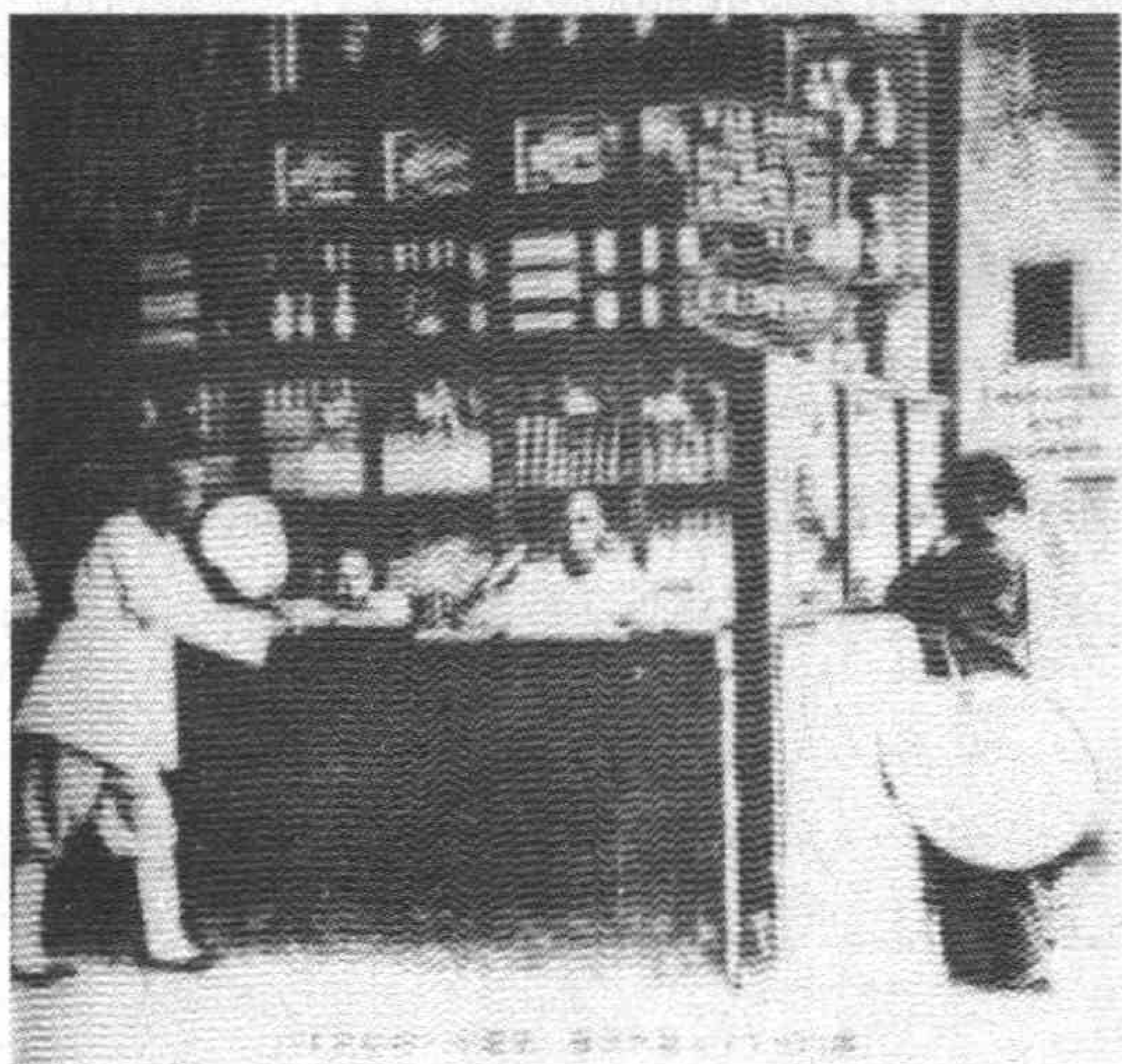
潮汕是水果之鄉，水果加工業比較發達，潮商馬錫藩很早即在香港創辦了馬廣利涼果店，除在本港推銷潮汕涼果外，還轉銷往檀香山、小呂宋及南洋群島。香港涼果業亦主要由潮汕人經營，後因香港蔗糖便宜，又是免稅自由港，各商家紛紛開廠自製，最盛時每年出口總額超過一千萬元。

連在港外國人的日常生活也離不開華商的經營。香港辦館是中國人開設的食雜店，其經營業務以供給外國人伙食爲主。居港外僑、往來船舶皆爲辦館的主顧。據陳鏸勛《香港



上環涼茶舖。（明報資料室）

雜記》記載，一八九〇年香港的財政收入中已有「辦館牌銀」，可知此行業的歷史悠久。到了二十世紀，辦館業經營頗大，資本亦巨，全體商肆九十餘家，年計營業額約二千多萬元，宏記、福興等辦館爲該行中之佼佼者。



二十世紀初，中環某一專營外籍人士生意的辦館。(《香港舊事見聞錄》，陳謙：廣東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商品流通與交換的發展加快了經濟行業的分化，香港華商專業化經營的趨向在十九世紀中葉日益明顯。爲了適應轉口貿易的發展，造船業、各種商行、旅館酒店等也紛紛建立。據統計，一八六一年華商行業種類爲一百〇一個，一八七一年爲一百六十六個，一八八一年爲二百二十一個，二十年間增幅大於一倍。其中有一些是金融業、製造業（以手工生產爲主），規模雖還較好，但引人注目。

由轉口貿易大行商、大承建商、大鴉片商及大買辦等組成的香港華商上層，逐漸顯示出雄厚的財力。他們馳騁於商

品流通領域，與洋行及海外市場有着密切的聯繫，並積累了按照國際貿易慣例經商的經驗，不論是其經營方式，還是在思想觀念上，都與傳統的舊式商人有很大的不同。從一八六〇年開始，這些新式華商已對近代企業進行投資，將商業資本以流通領域轉向生產領域。其投資方向先是集中於航運、金融、保險和食品加工等業，以後又涉足於工礦、電訊事業。

早期富裕華商向近代企業投資有多種表現方式，其中比較重要的就是與外國資本合作，即附股於外資企業。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末，在香港的英商銀行、輪船製造業、保險公司及公用事業中，都已有華商附股，而到八十年代後期，華洋合資組建股份公司，已成爲香港經濟史上的一個顯著特點。附股華人中有買辦，也有非買辦性的華商。如金山莊巨賈李昇於八十年代後期投資於省港澳輪船公司，擔任該公司董事。九十年代中期，又成爲香港置地公司的大股東兼董事。

在洋務運動時期，國內官督商辦企業和民間企業有了一定發展，也吸引了香港華商的投資。如一八八〇中國輪船招商局招股時，高楚香認股三千銀兩，一八八三年李昇與何亞美各投資十萬銀兩，開廣東香山縣大嶼山鉛礦和儋州銀礦，一八八九年，李昇與大買辦唐景星，徐潤等合資三萬銀兩開設廣州城南地基公司，購置土地，建築碼頭、堆棧等等。

港商亦在本埠自辦企業，獨立或聯合經營。經營項目多

與轉口貿易相關，範圍很廣泛。據港督軒尼詩一八八一年對英國議會的報告書所稱，華商合資「所有股份紛連密布，形如網絡」，如何亞美、李昇等於一八七七年集資四十萬元創辦安泰保險公司，闖入了原由洋商壟斷的商業和金融領域，也是華商完全採用西方程營方式從事活動的重要事例。十九世紀下半葉，華商陸續建成投產的重要項目還有造船、機器造紙、火柴等企業。

除了投資近代企業外，香港華商亦十分熱衷於地產業，當押業及高利貸業等傳統的投資項目。據報導，一八八〇年頭五個月內，華人向洋商及香港政府購入房地產共一百七十二萬餘元，約為同期洋商購入值的七點五倍。李昇、鄭星揚等是當時的大買主，李昇擁有的房地產極多，港島李昇街即為其財產之一部分。不過，這類投資具有非生產性的商業特徵，它表明新興的華人資本家兼有商人、地產主和高利貸者三位一體的屬性。

華商投資經營實業後，與洋商的關係也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外國人抱怨道：「中國的買辦和商人對西方人士採用的一套辦法熟悉了之後，便逐漸把他們甩開了。」在十九世紀末，「中國人的本領逐漸大了，自己的現代化的金融和商業機構也發展起來了，隨後便在其他經濟領域中對西方人士如法炮製，一腳踢開。」這種說法也許過分，卻反映了因利益而產生的華洋矛盾。

隨着經濟實力的增長，到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華人社會的經濟狀況有了明顯的變化。從七十年代後期開始，華商已有從事收購洋商因營業不振而結束的商行。這在安德葛（G.B.Endacott）所著的《香港史》中曾有記載，專門談到「中國人購買歐洲人的產業」，並指出「中國人在香港財產的日益增加，證實了中國人享有這個殖民地大部分貿易的結論」。到八十年代初期，華商的財富已有追越洋商的趨勢。許多由外國人控制的公司，華商握有的股份佔很高的比例，在怡和洋行的怡和輪船公司等企業中，華人還據有董事會的席位，値得注意的是，由華商營業的內地公司，時有在香港注冊，以便享有給予外國企業的保護。

根據官方統計，一八五五年末，香港個人繳納地稅十英鎊以上者有一百四十一人，其中華人爲四十二人，約佔總數三分之一，華商與洋商相比，財力尚差甚遠。一八七六年，香港繳納房地捐二千元以上的二十名大戶中，洋商和華商各佔十二名及八名，另按人均納稅額而言，洋商亦居優勢。然而一八八一年時情況大變，年納房地捐的頭二十名大戶中，華商佔了十七位，爲洋商人數的近六倍。稅額近十萬元，比洋商所納額約多四倍。雖然在人均納稅額方面華商稍遜於洋商，但納稅大戶人數和納稅總額兩項，均已遠遠超過了洋商。諾督軒尼詩在政府定例局提出報告，承認華人是港島的最大業主，香港外國銀行發行的貨幣極大部分也掌握在華人

手裏，而港府的稅收，有九成是取自華人。

當時的英國議會文書也有相關反映，認爲香港華商「已能以低於歐洲競爭者的價格將大批中國貨物投放英國市場，同時，他們也能在香港與中國以較他國商人低廉的價格向當地居民提供英國貨物。」作爲早期華商的政治代言人，王韜曾在香港《循環日報》撰文介紹港商的崛起，說「昔之華商多仰亞人之鼻息」，「近十年以來，華商之利日贏，而西商之利有所旁分矣」。並自豪地宣稱「凡昔日西商所經營而擘畫者，今華商漸起而預其間」。這表明，香港華商取得了相當的成功，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發揮着越來越大的作用。他們不僅是洋商的貿易伙伴，也逐漸成爲其強勁的競爭對手。

四、華人金融家的崛起

伴隨着華人經濟的發展，香港誕生了華資金融機構，但其出現相對較晚，從經營形式上講，既有傳統的銀號、當舖，又有新式的銀行、保險公司。

聯繫廣泛的銀號

香港最早的銀號大抵都是廣東人創設的，大約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爲適應中外貿易頻繁，外埠及廣東內地各鄉匯兌之需日增，香港本埠金融調節急返等情況，香港銀號紛紛開辦，其業主以廣東南海籍人最早，勢力最大，順德及四邑籍人次之。其中歷史最爲悠久的有瑞吉、鄧天福、昌記等幾家。瑞吉銀號是由南海九江人馮番泉、郭君梅集資經營；天福銀號則爲南海九江人鄧老昂獨家經營，匯隆銀號由順德人潘頌民等人經營，泰新銀號的經營者是東莞人周少岐、周卓凡等，余道生金舖的主人則爲台山籍人。

一八八六年，香港約有銀號二十家，其中六家有資本五千至一萬元，主要經營匯兌和兌換現洋，十四家有資本三至六萬元，年周轉資金平均爲十五萬元。據陳鏸勛《香港雜記》載，到一八九〇年，銀號已增至三十餘間。港島文咸東

街、永樂西街、大道中、康樂道中、南北行街口之德輔道西一帶，爲銀號的集中所在地。在業務上，香港銀號與內地同行無異，按種類可劃分爲三種：即按揭（以經營放款存款及匯兌等爲主要業務，故資本最雄厚、勢力最強，信用亦至爲鞏固）、金銀找換（以兌換貨幣爲主要業務，分門市零星營業，年中盈餘頗爲可觀）、炒買貨幣生金銀（偏重於金銀買賣及匯兌買賣，迹近投機）。

早期的香港銀號，以獨資組織者居多，後因社會的需要漸繁、企業資本增大，於是銀號商逐有合伙組織之趨向，多的是達到幾十萬乃至上百萬元。銀號大都在廣州或外洋各地設有聯號。按揭銀號與南北行、米行、麵粉行、藥材行、花紗行及布匹行等廣通聲氣，放款收息，所經營的業務，每逢市面商業興旺之年，依規模之大小，每號可做百萬至數百萬左右的營業。

十九世紀末，香港已是遠東最大的轉口埠，中外客商雲集。世界各地貨幣不同，顧客到港後，須將隨身攜帶的各國貨幣換取港幣，以備零星日用款項。因此，港島和九龍一帶都有不少的銀錢找換店。它們除了兌換外幣和港幣外，尤以港幣換粵毫或大洋爲多（因國內幣制不統一，即便在廣東境內也有使用銀毫和銀元之分），一出一入，補水貼價，獲取利潤。昌記、道亨等銀號便是找換業中之大戶。

銀號本是中國傳統的金融機構，但因業主們長期置身於

資本主義的社會環境裏，在與外國銀行發生了金融業務往來（有些銀號用外國銀行資本做生意，有時外國銀行則通過銀號把金融勢力引向內地銀業界，因之被稱爲「歐洲銀行的觸角」），並爲洋商銷售商品提供服務後，便逐漸擺脫舊的經營方式、改按銀行的方式辦事，使銀號具有了銀行的功能。如恆生銀行創辦人之一的何善衡，祖籍廣州，一九三三年與林炳炎等人在港創辦恆生銀號，戰後何曾任香港金銀業貿易場主席，一九六〇年其銀號正式改名爲香港恆生銀行有限公司。

二十世紀初，香港銀號有了公共團體。以按揭爲主要業務者，多屬銀業聯安堂。該堂創於清光緒卅三年（一九〇七年），爲銀號同業「集恩廣益聯絡感情之機關」，有成員三十餘家。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改組爲香港銀業聯安公會，呈請香港政府立案，會址定於乍畏街。入會的銀號共計擁有資本達上千萬元。另外，以買賣爲主者，多屬金銀貿易場，擁有會員銀號二百四十多案。該場創辦於一九一二年，組織嚴密，基金鞏固。這裏是金銀買空賣空的交易所，與證券交易所相似。場址設在孖沙街，會員領有牌照，出入場所交易，須交出證章。經營者以南海九江人、順德人及四邑人爲多。

香港銀號對本埠與內地的金融調節曾起過重要的作用，如港商發展華洋物產貿易，集資回鄉協助發展實業或福利事

業等，這些資金主要都是通過香港銀號流入內地的。廣東僑匯在各省中獨佔鰲頭，而香港是華南地區的匯兌中心。清末和民國年間的僑匯，大都是透過香港銀號進行。

抗戰初期，香港銀號之匯兌與買賣盛極一時，找換店的市情亦相當活躍。可以說，香港銀號實力雄厚，歷史悠久，與華商各業聯繫廣泛，以輔其金融流通。直至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以前，銀號一直是香港金融市場組織之中堅，其地位與上海的銀莊相似。

新興的華資銀行

香港市場凡百商業，首推金融，而金融業中，則以銀行爲首。作爲現代式組織之金融機構銀行，香港早在一八四五年即有了英商麗如銀行（又稱金寶銀行）的分行，當時以鴉片押匯爲主要營業。以後又陸續出現了英商渣打、匯豐，有利銀行，法國東方匯理，中法工商銀行（中法合資），荷蘭小公、安達銀行、日本橫濱正金、台灣銀行、比利時華比銀行、美裔萬國寶通銀行等。

在華商方面，遲至十九世紀末，才有採取西人之金融制度，開辦銀行，以與外國銀行相頡頏。開其先河者，當首推一八九一年創立的香港中華匯理銀行（National Bank of China Limited, Hong Kong），該行董事會共有七名成員，其中華人佔三席，可見其實爲華洋合資企業。這家銀行於一九

一一年關閉。



東亞銀行創辦者之一簡東浦。（明報資料室）

遲至清末，香港純粹華資銀行尚付闕如，有識之士已指出盡快設立華資銀行「爲當今急務」。香港華資銀行業的崛起，是在中華民國建立以後。一九一二年，美國三藩市華僑陸蓬山鑒於香港華商銀行之缺乏，遂應時代之需要，集資發起組織廣東銀行。香港因地勢關係，成爲華南國際貿易之總匯，華資銀行之興起，迨若雨後春筍，尤其是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事變發生，我國對外貿易中心，漸向南部轉移，儼然以香港替代上海之地位，由是國內銀行，遷港營業，爲數劇增，更壯大了香港華資銀行業的實力。

香港華資銀行，以其註冊地點而別，可分爲兩大類。其一是在香港註冊者，總行亦設在香港。如廣東銀行，一九一二年創立，以陸蓬山、梁季典、鄧勉仁等爲首；康年儲蓄銀行，一九一六年創立，工商銀行，一九一七年由美、加華僑集資創辦，華商銀行，一九一七年由香港世傳的安南華僑米商劉氏家族投資創立；東亞銀行，約一九一八年由簡東浦、周壽臣等發起創辦，國民商業儲蓄銀行，一九二一年由馬應

彪、郭泉、蔡昌、王國璇等創立；嘉華儲蓄銀行，其前身爲一九二三年創辦的廣州嘉華銀行，金華實業儲蓄銀行，一九三三年主要由美國華僑張拔超、朱仲儒等出資創立；永安銀行，一九三四年創立，經理郭泉，香港汕頭商業銀行，一九三五年由潮州商會會長馬澤民倡議集資創建，集中潮商金融力量，以調劑盈虛。其他還有東方商業銀行、有餘銀行等，亦歸此類。

其二是非香港註冊的華資銀行，其總行絕大部分設在中國內地，因業務經營之需而在香港設立分行或辦事處、通訊處等。一九〇一年二月十九日，中國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香港分行開張，但它並不佔重要地位，不久又撤消了。中國銀行（其前身爲大淸銀行，民國建

華僑銀行廣告。（明報資料室）

立後改稱中國銀行，一九二八年被國民政府指定爲特許國際匯總銀行）於一九一六年設駐港辦事處，一九一九年改設分行。一九二九年五月一日，我國中央銀行香港分行成立，交通銀行（始創於清光緒卅三年，一九二八年被國民政府指定爲特許發展全國實業銀行）於一九三四年設香港分行。鹽業銀行於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三六年先後創設駐香港和九龍分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於一九三二年設駐港辦事處，一九三四年改爲分行。中南銀行、金城銀行分別於一九三四年和一九三六年設立香港分行。廣東省銀行、廣西銀行也分別於一九二九年和一九三二年設立香港分行。此外，總行在新加坡的四海通銀行於一九一五年設香港分行，和豐銀行於一九二三年設香港分行。一九三三年，新加坡和豐、華商、華僑三銀行改組合併爲華僑銀行，同年即在港設立分行。

抗戰爆發後，又有一批內地銀行赴港開設分行，如中國國貨銀行、國華銀行、南京商業儲蓄銀行都在一九三八年創立港行。而中國農民銀行、廣州市立銀行、四川省銀行、福建省銀行、中國實業銀行、中國農工銀行、中國通商銀行、浙江四明銀行、重慶聚興誠銀行、上海新華信托儲蓄銀行，均在香港設有辦事處或通訊處。當時的輿論評述稱，自抗戰軍興，「吾人所有財力，多數集中本港，以致各大銀行營業，多有戶限爲穿，拒而不納之勢」。「本港銀業，可謂極一時之鼎盛」。

具有實力的「華南財團」

過去香港銀行界有兩大團體組織：一是香港匯兌銀行公會，凡在港之中外銀行均可參加，以銀行爲會員單位。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末，共計有會員銀行二十二家，其中外商十一家，包括匯豐、渣打、有利、大英、萬國寶通、大通、法國東方滙理、荷蘭安達、荷蘭小公、橫濱正金、台灣等銀行。華商也有十一家，包括中國、交通、國華、金城、上海商業儲蓄、廣東、東亞、國民商業儲蓄、廣東省、廣西、華僑等銀行。二是純粹由華商組織的香港華人銀行公會，亦以銀行爲會員單位，全港各華資銀行皆爲會員，會址並無一定，該公會主席則由中國銀行香港分行等輪流擔任。

早期香港華資銀行得益於華僑投資頗多，業務經營發展很快。據一九三六年調查資料顯示，廣東銀行資本額爲六百一十四萬元（比初創時期升了一倍），東亞銀行爲五百六十〇萬元（剛建時只有二百萬元）、國民商業儲蓄銀行爲四百一十九萬元（比初創時也升了一倍）。但有些銀行規模很小，如嘉華、金華實業、康年等銀行的資本只有幾十萬元。若與外資銀行相比較，一九三三年時，僅匯豐銀行法定資本額即達五千萬元，並發行港幣一億多元（華資銀行設有發行紙幣之特權），對比之下，可謂實力相差甚遠！

在香港注冊的華資銀行，當其業務發展起來以後，便不

斷地向中國內地和海外開拓。如廣東銀行在上海、廣州、漢口、暹羅、紐約、三藩市設有分行，其代理處更是遍及歐美和南洋各埠，東亞銀行在上海、廣州、西貢、海防設有分行，國民商業儲蓄銀行在廣州、漢口、上海、天津、新加坡設有分行，工商銀行在上海、漢口、廣州設有分行，等等。由此擴大了香港華商金融業在海內外的影響，特別是溝通了同中國內地的經濟聯繫。如香港工商銀行除經營一般銀行業務外，營業重點是接駁僑匯，改變了過去美洲華僑主要由匯豐等外資銀行辦理匯款的局面。其他各商業銀行在其所在地，除了儲蓄、按揭等主要業務外，亦兼營匯兌、保管等業，管理手段先

中國銀行廣告。（明報資料室）

進，很得內地民衆和華僑華人的信任，營業穩固。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香港華資銀行活躍於閩粵及南洋一帶，是華僑金融之樞紐，具有溝通海外僑胞和中國經濟聯繫的使命，因而被當時人們稱之爲「華南財團」。

當然，華資銀行的發展道路也是坎坷的，時有倒閉慘事發生。如一九二四年六月，香港華商銀行倒閉。一九二六年六月，東方商業銀行又因資金不能周轉而自行收盤。一九二九年開始了世界性的經濟大蕭條，美洲南洋等地大肆排斥華僑，香港轉口貿易大爲萎縮。美國陡生金融風潮，金貴銀賤，更是雪上加霜。三十年代初，香港經濟陷入低谷。再加以有些銀行本身經營管理不善，本小利少者遭受打擊，紛紛歇業破產，香港工商銀行多次發生擠兌風潮。一九三〇年六月，終因上海分行停業而牽連到總行亦一齊倒閉。嘉華銀行因挪用存款過巨，無法兌現，復因所屬企業廣州嘉南堂失敗之牽累，於一九三五年破產關閉。金華實業儲蓄銀行因金融恐慌，業務蕭條，遂於一九三六年宣告結束。甚至連較具實力的廣東銀行亦難以維持，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瀕臨倒閉之際，依靠中國政府實力派人物之一的宋子文進行增資改組，才能得以爲繼。

發展迅速的保險公司

香港保險業起始爲外國人所䌷辦，外商在華興辦最早的

一家保險公司是廣州諫當保險行，一八〇四年即已成立。一八六六年，英商查頓集股創辦香港火險公司，這是香港最早也最有聲譽的一家保險公司。

中國人的保險公司主要是從屬於航運業的需要而產生的，香港華資保險公司出現於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華商保安公司創於一八七一年五月，總行設香港，在上海等埠有辦事處，其發起人主要是買辦和商人，公司的宗旨是「把華商自己貿易中的厚利收歸己有，在公司股份之中，務欲華人居其大半」。一八七七年，由何亞美、李昇等集資四十萬元創辦香港安泰保險有限公司，凡往來於香港與澳大利亞、三藩市、新加坡及中國內地的船只它均可承保。這些公司闖入了由洋商壟斷的商業和金融領域，後來安泰保險公司還加入香總商會，成爲這個被視作西人商會組織中的第一家華人會員。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香港華資保險業迅速發展起來。一八九九年創立的義安水火保險公司有資金一百萬元，在南洋、澳洲、美洲、日本及印支各條約口岸都有分號。福安保險公司較有影響，完全由我國股商所組織，創於一九〇〇年，備足資本金一百萬元。經營洋面火燭保險兼貨倉業務，分公司遍設於海內通商巨埠。二十年代，南方政界要人如譚延闓、胡漢民、林森等人曾任福安廣州分公司名譽董事。

保壽真諦

人壽保險意義係在于保戶遇不幸時由承保者賠欵與其家屬替保戶解決身後經濟問題免因個人身故累及家庭受害故保壽乃人類互助之實際行為同時又可儲蓄金錢預備養老有識之士請早蒞臨認保

總行香港德輔道：電話二三三零七

永安人壽保險有限公司

粵行廣州靖海路：電話一二三三四

1973 年的永安人壽保險公司廣告。（明報資料室）

在這一時期報紙廣告中頻繁出現的還有全安、宜安、濟安、同安、普安、仁安、恆安、利華等衆多保險公司，業務大都屬洋面火燭保險兼附揭匯兌按揭貨倉等內容。

民國初年，香港的大百貨公司也兼營保險事業。如先施公司於一九一二年創辦保險投資公司，一九二〇年又設人壽保險公司，股本一百萬元，總行在香港，於各省各埠設分行分局。永安公司於一九一五年創辦火災保險公司，一九二五年再創人壽保險公司。一九一八年，大新保險銀業有限公司成立，在廣州、上海等地廣設分局。

至三十年代末，全香港共有華洋保險公司五十多家。外商佔二十餘家，其餘均爲華資，營業額統計每年約二三千萬

元，足見其實力之雄厚。

爲平民周轉資金的典當舖

典當業是中國以收取衣物等動產作質押，向民衆進行放款的金融機構，帶有一定的高利貸性質。這是一種古老的行業，在英國人到來之前，香港地區已有當押店。新界元朗墟的普源押、泰安押，據說是香港最古的當舖。

香港當押業與銀號、銀行一樣，也能流通金融而增加財力。此行業是港中平民周轉資金的最大商務之一，香港政府對其徵收牌照稅，作爲財政收入的一部分。據陳鏸勛《香港雜記》載，一八九〇年港府總稅銀中，當押行的牌照費僅次於酒牌。

典當舖的業務經營，素稱穩健。業主對於衣物、金銀首飾、古玩字畫、鍾表等貴重物品，低價押入，高價售出（民國時期香港當押業押物期限同內地一樣，多爲一年，過期不贖則變賣），故每年獲利極豐。李右泉、梁弼予等爲當押業之巨擘，其廣置產業，富甲一方，更得英國褒獎，得香港太平紳士稱號。李右泉還曾多次出任香港華商總會會長。

香港典當業所營商肆，在港島、油麻地、旺角、深水埗、荔枝角等處，計有六十餘家。其餘在九龍與新界及各小島一帶，亦有四十餘家，合起來共約上百家。但各處之營業並不盡同，交易上以港島上環、中環兩地之當押爲最大宗。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後期，中國內地對於故衣增稅後，使香港當押業（其當押的故衣，均向內地推銷）遭到打擊。四十年代又歷經戰亂，全國的典當業都居於不景氣狀態。尤其是戰後，華人服裝多趨於西裝、絨褸、毛衣及冷衫，傳統中服之長袍、馬褂、棉襖、皮袍等一律過時，被故衣店視爲冷門貨，出價甚低。又因金銀首飾等價格飛漲，一般人家不易購買，故當押店的當入亦大減，該行的生意，較之往昔則大爲萎縮。



這是當押店當票的傳統書體，至今香港當押店仍沿用。（明報資料室）

五、興旺的航運業

香港被大海環繞，東有鯉魚門，西有汲水門，爲船舶進出的要道。開埠之初，香港商務以船業爲大宗，船線大致分爲兩部分，一是外洋線，由於近代中國民族航運界無力開闢遠洋航路，故此領域內的航業被英、美、日等外國輪船公司所壟斷。二是港粵沿海內河線，主要利用珠江水系尤其是三角洲省港線來溝通，包括省港、港梧、港江（門）等水路；其次是華南沿海各通商口岸至香港的近海航線，如港汕、港湛、港廉（廉州府合浦懸）、港瓊、港澳等水路。各線航班頻繁，來往船隻既有傳統的木帆船，也有先進的輪船和拖渡。

興旺一時的大帆船貿易

清末香港與東南沿海反廣東腹地的經濟聯繫主要通過木帆貿易來進行，帆船主利用「港商」的身分在大陸與香港之間自由活動不受限制，走私偷稅者很多，並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得到迅速發展。如一八四七年，進入香港的中國帆船僅有八萬多噸，到一八六七年已達一百三十五萬餘噸（約二萬多艘次），二十年間即增加了十六倍以上。據駐華英領事一八



二十世紀初，滿載遊客的日本客輪於九龍半島泊岸。（明報資料室）

七二年估計，英貨自香港裝由帆船輸入廣東者，每年所值不下三百六十萬英鎊。

帆船貿易對輪船運輸（當時主要由洋商經營），形成極大的不利，也使海關稅收大爲減少，損害了清政付的財政利益。一八六七年，廣東官方開始加強在香港、澳門附近海面的緝私行動。一八七一年，更在帆船航行要道設了六個稅廠，不顧英方之反對，對木帆船貨物和鴉片徵收常關稅和釐金，此即所謂的「海關封鎖」。最後中英雙方於一八八七年達成協議，清政府成立了九龍和拱北海關，主要目的是要制止華人木帆船把烟土從港澳私運入境。根據新規定，帆船主所應繳納的關稅將全部由海關（被外籍稅務司控制）徵收，中國方面並無增加什麼收入。這個新規定只對輪船船東有

利，因爲當用輪船和木船都要交納同等數目的稅款時，再用木船貨運已沒有多少意義了。儘管此後十年間，粵港木帆船貿易仍十分繁榮，然而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木船運輸逐漸走向衰落。

輪船航運業的肇興

在鴉片戰爭以前，輪船通常只是作爲輔助運輸工具使用的。但在外商勢力比較集中的粵港地區，輪船得到迅速發展。中英《虎門條約》准許洋商小帆船行駛於省港澳之間，輪船並未包括在內。但洋商很快就將輪船駛入中國內河，一八四六年，已有兩輪從事省港間的運輸業務。約一八四八年，又有經營定期航班的「省港小輪公司」(Hong Kong Canton Steam Packet & Co.)，此乃外商在華創辦的第一家專業輪船公司。自此，外國航商勢力由香港而不斷向華南沿海各地延伸，並沿西江上溯直達梧州。

外商在華輪運勢力的發展，客觀上爲華籍輪船商的出現創造了某些條件和可能，前述木帆船業的衰敗本身也是條件之一。在通商口岸所湧現的一批人才和技術力量，同樣有利於華資輪業的發展。但在清朝政府的壓抑。限制政策下，使早期資於輪運業的資本只能假借洋商名義進行經營。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廣州地區已有華商投資於輪船的事實，這些華商大都採取懸掛洋旗、僱傭外籍船員的辦法來經營自己的輪

船。六十年代，華資附股於外輪公司的事例屢見不鮮，卻一直未出現華商創辦的輪船公司。

一八七二年，中國輪船招商局成立，後設廣州分局，壟斷了廣州至港澳及北方各岸的沿海航運。當時華商久經稟求集資購辦輪船，都被李鴻章禁阻。不過也曾有多次華商創辦輪船的事例，如一八七五年有「黃埔城號」開行省港間，欲與洋商輪船公司競爭；一八七七年，置辦郭甘章已擁有了十三艘輪船（應是僱傭輪船）。八十年代，創辦輪船的電請越來越多，清廷遂於一八八四年頒布《華商購造輪船章程》，主旨仍爲限制華商購輪「不准擅入內河」、「只准行駛通商口岸」。不論如何，政策上總算有了鬆動。一八九〇年前後，出現了幾家稍具規模的公司，其中香港的華商輪船公司（The Chinese S. N. Co, Ltd.），資本額達三十萬元。另有一家取名省港澳輪船公司，由港澳華商合資（其中以陳兆和股份最多）購置「河南」、「泰山」、「龍山」、「金山」、「佛山」等輪走省港線，「瑞安」、「瑞泰」等輪走港澳線。一八九四年，于潔棠、于風山投資創辦了香港泰安輪船公司。

香港華資輪船航運業是隨着十九世紀末華僑回國投資企業潮和二十世紀初本埠華商創業高潮而發展起來的。一八九八年，清朝政府頒布《內港行船章程》解除了禁令，華商獲得在內港行輪船的權利，出現了紛紛開辦小輪業的勢頭。

一九〇〇年後，香港華資輪船公司逐漸增多。如省港輪船公司於一九〇一年招股銀一百萬元成立，購有「珠江號」輪往來於省港間。同年，由港商趙新基等人招股銀五十萬元（其中包括外商投資）創辦北安輪船公司，購置千噸級的「廣西號」輪船開夜航。盈利後，再集資購「廣東號」輪，成立源安輪船公司。此兩船實由統一經營，每晚從省港兩地對開，成爲這條航線上最早的夜班定期航輪。此外，還有香江輪船公司，以「香江號」、「江門號」兩輪川走於香港至江門，甘竹及三水等埠，不久又添省港線航班。

一九〇二年，由美、加華僑投資創辦香港四邑輪船公司，後購置四艘輪船，行駛於香港至江門航線，爲定期貨客輪航班。長安輪船公司也創於這年，擁有資本十二萬元，購置「新昌」和「英京」兩船，開行省港夜航。

稍後一些出現的輪船公司，還有創於一九〇三年的元安輪船公司，有資本二十五萬元，輪船二艘。廣運輪船公司亦成立於一九〇三年，以「北江號」輪船行駛於香港至廣州、江門、甘竹、三水航線。一九〇四年又成立了好幾家輪船公司，如毓安輪船公司經營省港線，順安輪船公司以「東京號」開行廣州至江會線。同益、同和輪船公司，經營太平至香港的輪拖生意。和順、順泰輪船公司，以「海河」、「順利」二輪往來於香港、江門、甘竹、九江等埠。順泰輪船公司是由簡氏兄弟創設，租船行駛，由一船增至五船，後復自

購輪船，航線越來越長，公司的規模也愈益擴大。一九一〇年，陳某商人投資十六萬元設志和公司（掛英旗），置備「海明」和「海通」兩輪，定期航行於省港間。

港九兩地，相隔一衣帶水，渡輪是很便利又有特色的公共交通，人稱「海上巴士」。香港的渡海小輪業早在一八四二年即有，初由英商經營。直到一八九八年，由華商投資的天星小輪有限公司成立（翌年改名爲香港小輪集團有限公司），共開有三條航線，爲港島至九龍間提供相當頻密的小輪渡海服務。它是香港歷史上最長的小輪公司。

由此可見，一九〇〇年前後是香港華資輪船航運業的初興階段，不少著名企業都於此時諏辦。它們的經營比較集中於以珠江口附近爲中心內河線，同外國輪船公司相比，華資企業規模小，資本小，一般僅有幾艘船，甚至有的每條船即爲一家航業公司。然而，華資輪船公司畢竟成長起來，打破了外商對粵港航業的壟斷，分取了省河航運的巨大利潤。按中外輪船數目的比例來看，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大致分布是英商佔百分之五十三，華商佔百分之三十一，其他外商佔百分之十六。

華資輪運業的較大發展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中華民國成立，對於中國民族濟的發展產生了較大推動。旋又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列強各國暫時放鬆了對華經濟控制，香港華資航商也獲機擴展實力。

一九一三年，以陳少白爲首的粵商，聯合港商和華僑，集資六十萬元創辦粵航公司，以兩輪航行於穗港線，成爲當珠江流域最有實力的民營航運企業。一九一六年，又有由旅澳華僑投資的香港新海南輪船公司，置輪一艘，經營香港至九江鎮的定期客貨航班。以後，開行於省港線上的還有普泰和記航業公司的「華安」號，有成輪船公司的「昇昌」號，志安公司的「永安」號以及同安、紹安等輪船公司。同安輪船公司擁有「東安」、「西安」兩船，專走省港夜船，投資者爲梅普之、胡熙棠等人。該公司總經理胡務堂爲躲避廣東政局不穩，船被軍閥徵用之虞，決定向港英當局注冊，並懸掛英旗，聘英國人爲船主，其實基本上是由華商自籌資本。

在歐戰期間，省港澳間的客運暢旺，僅廣州港口每年進出的中外旅客達一百四十餘萬人次，其中絕大部分是往來於港澳的旅客。二十年代初，新的航業公司仍在不斷地創立。如天和輪船公司的「江寧」號開闢了香港至西江上游梧州線；鉅利輪船公司的「海生」號行駛於香港至江門線，廣東航業公司購置「播安」、「哈德安」兩船走省港線，等等。繼天星小輪公司後，港商劉鑄伯等人投資一百萬元，於一九二〇年創立香港油麻地小輪有限公司，除經營港九間航線外，還開闢市區與新界、離島的航班，加上汽車輪渡服務，

共有線路二十三條，使香港內部的過海交通更爲方便。此時，由於香港人口逐漸稠密，往來絡繹不絕，渡海小輪業獲利蔚然可觀。

據統計，截止於一九二一年，香港已有華資輪船企業二十家，約佔廣東民族輪船業的百分二十三，總噸位的百分四十五。其航線延及日本、越南、中南半島及中國沿海，如旅澳華僑郭順與郭光福合作，於一九一七年創辦中澳輪船公司，郭氏兄弟的悉尼永安果欄投入了三千澳鎊，爲最大股東。該公司置備兩輪航行於澳洲和香港之間，一九二一年又在港滬穗三地增招新股，擴大營業。又如李星衢於一九一八年創立輪船公司，經營遠及日本、中南半島之間。但大多數公司是營運於珠江河道，尤以港穗梧航線較爲集中。

陳濟棠統治時期，廣東局勢相對較穩定，港粵內河輪船如香港，港澳、港江（門）、港梧等線，營業均極佳。一九二九年，元安輪船公司「泉州」號還開始了港澳之間的夜航。新的航線不斷開闢，三十年代初，香港至廣州灣的航路開通，擁有四艘輪船，來往客人多係廣西、高州、廣州、雷州等地經香港赴南洋者。粵西地區土產如豬、牛、雞等禽畜輸入香港亦甚多，故新航路營業旺盛。

在華南航運線上，香港處於中樞位置，是我國南方運輸貨物之吞吐口。舶來品及北方南運之貨物，十有八九是先到香港，再運到廣州或汕頭，轉銷內地，遠及潮贛。華南出口

商品也主要經由香港輸出。內河線貨運，從香港輸出的多是洋貨、西藥、煤油、水泥等，運入香港的多是大陸土特產、果品、蔬菜……豬羊三鳥塘魚、柴薪、缸瓦瓷器等。凡華僑及各國商人，或往來於遠東一帶的旅客，亦多經香港而轉往各處，是以香港輪運業的地位甚關重要。設在香港的外國輪船公司固然衆多，而華商航業亦以省港線經營爲其精華。一九三一年初，中國政府六通部呈報行政院，擬在滬、漢、穗、津、哈爾濱等五埠設立航政局。經國務會議討論結果認爲，廣州並非海航中心，故將廣州局改設於香港，由新成立的香港航政局兼轄閩、粵、桂三省各部，並訓令交通部知照。

抗戰以前，加入香港華人小輪商會的輪船，計有三十多艘。而未入行會者，亦有二十餘艘。業務則以拖帶程船（專以運載鹽斤的船隻，香港有百餘艘），米艭（由香港運米前往廣州的貨船）及雜貨船爲主，尤以拖帶米艭，往來港穗爲大宗，每年約收入九十多萬元。在承平年代。每日走廣州輪船，分早中三班往還者有十餘艘，港澳間每日有近十艘，港梧間來往有十餘艘。此外，石歧、江門、太平、寶安各屬均有鄉渡與香港來往。

華資航業發展的阻礙因素

首先，是來自外商輪船公司的競爭和壓力。直到民國初

期，粵港一帶外輪公司衆多，主要有太古輪船公司、怡和輪船公司、日本汽船會社、大阪商船會社、日清汽船株式會社及法國公司等，擁有大型輪船達數十艘之多。英國航商居於霸主地位，不論是歐戰的影響，還是後來省港大罷工的抵制，都只是暫時地削弱了英商的輪運勢力，一旦事件結束，英商在華南的航運又迅速恢復。日本、美國的航運公司利用歐洲列強注意力集中於第一次世界大戰西方戰場之際，不斷地向華南進行滲透。二十年代後，日本在這一帶水域的航運實力僅次於英國而居第二位，其他如美國、德國、荷蘭、丹麥、挪威、蘇俄等國進入港粵的船隻都增多，競爭更趨激烈。

外國航運公司還開闢了不少沿海航線，把觸角從香港伸向汕頭、海口、北海等各通商口岸。其資本雄厚，擁有船隻數量多，噸位大，設備先進，實爲華資航業界所望塵莫及。在競爭中，華商航業家常處於不利的地位。如中澳輪船公司在英商太古、怡和公司及澳洲政府的排擠打擊下，一九二〇年曾被迫售船停業。廣東航業公司一九二六年初因資金周轉不靈，被英商公司索債，封輪並定期拍賣。

其次，是國內軍閥割據與戰亂所造成的危害。香港華資輪運業的主要經營範圍在廣東，但民國初期，廣東軍閥戰亂不已，極嚴重地制約了港粵航業的發展，如一九二三年初，滇桂軍閥入佔廣州，戰雲迭起，貿易被挫，商務受困，加以

軍隊誅求，盜賊横行，大肆擄掠，情形更屬不堪。當年省港民船貿易之貨價，約減三成。寶安縣境內，谷、蔗、花生等歲收銳減，小火輪經由九龍關所轄之各分關進出數目，只及平時之一半，噸數則約減少百分之二十四。西江一帶，政象之亂，接踵而至，各口岸貿易蕭條，同香港之間的航運幾經中斷。各江輪渡多因軍事被封船運兵，又有盜賊猖獗，常致鄉渡停擺，阻礙交通。當時《香港華字日報》曾有文指出，此種惡劣狀況，「半由於盜匪，半由於官軍，蓋盜匪之沿河勒收行水，與官軍之攔江設長卡，徵收護費，其擾民病商，實厥罪維均耳。」

第三，國際不景氣與各國高築關稅壁壘。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因受世界經濟危機和金貴銀賤的影響，各國運銷中國之貨物大爲減少。而美洲、南洋等地大肆排斥華僑，故華僑之赴國外，及中國貨品之輸出海外者，都已萎縮。加以廣東當局提高稅收，船用燃料價格猛漲。每艘輪船年中進塢修理所納費用增多等因素，華商輪船公司經營十分艱難。在經濟恐慌打擊下，航運同行相互排斥，大減船費以競相攬客。外商輪船公司所售香港至廣州客票，竟有低至一至三毫者，華商航業要想盈利則更爲闇淡。九一八事變後，舉國一致抵制日貨，日本在華南航運勢力衰退，而英商船公司卻趁機擴張。愛國同胞提倡國貨，香港所有舶來品極少運抵廣州，如洋糖和洋米運量遠不如往昔，海味一項，則完全絕迹。因

此，港粵航線許多華商輪船，非但無利可獲，甚至多有虧折，幾年間整個航運業都陷入低潮。

第四，日本入侵華南沿海香港，造成極大災難。抗戰爆發後，華南河道梗塞，香港航運業損失慘重。至一九三八年底，避難於西江之輪船，約有十餘艘，而被日機炸毀者，亦有約十艘，香港華人小輪商會遺留的輪船財產，僅得二成。停泊於西江之船隻，更無業可營。程船被中國政府徵用約二三十艘，其餘有的被日機炸毀，有的被戰火焚燒於海上，能僥幸保全者只剩十餘艘。餉渡業的主要營業爲運輸省港雜貨，其戰時損失達三分之二以上。

戰爭開始不久，日軍即封鎖珠江。直至其攻陷廣州、汕頭等華南沿海重鎭後，才於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日宣布局部開放珠江，限制中外船隻出入。又過了一年，省港澳的輪船才恢復航業。然而旋即爆發太平洋戰爭，華資航運業徹底遭受厄運。

最後，抗戰結束，港粵關係又陷於畸型狀態。戰後香港之商業地位，無形中成爲內運貨物的走私基地，走私劣風較戰前更烈。一方面是大量私貨通過各種非法渠道運入內地；另一方面，香港依賴內地供應之土特產，如米糧、生絲、桐油、桂皮、白銀等須經轉港以謀外銷之物，也因國內限制嚴而手續繁，莫不轉向走私之途。省港間走私貿易漏洞巨大，據估計，一九四六年由香港運入華南之私貨價値約四千萬美

元，由華南向香港走私出口的貨物價值約三千七百萬美元。到一九四九年，粵港間走私貨物，居然超過正當貿易額的一倍以上。

全面內戰爆發後，內地游資大量外逃，金紗黑布異常活躍，惡性通貨膨脹無法遏制，中國政府禁止港幣匯兌，停止入口結匯，廣州出口業務無形停止，造成粵港經濟交往正常道的鴻溝絕緣狀況，兩地輪船運輸業均遭受重大打擊。

一九四九年，華南社會秩序極爲混亂，官、兵、匪猖獗，勒索錢財，甚而封船逃海，內地船舶毀壞遺失及避往港澳者甚衆。這種情況雖然增加了香港華資航運業的船舶數量，但從全局來講並不是一件有益的事。

六、近代製造業的起步

香港是一個以華人為主體的社會，近代華資工業的崛起，形成不可忽視的力量，這對於香港乃至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都有着密切的關係和重大的影響。

清末產業初興

香港近代工業發軔於十九世紀中葉，最初主要是英資企業。如黃埔船塢公司（一八六四年創，資本銀三〇〇萬元）、怡和糖廠（一八七八年）、香港雪廠（一八八〇年）、蔴纜公司（一八八三年）、製鋼公司（一八八三年）、青州水泥公司（一八八六年創，資本銀四〇〇萬元）、牛奶冰廠（一八八六年）、太古糖廠（一八九四年）、中華電力公司（一九〇一年）、電車公司（一九〇四年）、太古機器船塢公司（一九〇八年創，資本額八十萬英鎊），等等。它們規模大，資本雄厚。但是，長久以來，英國人預期是使香港成為擁有良好港口設施與通訊能力的商埠，以便於英商在遠東地區進行貿易。因此，香港開埠後主要從事轉口貿易，形成了以轉口貿易為中心的產業結構。相對而言，英商在製造業方面的投資，比起為轉口貿易服務的

金融、航運、公用事業及海港建設等方面來，顯然要遜色得多。外資對香港製造業的介入始終不多，這種情況有利於華人資本展拓局面。

香港華商經營製造業起步較晚，大約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出現了以手工製作的企業，如萬隆糖薑工廠、同茂牛皮廠、和盛祥涼果廠等。到九十年代後，才有了少數機械化生產的企業，如藝新機器廠採用洋機，精造輪船機器及各款器具。大成機器造紙有限公司開辦於一八九一年。九龍隆起火柴公司約創於一八九三年，有資本三萬銀元。冠益食品公司，則有資本十萬銀元。這是幾家有代表性的工廠。

早期粵港華商合股在內地建工礦企業的事例亦較多。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何崑山（久居香港之粵商）已創辦了兩個礦業公司，各有資本銀十萬兩。一八八八年，又請准在廣東從化縣開採鐵礦、鉛礦，在陽山縣開採金礦。同年三月，他所經營的大嶼山銀鉛礦正式開工。何氏還與買辦唐景星，徐潤等合辦香山縣潭州銀礦，將之大嶼山銀鉛礦合稱爲天華銀礦，後因金不足而停辦。

一八九四年五月初，省港的華商組織了一家公司，並有集股章程，打算在廣州附近的鹽步鎮興建一座紡紗廠，初擬募股五十萬元，僱工五百人。但從後來的結果看，這個工廠並未建成。

二十世紀初，由於抵制美貨和收回利權運動的促進，中

國內地出現了設廠熱潮。同時，散布於美加、澳洲各地的衆多粵籍華僑，將本來的積蓄大量攜帶返鄉。據史料記載，他們「中有致巨富者，其資財先付香港存儲，漸用爲振興土木工業，如米油莊、繅絲廠等是也。」也正值此時，香港「商務日興，工藝蒸蒸日上」（一九〇五年）《香港華字日報》時評）

一批實力較爲雄厚的華資工廠誕生了。如廣生行化妝品公司始創於一九〇二年，僱工人二百餘名，資本八萬元；安樂汽水公司創於一九〇四年，資本額十五萬元；保心安藥廠也是一九〇四年開辦，一九〇五年，華僑簡照南、簡玉階兄弟與曾星湖等投資十萬元；創設廣東南洋烟草公司，僱工四百名；東亞織造廠是較早出現的華資輕紡企業，有資本二十八萬元；安樂園有限公司工廠創於一九〇九年，有資本四十萬元；廣萬隆炮竹廠創於一九一〇年，資本額十六萬餘元；一九一一年，利民興國織造有限公司成立；另有一家是從小呂宋移設香港的馬五山糖果餅乾公司，擁有資本二十萬元。

二十世紀初幾年間，香港成立的華資工廠數雖不很多，但每廠投資額相對較大，前面所舉的企業多爲以後各個行業中之佼佼者。

第一個發展高潮

第一次世界大戰及其戰後時期，歐洲工業衰憊，不但減

少了對中國大陸和香港的輸出，還需要從這裏購買產品，使香港華資工業獲得進一步發展之良機。一九三四年香港工商日報社對較典型的一百一十一家華資工廠作了一次全面調查。結果表明：這些工廠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是創辦於辛亥（一九一一年）以後，以每年開業估計之，最多爲一九二七年、一九三〇年、一九三一年。由此可見，香港華資工業在二十年代後期達到了一個高潮。從企業的生產水平而言，華資工廠普遍地逐步由手工業轉變爲機械化階段。

南洋烟草公司是一個很成功的企業，以「中國人請吸中國烟」的口號作宣傳，產品暢銷華南，並遠銷南洋群島，很受華僑歡迎。從一九一一年起，公司由虧損轉爲盈餘，營業不斷增長。一九一五年七月，在國內向北洋政府正式立案。第二年冬天，又在上海設立分廠，資本額增至一百萬元，雖日夜開工仍供不應求。一九一八年三月，簡氏兄弟將企業改組爲股份公有限公司，資本額達港幣一千五百萬元。擴大後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香港、上海兩地共設五廠，男女職工上萬人，成爲中國最大的華資捲烟企業。

馬五山糖果餅乾公司辦到香港後，於一九一六年注冊爲股份有限公司，收足股本四十萬元。此後幾年間，相繼在廣州、新加坡、上海、北京、天津設分行，並於國內通商巨埠及南洋一帶遍設代理處。該公司在香港的糖果、餅乾、玻璃器皿、機器等四廠辦有成效，擁有各種技術管理人才可供調

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集股一千萬（收足二百五十萬）元在上海設立中華國民製糖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國政府注冊。當該公司全盛之時，散布於海內外的各分支行有十餘間，僱傭男女工人一千六百餘人，年製造額約一百萬元。

特別是作爲近代產業骨幹的織造業訊即崛起，世界性的金貴銀賤初始也成爲有利因素，因爲它使得英國、日本棉織品輸入成價倍增，而南洋一帶經濟凋零，極有利於廉物美的港產布暢銷。在九龍半島，大小織造廠有如雨後春笋，一九三一年時達到四百多家（尙不計家庭工業者）約佔全港華資工廠總數的一半，成爲香港最重要的工業部門。

當時香港華資工業門類趨於完備，各行均有了一批頗具實力的骨幹大廠。

在織造業，有利國與民織造公司、周藝新織造廠、南華織造廠、競新織造廠、維新織造廠、果興織造廠、冠環球織造公司、三羊綢廠、聘成毛織廠、華達手帕公司、泳鵬手巾廠，等等。

在樹膠業，有大行樹膠廠、馮強樹膠廠、太平洋樹膠廠、新亞樹膠廠、香港樹膠製造有限公司等。本來廣州也有樹膠業，多與香港同行聯等密切，出品以華南爲市場（尤以運銷廣西爲多）。但香港樹膠業條件更有利，如馮強香港總廠部分製品可運銷英國及英屬殖民地，因香港各種原料價廉，利用低廉的人工，銷往英聯邦範圍又可享受免稅，這些

是廣州樹膠業所難同日而語的。

在化妝品業，有廣生行有限公司、百家利化妝品廠、先施化妝品有限公司、和平製藥公司、二天堂藥品化妝香品廠、三達化學公司、和記行粉莊，三鳳粉莊等。

在機器製造業，有藝興、協同和、粵生、廣生等機器廠，以及廣長興機器船廠有限公司。

在電炬業，有中華、星州電器、星光、眞光、日昇、南針、光宇、保羅等電筒電池廠。

在製藥業，有保心安、陳李濟、李衆勝、位元堂、回春閣、永華等製藥廠。

在出版印刷業，有商務印書館港廠、中華書局港廠、永發印務公司、亞洲石印局、天眞石印局、博文鑄字有限公司等。

在玻璃製造業，有明新、廣泰隆、廣興隆等廠。

在食品業，有淘仕大同罐頭公司、馬寶山糖果公司、嘉頓糖果餅乾公司、南昌糖廠、李話梅涼果廠、祥發罐頭公司、大陸商業罐頭公司、李成興魚露涼果罐頭廠，等等。原先經營興旺的馬玉山糖果餅乾公司，卻因公司置業過多，資金周轉不靈，於一九二五年四月收盤，不能不說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

在皮革業，有南華、壁亞、廣南、榮發等多家製革廠。

在貨品包裝業，有華益印鐵製罐廠。如英印花鐵罐廠、

昌興機器製罐廠等。

在文化用品業，有大華鉛筆廠、中華、國民、文化等油墨油漆公司。

在製帽業，有美和、中華兄弟、福昌、利華等製帽公司。

在建築材料業，有青山陶業公司及南華磚廠等。

在機器捲烟業，有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

其他各行各業還有很多，不勝枚舉。

三十年代前期的大衰退

一九三二年後，世界不景氣波擊到香港。英國政府宣布放棄金本位，匯率起落不定；內地遭受特大洪災，農村破產，國民購買力低弱，爲抵御經濟危機，各國高築關稅壁壘，金價高漲，原料昂貴，中國政府自一九二八年重新獲得關稅自主後，一再提高舶來品（包括香港華資工業的製品）進口稅率，無疑雪上加霜，日本則實行商品傾銷政策，香港爲無稅口岸，故直接受其打擊，且有橫被蹂躪之態。香港華資工業所面臨的嚴重局面由此可以想見。

儘管港廠出品，運銷英屬各領土，持有特惠優待入口稅率（一九三二年，在加拿大討論了英聯邦特惠稅協定，規定凡是採用英聯邦原料或勞工至少百分之五十的製成品，可以在英國及其自治領市場享受特惠稅的待遇。香港於一九三四

年加入該協定，對於其工業發展應是一個刺激），仍難免滯銷對停積。至一九三四年，香港經濟落入谷底，倒閉工廠達三百多家，造成華資工業史上慘敗的一頁。

受損失最嚴重的當屬織造業，短短兩年間即倒閉過半。其他如造船、機器、製藥等業，亦面臨嚴峻的形勢。如機器業大量裁減工人，二十年代時曾有二萬多職工，一九三四年時僅剩六千，華洋企業各佔其半。又如中成藥業，其生產受國內重稅之困，產量只及往昔的六成左右。

當然，各個行業的情況亦不盡一致，像糖果、製帽、電筒電池、印刷、膠鞋等業，工廠隨倒隨開，其消長之數，互相平衡。港製膠鞋因英、加市場較好，各廠均加緊生產，電筒電池因主銷場南洋一帶匯水低，各埠辦家紛紛定貨，故該行的廠家大都能夠盈利。

這段時期，香港正處在經濟蕭條的陰影之下，香港政府任命的經濟委員會抱比較悲觀的看法，認爲香港工業已不可能在現有水平上再有多大的提高，所以不能奢望依靠發展工業來恢復香港的繁榮。但是應注意的是，儘管此時華資工業的水平仍屬有限，可長期以來的投資積累已具備了一定的基礎。根據一九三四年香港貿易調查委員會的報告，華資工業部門的總投資至少有五千多萬港元，其中以製藥業和織造業所佔比重最大，分別達到五百九十四萬元和五百六十八萬元。其他如印刷文具、磚瓦、食品、膠鞋等業的投資額也都

在百萬元以上。

因此，香港華資工業的衰退只是暫時的，一旦海內外環境改善，它必定會很快得到恢復並錄得進一步發展。

第二個發展高潮

直到一九三五年，世界性不景氣的陰影散去，工商百業漸有轉機。香港政府實行統制外匯，港匯低縮，有利於工業品出口競爭，海內外各埠的辦貨者源源而來；日貨在香港市場受到匯水打擊，價高數倍；港府對法西斯主義的意大利實行經濟制裁，迫使意大利貨品在港絕迹。同時，南洋群島商務復興，國內僑胞去者日衆，市場購買力增加。中國民族經濟亦蒸蒸日上，國內銷場形勢不錯，對港製產品的需求較往年爲巨。這一切，又爲香港華資工業提供了快速進步的良機。

香港廠商終於走出了困境，大量接納生產定單，日夜開工，甚至連以前由於蕭條而停工者也陸續恢復舊觀。

許多企業擴建廠房，添置機器，增加人手，進入快速增長的年代。如民元霍機布廠多次擴充，廠房面積從八千平方呎擴至三萬平方呎，織機從四十部增至一百五十二部。三星織造廠擴充了五所分廠，廠房面積增加了三倍；永興電機織布廠連續擴建了兩家分廠，擁有各種機械二百餘台，一些大的企業每年的營業額超過了一百萬元。

此外，華強樹膠廠（資本六十萬元），月波織造公司（資本二十萬元），二友牙膏廠（資本近十四萬元）等一批大中型新企業又在不斷地創立。

抗戰初期，中國政府頒行國貨條例，海外僑胞亦極力提倡國貨，故國內外銷場均暢。規模宏大的抵制日貨運動，加以日本有部分工業因轉向軍需生產而退出競爭市場，這些情況都有利於香港華資工業。

由於香港置身於戰爭之外，其經濟地位更形重要，成爲戰時中國對外貿易的樞紐，同時也是英美援華物資輸入中國的一大轉運站，使香港的貿易盛極一時。國內殷商富戶逃避戰亂，紛紛攜款逃港，香港金融市場異常活躍，又形成爲金融樞紐。正因爲香港地位「保險」，遂變成上海，廣州等地民族工業大遷徙的重要選擇目標。

從上海遷港的企業，有大中工業社，中華無線電廠，中國植物油料廠，天廚味精廠，新亞製藥廠，同仁製藥廠，信誼製藥廠，家庭工業社，龍章造紙廠，蓋豐搪瓷廠，美亞織綢廠，譚泮記電池廠，燦華電器公司，粵昌和粵興照相卡紙公司，等等。據《星島日報》消息，僅一九三八年就有約二十家上海工廠遷移到香港。

新亞製藥廠和信誼製藥廠同爲上海製藥業兩大巨擘。香港新亞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是上海新亞製藥廠聯合港商和華僑於一九三九年初所創立，自建廠屋於九龍，在港島設

有營業辦事處。根據南洋市場所需生產新藥成藥，並販賣各種原料藥品，及推銷滬廠的出品。

滬戰打響後，上海美亞織綢公司即分移內地，並在香港、廣州開設分廠。為了便利戰時管理，在全國分為五區，各設區管理處，其中華南區管理處就設在香港。抗戰結束後，又改為各區分公司。港、穗工廠均保留，港廠擁有一百台電織機。

抗戰伊始，上海工商鉅子吳蘊初所屬天廚味精廠即赴港設分廠，投入資金二百萬元，規模相當宏大。香港淪陷後，該廠大部毀去，重要器材遷川，在重慶設廠。

戰時中華書局亦將機器設備運港，以擴充港廠的生產能力。當時，該書局在各地的業務頗為不振，惟港廠的經營尚佳。

據估計，三十年代末，上海企業家在香港的投資總額達數千萬之鉅，來自上海的資金和技術，滋養了香港華資工業，大量江浙工廠主的加盟，也是有史以來第一次改變了香港華商中幾乎清一色為粵籍人士的高純成份。

一九三八年十月。華南沿海失守後，廣州、廈門、汕頭等地的工廠大量過往香港。特別是廣州遷來了一批較具實力的企業，如捷和鋼鐵製造廠、大華鐵工廠、鄧芳記金屬製品廠、香島製漆公司、興華電池廠、鄧忍記機製牙刷廠、八達電機棉織廠、泰盛染織廠、吳義興電機織染布廠等。

抗戰前期，確爲香港華資工業發展期上的又一個高潮。首先，華資工廠的數量迅速增多。一九三六年，全港工廠數量爲五百四十餘家，一九三七年達到近七百家，一九三九年華資工廠總數已突破千家（不計其他未登記及家庭工業工廠約七八百家），創空前之紀錄。據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統計，僅加入該會的廠商即有四百餘家，工人十多萬。

其次，華資工業的門類更趨齊全。九龍工業區最爲典型，織造、樹膠、造船、機器、印製、罐頭、食品、電筒電池、化妝品等各行各業，工廠集中分布於紅磡、深水埗、鶴園等處，其陣勢頗顯壯觀。

從各業的發展情況來看，以織造業、五金業和樹膠業的增長最爲引人注目。在織造業，香港本埠新增設的工廠以及從內地過港復業的工廠，合計不下百家，而且多爲電機織布廠。在五金業，新增廠數非常多，如震亞五金製品廠、宇宙五金製品廠、中國公司製造廠、中美風燈製造廠、李琳明金屬製造所、寰宇機電製品廠等，都是由港商創辦的。該業又以手電筒業的發展最爲迅猛，戰前全港有電筒電池廠三十餘家，然而到了一九四〇年，則共有電筒廠三十餘家，電池廠二十多家，電珠廠三十多家，所僱工人多達三萬。在樹膠業，新增工廠規模大，生產能力強。如一九三八年創建的大陸樹膠廠，投資爲五十萬元，廠區面積三萬平方呎，僱工一千五百人，日產膠鞋一萬雙。其他還有巴力士，依依等新建

的樹膠廠。

某些屬於首創，填補空白性質的工業門類，如在電器業，由於缺少人才和資金技術，香港過去不能生產電機，無線電通訊設備，當上海燦華公司和中華無線電廠開辦港廠後，即填補了這方面的空白。又如在化學工業領域，一九三八年，上海實業家斥資數十萬元，在港創辦利群漂白粉製造廠，改變了香港織造業所用漂白粉須依類進口的狀況。上海吳蘊初和廣東實業家在香港分別創設酸碱廠，世光化學原料製造廠，能夠大量生產鹽酸、燒碱、漂白粉等化工原料。此外，香港雖早在十九世紀末即已出現過火柴廠，但卻未延續下來。一九三九年，汕頭民生火柴廠創辦人，實業家王永銘投資十萬元，創設香港火柴廠，生產「香港」及「抗戰」牌火柴。這一年，還成立了一家由內地和香港商人合資的火柴廠，改變了香港長期不生產火柴的狀況。

復次，華資工業的生產水平有相當提高。一九三九年歐洲戰爭爆發後，港製工業品有供不應求之勢，尤以英國方面需求量最大。因海內外銷場暢旺，香港華資工廠營業蓬勃，一九三八至一九四〇年間，每年產品出口總值（其中包括部分內地經港出口）均超過九千萬元，尚不算香港本身所消費者。從港製工業品在香港出口總值中所佔比例來看，也能充分地說明問題，一九三六年的比例值僅爲百分之三點一，到一九四一年，這個數字已升至百分之十二點一，有了大幅增

長。

華資工業的生產質量亦大爲提高，如電筒電池、膠鞋、化妝品、成藥、捲烟、包裝製罐、皮具等產品，在本港及海內外廣泛暢銷，享有盛譽。有些還在國際市場上具有強勁的競爭力。究其原因，一是這段時期內，香港吸取了來自全國的經濟精華，特別是上海、廣州大批富有經驗的實業家及熟練工人南下，有力地推動了香港華資工業技術水平上檔次。二是香港華人製造商的銳意進取精神。有關輿論指出：「過去日本利用其機械科學之進步，各種製品，在表面頗能吸引一般顧客，本港廠家有鑒於此，對於出產品，力求改進。」抗戰初期，香港每年均舉辦中國國貨展覽會，這固然表現出人們愛國觀念的深入，同時也反映華資企業家的苦心經營。國貨展覽會的規模逐年擴大，每次至少吸引成百廠家的貨品參展，其種類多至上千，產品製作之精美，亦令參觀者無不稱奇。當一九四〇年第三屆展覽會開幕，香港總督羅富國曾親臨參觀，所見令他讚賞不已，表示在此之前不知本港出品竟有如此之多，可見香港工業前途實在未可限量。

在三十年代後期香港華資工業的大發展階段，這座聞名於世的香港已呈現出轉變爲工業城市的曙光。當時，一些具有遠見的港商已經認識到香港走上工業發展道路的重要性。如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主席葉蘭泉在一九三九年二月中國國貨展覽會上致閉幕辭時，講道：「本港爲遠東商業中心，歐

亞貿易集散總匯，更爲華洋集處，交通便利。惜乎本港面爲運輸商埠，全靠中外各埠繁榮之望，倘各埠商業，稍有窒礙，本港即受影響，鄙以爲本港當道，應設法優待各工廠，勿太厲執行各例，使人樂於在港開設工廠，本港轉爲工業，將來出品日多，則本港繁榮可立爲待。」

黑暗時期

一九四一年下半年，由於蘇德戰爭和西方盟國在戰場上不利的影響，香港華資工業原料來源枯竭，經營上發生了困難。但在此之前，這些工廠大體上還是繁榮的，小型企業仍有增設。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很快便攻陷香港，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對外航運斷絕，香港工商各業均告停頓。華資各廠慘遭擄掠，損失慘重。如捷和鋼鐵製造廠所屬各分廠被敵軍沒收，損失達七百多萬元，李成興魚露涼果罐頭廠損失爲一百萬元，廣亞行，民元電機布廠，永華製藥廠等企業，損失均達數十萬元，香島製漆公司、香港商務印書館、日昇製造廠、泰盛染織廠、亞洲石印局、陳李濟港廠等，被敵軍佔據封用；金山織造廠，百家利仕化妝品公司等一大批企業，直接毀於戰火。

由於事前缺乏準備，香港戰役堅持時間過短，華資企業來不及作遷移打算，除了極個別廠主轉移了一些資金和設

備，基本上整個都落入敵手。在長達數年的日本統治時期，除了二友牙膏廠、海棠化妝品廠、甄沾記糖果廠等少數企業繼續經營外，絕大部分華資工廠都被迫停業。

至日本投降後的一九四六年統計，香港工廠數已急劇下降為三百六十六家，對外貿易基本處於停頓狀態。

產業重振

戰後初期，華資各廠雖經復員，但仍未能恢復元氣。因歷經浩劫，各廠人才、資金及設備都極感缺乏，與國內及南洋一帶的交通不暢，採購原料很困難，海外匯率低跌，香港埠內生活費用及用工薪值猛升，使工業產品成本昂貴。美貨廉價傾銷，席捲市場，走私泛濫，香港成為私梟之大本營，港粵間的走私貨物，竟然超過正當貿易額的一倍以上！這一切，都使得香港企業主難以擺脫困境。

據一九四七年南僑新聞企業公司編印的《香港工廠調查》，絕大多數華資企業都處於經營困難之中。如在織造業，冠全球，民元，謙信等衆多廠家生產較戰前相差甚遠，在印刷業，天眞、永發印務公司的營業只及戰前約三分之一。其他如三鳳粉莊營業額較往昔減低百分之四十，鄧忍記機製牙刷廠僅恢復營業百分之二十，捷和鋼鐵廠的設備及生產能力，遠不及戰前的十分之一。惟南洋烟草公司，海棠化妝品廠等少數企業，生產狀況較好。

對此，香港政府曾採取了一些扶助措施，如放寬原料入口的限制，准許廠商購外匯買賣工業原料，並以公價配給棉紗、橡膠、煤碳、帆布等物資。同時，中國政府亦實行撥助華僑工業復員方案，委託中國銀行香港分行舉辦復員貸款，規定每一廠家請求貸款數額以四萬港元為限。

隨後，由於南洋各埠定單增多，形勢逐漸好轉。截至一八四七年三月底，共計有九百七十八家廠商申請注冊，其中設於九龍者為七百三十五家。但此時仍屬恢復階段，新建企業並不多，新廠大者有香港烟草公司、中國公司果子廠等。當時全港華資工業所僱用的工人僅三四萬人，遠不及後者盛時的水準。

機遇很快再次降臨。由於國內爆發了全面內戰，形勢極為動蕩，迫使內地的人才、資金、設備等開始大量流往香港。一九四七年以後，上海、江浙一帶的大廠商紛紛南移，他們攜帶巨資，舉家赴港，展拓新的地盤。其他企業主也在作此打算，如上海永安紡機印染公司的資本家們在一九四七年便曾有過在港設廠的擬議，經過約兩年的反復討論，幾次搜集有關香港辦廠的工商業調查報告及剪報資料。一九四八年春，還具體進行了有關廠基勘察工作，並有將國外訂購之紡機，移港設新廠之建議。

華北等地也有工廠南遷，如天津東亞企業公司將下屬的毛衣廠和麻包廠遷至香港。據香港《華商日報》報道：「廣

州工業逃港也極洶湧」，涉及許多行業，爲數上百家。

戰後內地工廠遷港的方式，或是將國內的資金轉移到香港投入工業生產，或是將先前在國外訂購的機器設備轉運到香港，重新投資建廠。據香港《遠東經濟評論》估計，到一九四八年五月止，遷港的工業資金最少在二億港元以上。這時，香港華資工廠數目猛增至一千六百家，超過了歷史最高水平。華資工業擁有了較爲雄厚的實力，促進了香港社會經濟的繁榮，也爲五六十年代香港的加工貿易和工業化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當然，香港華商製造業之所以能在短時期內得到重振，它內部自身具有的特點也是不可忽視的。如華資工業以輕工業爲骨幹，多數企業規模都不大，基建週期短，投資見效快，積累也容易。它緊密依靠國內及海外華僑廣大市場，生產或轉產靈活機動，故適應環境能力強。這也是香港華資工業屢挫不衰，具有頑強生命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七、別開生面的百貨商業

百貨商業是經營日常工業用品的行業之一。世界上第一間百貨公司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開設於巴黎，分散的店舖逐向鬧市區集中，形成了商業街。百貨公司的出現，被人們稱爲「第一次零售革命」。從此，世界各地都仿效法國巴黎，開設百貨公司和商業街。

中國古時候稱經營日用手工業品的店舖爲雜貨舖，近代五口通商後，出現了京廣雜貨店，經銷傳統商品或仿製洋貨。香港華洋雜處，商業輻輳，車水馬龍，而撐持這種繁榮市面的，則應推百貨商業爲首功。

香港華商百貨行業

二十世紀初，華僑從國外集資到香港創辦大型百貨商店，採用股份公司形式，於是誕生了具備環球貨品或專售國貨的公司，以新的姿態表現香港。

在經營手法上，華商百貨行業效法西方商業的第一次零售革命，運用近代先進的經營管理技術，建立起優越的綜合性服務環境和設備，如在中國商業史上首創分櫃售貨、明碼實價、開票收款、定時營業、講究服務、重視信譽、綜合經

營、發放禮券、並開設電梯以方便顧客等，令人耳目一新。此外，還培養出一批高級商業管理人才，起到了示範和窗口的作用。香港是我國百貨商業的發源地，推動了全國百貨行業的建立和發展。

香港歷史最悠久，資本最雄厚，規模最宏大的先施、永安、大新等百貨公司，都是由中山籍旅澳華僑投資創建的，這類公司一般是由香港總店在廣州、上海分設聯號，再將分支機構遍布於國內各商埠，經營規模不斷擴展，終於成爲近代華人大企業之一種。

但凡經營華洋百貨業務，香港向稱繁盛，交易遍於中外，買賣周於四方，若論歸類，香港華資百貨企業大致可分爲兩種，即一是百貨公司，一是華洋百貨店。該行業組織有普益商會，入會的商肆，在抗戰前約有百餘家，著名的先施、大新、永安、中華百貨等各大公司均參加在內。此外，未加入普益商會者，大約也有百餘家，絕大多數都是門沽商肆。全行業營業統計，在三十年代每年約達五六千萬元。

百貨公司的經營內容十分豐富。有棉毛織品、絲織品、綢緞、呢絨、布匹、毛毯、暖水壺、搪瓷用品、廚具、化妝香品、鐘錶、五金銅鐵鎊器、鞋、帽、雨具、傢俬、鏡具玻璃器皿、磁器、皮具、文具用品、藥品、玩具、電器、罐頭食品、烟酒茶及各種日用品，琳瑯滿目。而洋貨店則範圍較狹小，只棉毛絲各種織品及某些日常用品而已。

香港百貨商業貨品的來源，早先大都取自外洋，所以在香港歷史上它又被稱爲洋貨業。一般商店多在本港各大洋行定貨，惟幾大百貨公司與各大商肆，是直接向外國廠商購辦，或專設辦莊在海外採購。大型百貨公司在上海、廣州等重要都市的聯號商店，所經營亦多爲舶來品，可直接從香港總店進貨 ，故兩者的聯繫非常密切，甚至資金都可以互相調劑。百貨商店裏充斥洋貨，這固然反映了中國民族工業的落後，市場必然被舶來品所佔據。但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以後，這種局面開始有了改變。隨着華人國貨意識的日漸高漲，歷次轟轟烈烈的抵制洋貨（主要針對日本）運動和華資實業的崛起，香港百貨公司的經營內容也相應地增加了國貨的比重。

香港華資百貨商業的推銷範圍，遠遠超出了港澳的界限。往內地則集中輻射到廣州、汕頭、北海、海口、廣西、雲南、福州、廈門等處。在地域比較遙遠的廣西、雲南、福建等省，則有各埠商幫在香港專事購辦的坐莊，其他有的則是通過寄函採辦。外銷的途徑，影響遠至安南、暹羅、星洲及南洋群島各埠。

先施百貨公司

我國的首家百貨公司醞釀成立於十九世紀末，那就是香港先施公司。

先施公司 1900 年初創時的商業廣告。（明報資料室）

一八九四年，華僑商人馬應彪從澳洲抵達香港，以港地設有不二價公司設立，引以爲憾。於是在一八九九年倡組先施公司，得到澳洲華僑蔡興、馬永燦、郭標、歐彬，美國華僑鄭干生等人的贊助，經過幾個月的籌備後，集資二萬五千元，公司終於在一九〇〇年一月八日正式成立。

「先施」之名，係由英文 SINCERE 一詞譯音而來，取「誠實可靠」之意。先施公司在港英政府注冊，起初規模很

小，形同一般的店舖。但其經售物品，多由西方輸入，款色新奇，吸引了不少顧客。開頭幾年發展頗爲坎坷，直到一九〇四年，營業才漸有起色，改組爲股份有限公司。同時又得到華僑陳少霞等多人的贊助，擴展經營，置業造樓，成爲具有規模的大型百貨公司。

清末香港人口不多，商品市場消費有限，而國內經濟發展較快，與香港相毗鄰的廣州是廣東省城，華南最大的都市，具有開辦百貨商店的優越條件。看準了這一點，先施公司的股東們決定在廣州創設聯號公司。

馬應彪、黃煥南（福建籍華僑）等籌資四十萬元投入廣州，一九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位於長堤的廣州先施公司開張。該公司資力較雄厚，經營商品範圍很廣，號稱「專辦環球百貨」，在內地首創「不二價」，開了風氣之先。除了百貨商品外，公司還兼營品茗室、酒菜部、攝影部、戲劇場，成爲當時羊城首家綜合性購物娛樂公司。一九一四年，又增添設備華麗的東亞酒樓。此後，陸續附設機器、五金、化妝品、汽水、皮革、木器、肥皂、服裝、鞋帽等加工廠，自製產品，都以「先施」作爲商標牌號，實行產銷結合，批發零售兼營，別具一格，蜚聲一時。爲了方便運輸，公司還在珠江邊上設有專用碼頭。

先施公司在廣州辦得很成功，經營不斷擴大，以後又在市內十八甫，惠愛路等處增設分部。加上公司在廣州兼營的

人壽、水火保險及信托業務，最多時曾僱用職工上千人。

先施公司在香港，廣州奠定了良好的經濟基礎，各股東更是力謀拓展經營，雄心勃勃地向中國第一大都市上海進軍。一九一七年，集資六十萬元的上海先施公司在熱鬧繁華的南京路落成開業，翌年其營業額即高達四百三十九萬元。馬應彪任滬行董事長兼監督，黃煥南爲董事兼正司理。上海先施公司仍以經營百貨爲主，並附設東亞旅店、東亞酒樓及先施樂園，爲公司招徠許多顧客和生意。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港、穗、滬三地先施公司會議決定：三家公司於翌年初聯合爲一個總公司，並在香港政府注冊，以香港爲總行，廣州和上海爲分行，由馬應彪任董事長兼總監督。當時公司共計擁有資本七百萬港元。

到二十年代初，先施公司的聯號已散布於港、穗、滬、叻、邕等埠。公司屬下還有幾個子公司，即先施保險投資公司（創於一九一二年，資本額一百萬元），先施人壽保險公司（創於一九二〇年，資本額一百萬元），先施香水製造公司（創於一九二〇年，資本額一百萬元）。至一九三九年統計，先施公司資本總額已達一千萬元。

先施百貨公司對我國近代百貨商業有着重要的影響，從華南、華東一直延伸到華北。天津中原公司雄踞北中國，其創辦人與先施公司有不解之緣。他們基本上是香港、上海先施公司的骨幹，有豐富的工商業經驗，但剛開始集資時資金

較少，在上海灘無力競爭，因而走向當時發展較晚的華北市場，經過一番拚搏，終於闖出新的格局。

眞光百貨公司

稍晚於先施公司，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五日，香港眞光百貨公司在港島中環大馬路新張，專辦各國新款洋貨，據稱是「務以貨眞而價不二，確乎童叟無欺婦孺均同」。該公司成立後，經營發展蒸蒸日上，一九〇七年九月十日，又在港島增開了一家分店。

眞光百貨公司有了一定基礎後，也往內地拓展。一九一〇年，創立了廣州眞光公司，是當地較有影響的百貨企業，由於與香港的關係，以後人稱「省港眞光公司」。

永安百貨公司

永安公司初發軔於澳洲之悉尼，名永安果欄，爲郭樂、郭泉、昆仲及其他旅澳華僑於一八九七年集資三千澳鎊所創。郭氏兄弟早期發展事業方針的重心放在商業，郭樂自述的《回憶錄》中寫道：「余旅居雪尼十有餘載，覺歐美貨物新奇、種類繁多，而外人之經營技術亦殊有研究。反觀我國當時工業固未萌芽，即商業一途亦只小販方式，墨守陳法，孜孜然摶蠅利而自足，既無規模組織，更茫然於商戰之形勢。余見我國，欲於外人經濟侵略之危機中而謀自救，非將

外國商業藝術介紹於祖國，以提高國人對商業之認識，急起直追不可。」他們辦永安果欄兼營雜貨，有一些經驗。特別對悉尼大型英商百貨商店很注意，據說常去暗中觀摹，學習一套資本主義的經營管理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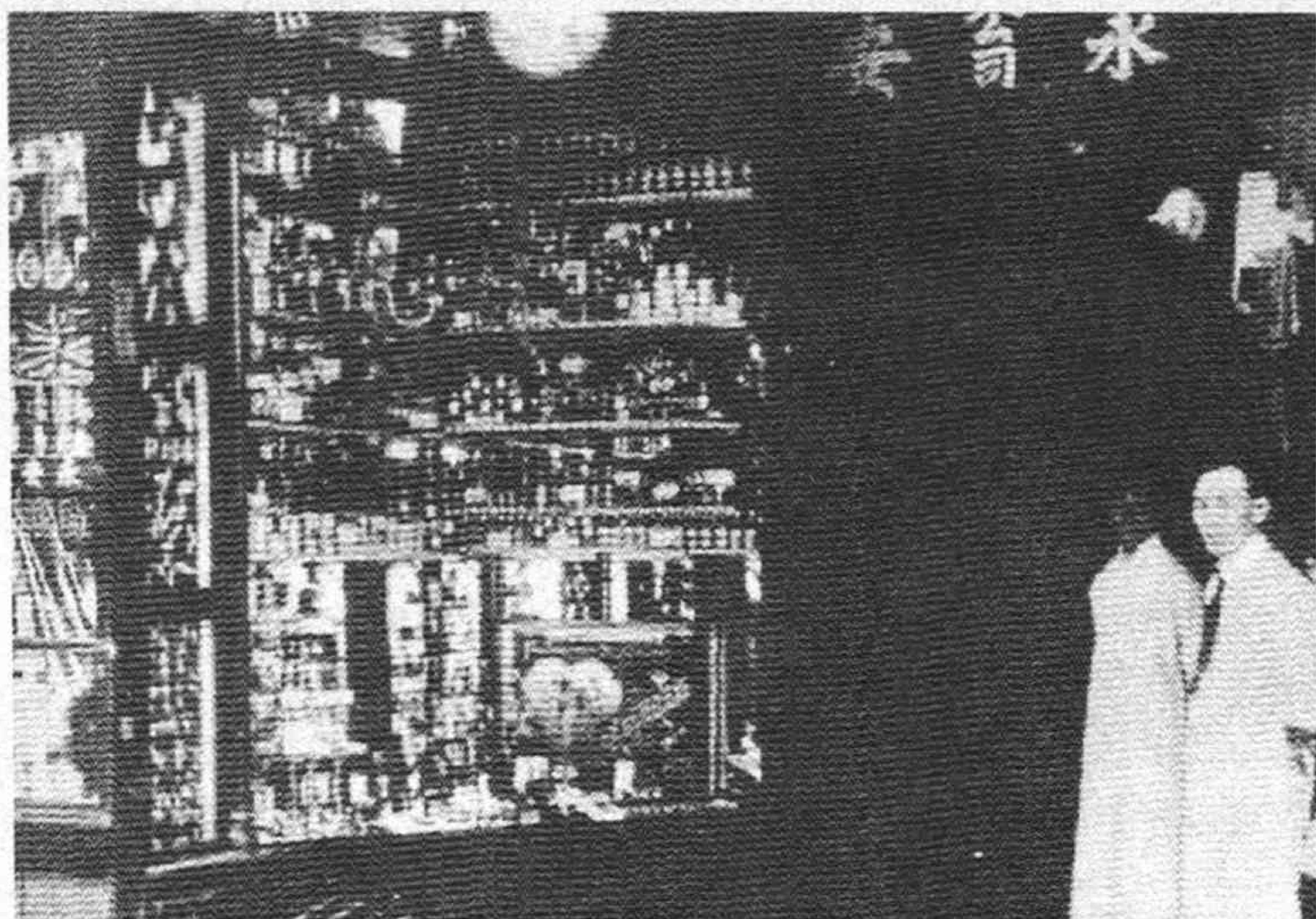
郭氏兄弟學習馬應彪，決定選擇向香港發展的路線。一九〇七年，他們募集僑資十六萬港元，公推郭泉歸國蒞香港，組織百貨商店，即以永安公司名之（有「永保安寧」之意，寓義於善頌善禱），選辦環球百貨，並兼營金山莊出入口生意。

永安公司初時僅有鋪址一間，規模極小。但其一開始即





永安創辦人郭樂、郭泉。（明報資料室）



一九〇七年的第一間永安公司。（明報資料室）

把經營商業和經營部分銀行業務（附設銀業部）結合在一起，憑借商業信用吸取僑資和社會游資的經營方針非常有利於企業的發展。由於經營得法，公司收入頗豐。一九〇九年時，基礎已確立，郭樂親赴香港，資本額增至六十萬元，舖面擴爲四間，組織形式亦由合伙改爲股份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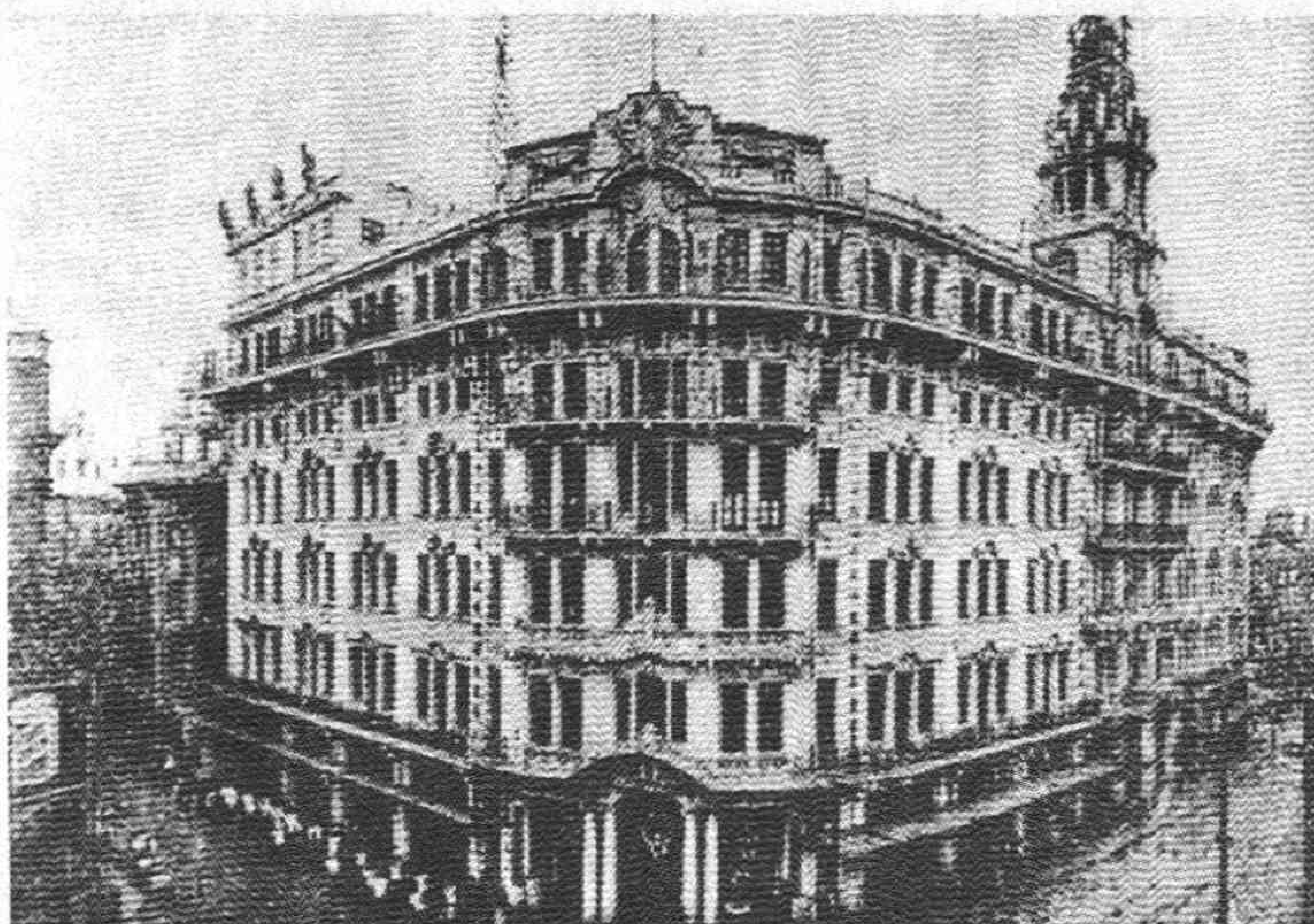
經過刷新後，永安公司業務蒸蒸日上，除了百貨公司和金山莊外，還兼營酒店、保險公司、織造廠、貨倉及房地產等。如一九一五年創辦香港永安水火保險公司，投入資本七十五萬元，在國內外各埠設分局或代理處；一九一八年創立香港大東酒店；一九一九年，又相續創辦香港維新織造廠和

香港永安貨倉；一九二五年，創辦永安人壽保險公司；一九三四年，創辦永安銀行。截至一九三〇年時的資料表明，永安公司資本總額已達四百萬港元，在短短的二十三年中，增長了二十五倍。

永安公司在香港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遂向國內發展。一九一〇年，在廣東中山石岐設立永安銀號，專營儲蓄和僑江業務。一九一四年，開設廣州大東酒店。一九一八年，永安公司勢力推進到上海，投入二百五十萬港元創辦上海永安百貨公司，附屬有上海大東旅社和天韻樓娛樂場等機構。上海公司開幕之時，全市爲之轟動。上海「永百」承襲了香港「永百」的經營方針，營業額大，利潤率高，自開業至一九三六年共十九年中，銷售總額折合港幣近一億七千萬元，賬面贏利額折合港幣約二千四百萬元，純利率爲百分之十四點一，資本利潤率平均每年高達百分之五十點四，十九年的贏利相近於原始資本的十倍。

香港，上海永安百貨公司及其各聯號都向港英政府注冊。在二十年代以前，永安資本集團一直是以香港爲經營中心，而且以商業資本的百貨系統爲主體。但當永安紡織印染公司成立後，它就逐漸擴爲商業、金融業、工商業交織的巨型企業集團。

一九二〇年冬，郭氏兄弟又發起招股，籌辦上海永安紡織股份有限公司，華僑踴躍認股，原定股額三百萬元很快即



上海永安紡織有限公司。（明報資料室）

認滿，旋又增至六百萬元。一九二二年九月，上海永紡正式投入生產。經過多年的擴充兼併，永安紡織印染公司已擁有五個紡織廠，、一個印染廠、一個發電廠、一家機器廠和一個大倉庫，有上千台織機和上萬名職工，成爲我國民族棉紡織工業中僅次於申新系統的第二大企業。

如此衆多的企業形成以郭氏家族爲核心的永安集團，其中上海永安有限公司是中國最大的百貨公司。在此之前，上海最華貴的商店是英商經營的惠羅公司和福利公司，然而當華資大公司開設後，這些外資公司竟然相形失色。

大新百貨公司

香港大新公司亦爲澳洲華僑所倡組，其創始人之一的蔡興早在一八九九年即參與了先施百貨公司的籌辦，不久其弟蔡昌也加入並曾任董事。蔡昌還與人合股在香港開辦小型百貨商店，但業務起色不大。爲了拓展生意，一九一二年，蔡昌在其兄支持下，聯合旅澳華僑集股四十萬元，在港島德輔道中鬧市區創辦大新百貨公司，並據「大新」之諧音取英文名「THE SUN」，以太陽爲商標，寓意旭日東升。經過苦心策劃，銳意經營，大新公司信譽良好，貨源充足，故生意日益興隆。

蔡興、蔡昌兄弟認爲廣州是粵省城及各縣出入之孔道，對此極爲重視。一九一六年，在廣州城內惠愛路開辦大新分店，附設酒菜部和遊樂場，在市民中樹立了影響。一九一九年一月四日，再添設廣州大新公司西堤支行，並兼營酒店業，內設設備齊全的亞洲大酒店。

廣州西堤大新公司依傍珠江岸邊，又居商業繁榮地段，環境優越。公司樓高十二層，頂上有大新樂園，爲當時華南最宏偉、華麗、花色品種最爲齊全的百貨企業。除經營環球百貨和酒店業外，還辦有遊樂場、理髮、照像、浴室及餐室等，論企業規模亦數當時廣州之最。在海內外影響很大，蔡氏兄弟的名聲也隨之遠揚環宇。

港穗大新公司生意興旺，資本很快即積累達到四百萬港元。遂仿效先施、永安公司，積極籌建上海大新公司。一九二九年後出現全球性的經濟不景氣，中國攻府頒布華僑投資獎勵辦法，蔡昌抓住時機，在華僑華人中集資六百萬港元（其中廣州大新公司佔股一百萬元），從港粵發展到上海。一九三四年一月，上海大新公司奠基。蔡氏兄弟經過對上海商情的充分探測，決定設店於南京路與西藏路之交角，地勢環境，極爲熱鬧。商店建築高十層，以外形優美、裝修宏麗、商場寬暢、設備新穎而聞名。室內裝有冷暖氣設備及升降機、進口電動扶梯，爲遠東地區第一部。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上海大新公司正式開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該公司經營有方，招數獨到，常常採用環球定貨（所售商品百分之六十以上爲舶來品），購物禮券，特定大減價、節日摸彩等有效辦法促銷，故其營業後來居上，經銷額曾排全國百貨行業之首位。

中國國貨公司

前面講了經過二十世紀初三十餘年的發展，中國民族百貨商業從香港興起，向內延伸到廣州、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先施、永安、大新等百貨公司爲同業中之佼佼者。然而，中國國貨公司卻是相反方向，是從內地發展到香港的。

清末民國初，由於中國積弱，民族工業落後，不能爲百

貨商業提供充分的貨源，故當時各公司均以舶來品爲主要經營項目。到二三十年代後，以「實業救國」爲宗旨，香港和內地的華資工商業有了長足的進步，尤其是中國人的民族自覺意識日益高漲，「中國人用中國貨」，更是國人共同認定的口號，由是中國國貨公司便應運而生。

中國國貨公司最早是誕生於我國工商業中心城市上海。一九三二年九月，正值九一八事變週年紀念日，上海「星五聚餐會」會員聯合滬上著名工廠九家，舉辦九一八國貨商場，陳列發售各種出品。顧客非常擁擠，爭相購買，證明了國人的愛國觀念。受此啓迪，翌年春，「星五聚餐會」會員創立上海中國國貨公司。初時資本僅有國幣十萬元，但營業蓬勃，認股者踴躍，旋即增至二十萬元，公司範圍逐步擴大。

當時，香港華商亦創辦了中華百貨公司，營業方針與其他百貨同行相同。華僑陳少霞擔任公司總司理，運籌帷幄，業務發展順利。

抗日戰爭爆發，上海淪陷後，遷徙到香港的內地實業家和銀行界鉅子，認爲有續前轍之必要，遂於一九三八年十月籌組香港中國國貨公司。經過約兩個月的短促籌備，當年十一月二十日該公司正式成立，得到香港華人界的積極支持，業務發展迅速，資本額很快即達到二百萬港元。以後，香港中國國貨公司又在九龍及澳門兩地，添設分銷市場，爲中國的抗戰事業作出了經濟上的貢獻。

八、內地商界的遷港潮

近代香港的居民絕大部分是來自華南廣東等沿海地帶。據官方資料，到十九世紀末，眞正香港出生、成長並久居的華人只佔極少數。如一八八一年調查十一萬餘名華人，其中只有三千七百人（佔百分之三點二）爲土生土長於香港者，直到一九三一年，華人居民（包括新界在內）仍有三分之二係居港時間不長的新移民。從清末到民國的一百多年內，曾出現過多次較具規模的內地人口，資產遷港潮流，這對於香港華商隊伍的成長和壯大，有着特別重要的作用。

第一次高潮

據英國殖民地部檔室，英佔前的香港約有四千人。一八四五年六月，港府華民政務司首次發表人口調查報告，其時港島共有人口近二萬四千人（內華人約二萬三千人），此時港島的開發稍具規模，但一切尚處於草創之中，無論生活環境、治安條件，還是商貿狀況都不理想。故這幾年內大量增加的人口，主要是以廣東前來謀生的男性青壯年，以滿足人力資源匱乏而又百業待舉的港島對勞力的急需。除了一些小商販和買辦遷入香港外，內地的富商大賈和英美等外國商人

大都持消極態度，正在等候觀望。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南部中國局勢發生劇變，爲香港的發展帶來了轉機。一八五四年，廣東在太平天國運動的影響下，爆發了紅巾軍農民起義，內地商業停頓，商民多有避往香港。在清軍和紅巾軍的反復撕殺中，大量人口逃港，於是香港人口呈直線上升之勢。據統計，在華南動盪前的一八五三年，香港島上華人總數不及四萬，至一八六〇年時，即已升直約九萬五千人。人們不斷從廣州府、潮汕、兩粵乃至浙江沿海四面八方湧入，這些移民中有不少攜帶資財、舉家前來的殷商富戶，形成了內地商民對香港的第一次遷移高潮。

殷商富戶新移民到達香港後，或買地開店或經商營利，爲香港的經濟注入了新的活力。更爲重要的是，他們具有豐富的商業經驗和經濟頭腦，將其在內地的關係網與香港是自由港、擁有發達的航運，便利的港埠設施等有利條件結合起來，成功地開闢了專門從事轉口貿易的行業，將香港變成遠洋貿易和中國沿海貿易的的中樞，促進了香港經濟的興盛。南北行和金山莊的相繼崛起，使華商成爲推動香港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連香港總督包令亦不得不承認，華商「影響本地商務者甚大」。當時的外國評論家也認爲，這是「香港發展進程的轉折點」。

十九世紀後期，隨着轉口貿易經濟的活躍，香港已成爲國內沿海商埠和北美、澳洲、南洋之間華洋貨物的集散總

匯，也是大陸居民移往海外的主要轉運站。南非行興起於六十年代，金山莊繼起於七十年代，銀號金融業開創於八十年代。這些標誌着潮汕、廣府、四邑地區商人勢力已在香港經濟領域中樹立了牢固的地位。一八八三至一八九八年，內地經香港出國者近一百萬人，同期內以海外返回香港和大陸的華人，每年帶到香港的財富估計在一千萬元以上。這爲香港華商資本的原始積累起到極重要的作用。

港島和九龍的商業大見增拓，爲適應港埠發展所需的造船修船，旅館及各種商行紛紛建立，內地人口源源而來。一八九八年，香港人口已增至二十五萬餘人（不包括後來統計的新界十萬人口）。

上海華商勢力也開始涉足香港。鴉片戰爭後，上海飛速躍起，很快便成爲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和經濟中心。港滬航線開闢於五口通商後不久，主要吐納北方貨客。滬商在港經營起初主要限於銀行，保險及醫藥等行業。如一八九七年，盛宣懷奏准滿朝政府部款並招商股創辦中國通商銀行，總部設在上海，在南北各大城市均有分行，其中香港分行開幕於一九〇一年二月，經營進出口匯票、電報電匯、物業按揭、銀兩交易及貨幣儲蓄等業務。上海永年人壽保險公司在一九〇〇年前後創設香港分公司，其「規矩通融賠償快捷，久爲工商重信」。其他還有上海中法大藥房、五洲大藥房等，也開設駐港經理處，從事經營。滬商雖不及粵商在港的

數量多，但其實力卻不可小視。

第二次高潮

內地商界第二次高潮發生於辛亥革命以後。一九一一年七月二十七日，粵海關稅務司梅樂和致函安格聯稱：廣州局勢嚴重，生意蕭條，許多富商帶着家眷去了港澳。武昌起義後，廣州形勢混亂，據報每天有成千的人往港澳跑。這年十月底，廣東民軍起義，闔省震動，富戶人家紛紛遷逃香港。

民國初期，國內軍閥割據，連年混戰，報紙時論感嘆道：「貧者感生計之困難，富者苦兵匪之蹂躪，自不得不為避地圖存之計，而以香港為宣洩之尾閭。」社會動蕩不寧，引發了一次又一次的商民遷港潮。

如廣州光復之初，社會秩序混亂，烟賭林立，劫殺案頻頻。胡漢民就任軍政府都督時，驚呼「全城官吏盡空，等於無政府」。一九一二年，有陳炯明部與粵省民軍的嚴重衝突。一九一三年，沿廣州河道盜劫案不絕，行旅息影。一九一六年夏，軍閥龍濟光軍與滇、桂「護國軍」在廣州連戰月餘，商業完全停頓，市民每日逃港者達八千人之多。驅龍成功後，新任廣東省長朱慶瀾曾專出告示，勸諭逃港商民回省復業。

一九二三年的情況尤其惡劣，粵省戰事連綿竟至一載，據《香港華字日報》記者報道：「富人多避港澳」。香港人

口的劇增也從側面反映了這個問題，按香港歷年人口統計表，此時全港華人數量已達八十多萬，比辛亥前增長了一倍。不過，若按《廣州民國日報》的通訊，香港的華人數量則更多。按其報道：一九二三年華人住留於港者，有六十八萬人，但翌年上半年已驟增至一百萬。一九二四年十月，廣州又發生商團叛亂，逃港者近八十萬，總計香港華人超過一百七十萬。也許記者對逃港人數的估計過高，但當時香港華人人口的確增長甚快，這也是事實。後一次人口大量遷港，因與商團有關，故可推定逃避者多爲商界人士。

還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即由於清末民初內地政局急劇變幻，許多腰纏萬貫的滿清遺老遺少、民國失意官僚政客等，也加入了新移民的行列。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許秉璋（清朝禮部尚書、閩浙總督許應騤之子），馮溥光（清舉人）父子、駱緒初（清四川總督駱秉章的後裔）、梁宦（前清朝駐美大使）、陳望曾（曾任清朝廣州知府）、陳伯陶（曾任清朝江寧提學使）、蘇志綱（清內閣中書、漕運總督蘇廷槐之子）等，擁有巨資，一切經營，如地產、銀號、南北行莊之類，莫不長袖善舞，獲利不貲。清末民初政界要人唐紹儀等創辦的上海金星水火保險公司和朱慶瀾，溫宗堯等倡辦的上海興華製麵公司，也在香港組建了分公司。

也有軍閥將搜刮的財富移到香港，當寓公並投資於經濟領域，成爲新富，如李福林，沈鴻英、龍濟光、陳濟棠等

人。一九一六年四月中旬，龍濟光的兒子龍運乾從廣州赴港，攜有六十萬元巨款，存入某外國銀行。七月二十五日，龍濟光密遣家人將貴重物件分裝六十餘箱運港。八月下旬，他更加緊趕運財物，並從台灣銀行提三百六十萬元，全部匯送香港。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陳濟棠宣布下野，當晚即向廣東省銀行提巨額白銀，乘英艦匿逃香港。

國內官兵匪與天災人禍互爲因果，使得社會經濟惡性循環難以抑制。政治腐敗，官史貪污。軍人跋扈，盜賊肆虐，社會秩序混亂，政府的治理能力極低。而英國統治下的香港卻顯得形勢比較穩定，故國內各地商民視香港爲「世外桃源」，蜂擁前去投資創業。如二三十年代，廣州石印業蓬勃一時，各大廠均增設香港分支行號，達到該業發展史上的黃金時代。織造業是香港最重要的華資工業部門，所用粗紗多取自滬產，該業在三十年代初漸臻發達，主事者多是來自上海。又如祖籍花縣的胡忠於二十年代介入當時還不甚發達的香港交通業，後來他的出租車公司擁有五六十部車，成爲香港運輸業之鉅子。

早期香港報刊上充滿了內地企業五光十色的商業廣告，僅據筆者所做的粗略統計，粵商於民初在香港新創建的企業即數以百計，滬商辦的單位雖沒有那麼多，但有些規模卻很大。如商務印書館歷史悠久，一八九七年由夏瑞芳等創於上海，民國初年，已在香港設立分館。一九二四年，又創設香

港分廠，從事印刷出版業務；中華書局香港分廠建於一九二六年，擁有資本五十萬元，全部機器都由上海總局撥付，上海聯保保險公司於一九一五年增設香港分局，投資額在一百萬銀元以上。中國精益眼鏡公司是國內第一家研製各種化學鏡片的企業，產品曾獲巴拿馬萬國博覽大會優等獎和中國政府農商部第一號褒獎，也於一九一八年在香港皇后大道開辦了分店。此外，像北京鹽業銀行、同仁堂、達仁堂、天津同裕堂，夏門淘化大同罐頭公司，梧州西江航業公司等國內著名企業，都在香港建立了分支機構。

可以說，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香港華商的來源構成已經擴大到全國範圍。

第三次高潮

此次遷港潮規模極大，從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全面抗戰爆發到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戰爭燃起香港淪陷區，共持續四年多時間。

抗戰前期的形勢給香港造成大發展的機遇，使華資工商業曾盛極一時。第一年戰事尚未直接擴及華南，省港通道變成戰時中國對外貿易的唯一孔道。香港置身於戰爭威脅的範圍之外，其經濟地位更形重要，不僅是中國外貿的樞紐，同時也是英美援華物資輸入中國的一大運輸站，其經濟繁榮超過了從前的黃金時代。

內地企業家、富商、官僚政客等，為躲避戰亂，紛紛攜帶大量游資抵港。僅珠江三角洲避往港澳的人口，估計一九三七年為十萬，一九三八年五十萬，一九三九年十五萬。由於大量人口抵港，使香港華人總數很快即升了一倍，一九三七至一九四〇年從八十餘萬暴增至一百六十四萬。香港華人的財富也迅速膨脹，從一九三八年起，內地資金逐漸匯攏於香港，據一九三九年非正式的統計，國人在港之存款達七億港幣，其中三分之一是在抗戰後增加的。另據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大公報》調查材料：內地逃港人群中，百萬富翁計有五百餘人，擁資千萬元以上者有三十人，擁資億元以上者有三人，這些人移居香港後繼續經營工商業。

香港華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榮狀況，與內地商民及工商企業的遷移補充確有密切關連，誠如當時香港西商會所分析指出的，以滬、穗為主的內地工廠和商行大量遷港，推動了本埠經濟的大發展。

首先掀起的是上海工商企業的遷港潮。八一三事變後，中國對外貿易重心，逐漸由上海向香港轉移，由是國內銀行遷港營業，為數益增。至一九三九年底，總計在香港的中外銀行已達四五十家。其中中國、交通、上海商業、中南、金城、國華、中國國貨銀行等，其總行都在上海，香港地區所設為分行。當滬戰爆發時，上海資金已有流港之徵象，到上海淪陷後，眾多高等難民遷港作寓公，他們的存款也有轉移

到香港，據《中行月刊》發布的金融消息稱：「上海資金源源流港」，這種情況，使香港金融界「市道極佳」。

在商業方面，原上海中國國貨公司在香港的實業家和銀行界鉅子，於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發起成立了香港中國國貨公司，總店和分店設於港島德輔道中和九龍上海街。戰前香港洋貨匹頭綢緞業不景氣，全行業僅剩十餘家商號，迨一九三八年由上海遷來營業者有四五家之多，生意均平穩。設在皇后大道中的老介福綢緞莊爲上海綢緞總匯，集中銷售上海各名廠產品，時新紗羅綺綃，花色品類達幾千種，且每天均有貨色運抵供售。

除了銀行和商店外，遷港數量最多的當屬工廠主。滬戰爆發後，成百的工廠內遷往遙遠的西部地區。但有些企業家開始並不打算把生產重點放在內地，總認爲香港是英國屬土，不至於遭受戰事牽連；而且香港經濟較發達，交通便利，港滬之間一直有較密切的經濟聯繫，辦廠條件遠勝於內地；況且香港還保持了與內地相通的物資搶運路線（如由淡水、河源可接通廣東戰時省會韶關，由湛江經玉林可通往廣西柳州；由越南海防轉滇越鐵路可至昆明），同陪都重慶的空中聯繫亦保持暢通，等等。在此思想指引下，有不少上海廠商將企業向香港轉移。

工廠轉移的方式多種多樣。第一種是在香港設立分行分廠，這一類數目比較多。如大中工業社於一九三九年在港分

設針廠、鈕廠及釘廠，大量生產各種優良鈕扣和縫紉鋼針，運銷於國內、南洋及歐美一帶。中國植物油料廠所營業務，以桐油為大宗，上海淪陷後即在香港九龍加設廠處，以便繼續出口貿易。在香港德輔道集中了一批上海製藥廠的分廠，有施德之藥廠、科發大藥廠、雷天一六神水藥行、新亞製藥廠及同仁製藥廠等。

第二種是將資金和設備投入香港，或在港設辦事處及發行所等，以擴充業務。如中國化學工業社以製銷三星牌各種日用品而著名，戰時在香港乍畏街設發行所，推銷「牌子最老、品質最高」的三星系列產品。上海世界書局「為推廣戰時文化、實行戰時服務」，於一九三七年十月在港島設發行所，拓展營銷。大業印刷公司把一部分機器從上海運到香港石塘嘴。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王雲五親主持港局事務，並將上海的機器大部分運到香港，使該館的生產一時都集中到了香港。上海五洲藥房在抗戰初損失慘重，貨源不足，生產困難，曾依靠香港辦事處採購原料，並在港開設工場，製銷「人造自來血」等本牌產品，維持東南亞市場的需求。

第三種是將總行總廠盡遷香港，但從現有史料來看，這類情況比較少見，大約有潭泮記電池廠，電器製造燦華公司等。上海壽世藥室總行遷港後，因生產旺盛，一九三九年又擴充營業。

滬商在香港投資辦企業的情況也較多，如一九三九年就

在九龍開設了織綫廠，廣告印刷廠等六家大工廠。

上海工商企業的遷港潮推動了香港華資工業技術水平的提高。據一九四〇年六月一日《星島日報》報道，由上海來的技工擔負着各項熟練的工藝操作。不少上海企業遷港後，成爲同行業之佼佼者，如吳蘊初投資的香港天廚味精廠於一九三九年建成投產，擁有先進的生產設備，年產味精達十萬公斤。由滬遷港的新亞，信誼等藥廠，以新科學方法製造產品，被公認爲是「香港新藥廠中之錚錚者」。上海新亞製藥廠具有全國影響，一九三七年底，許冠群總經理因上海形勢險惡而赴港，創辦香港新亞化學製藥公司，擁有資本三百萬元。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舉行隆重的新廠落成開幕典禮，各界要員名流如錢新之、葉琢堂、宋漢章、李福霖、徐永祚、王曉籟、貝祖詒等前來題詞作賀，熱鬧非凡。

廣東工商企業的遷港潮繼之於後。粵港間有着特殊密切的經濟關係，抗戰初期廣東企業遷港具有與上海不同的一些特點。第一，時間上稍晚。抗戰伊始，許多企業主認爲華南靠近港澳，地理位置特殊，日本不至於會入侵、故未準備遷徙。直至廣州等地淪陷後，他們才匆匆逃往香港，於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間，形成廣東工商界遷港之高潮。

第二，規模宏大，涉及面寬廣。廣東遷港企業包括機械、抽紗、食品、金融、小五金、製藥、火柴、草蓆、製漆、電筒電池、餐旅、印刷、炮竹行業諸多方面。據《星島

日報》記載，廣州淪陷後，織造廠紛紛遷港繼續營業，使全港織造廠多至數百家、出品以汗衫、襯衣、內衣、手帕、土布、線襪、毛巾、牀布等爲大宗，總計一九三九年出口總值達三千多萬元，爲香港最大宗之出口貨。廣東製藥業歷史悠久，產品精良，馳名國內外。自省城失陷後，爲便利海外僑胞購辦起見，多遷港營業，並成立了廣東國藥聯衛社駐港同人機構。

第三，控制了香港的多種行業。例如：廣州大華鐵工廠，有資本額一百萬元，自一九三八年遷港重建，至香港失陷前，一直承擔中國政府，港英政府軍用物品的訂製任務。它與自穗遷港的的捷和鋼鐵製造業，協同和機器廠等一起，構成香港機器製造業之骨幹。八達電機棉織廠於一九三八年由廣州遷港，其機械設備在香港同業中堪稱一流。泰盛染織廠香港分廠面積二萬平方呎，有電力織機八十台，染機五台及其他附屬設備甚多。吳義興電機織染布廠港廠創於一九四〇年，佔地亦有二萬平方呎，機器設備價值幾十萬元，僱用職工二百多人。香島製漆公司係由原廣州通用油墨油漆廠主伍澤民創辦，佔地八千平方呎，設備優良，享有盛譽。粵港聯號藥行則控制着香港成藥市場，早在清末民初，馬伯良、敬修堂、梁培基、梁財信、李衆勝堂、陳李濟、保心安、唐拾義父子藥局等許多粵省著名老字藥行，即已在香港建有衆多聯號。一九三八年後，又有相當多行舖遷港發展，如生昌

泰、羅芝庭、集蘭堂、梁濟時、楊覺庵、恆春堂、何熙明愼德堂、吳壽春堂、潘高壽、滑濟藥行等，都在港經營興旺。宏興藥行港行、何明性堂港莊、集蘭堂港行及善德堂何潘濟藥廠等，都曾在報刊上登載廣告擴大營業門面，增加製銷。

可以說，抗戰初期以滬粵為主的內地工商界遷港潮，對香港經濟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引起了社會各界廣泛的注意。一九三九年，香港政府華民政務署勞工處發表的年報稱，內地各戰區企業紛紛移港設立。「實爲去年中之異象」。一九四〇年，《星島日報》的報道亦稱，由於內地工商界的遷移，促使香港華資經濟「大見蓬勃」，各行經營均「異常發達」。

第四次高潮

抗戰的硝烟剛散，接着又爆發了國共全面內戰，香港再次獲得內地人才，資金和技術設備的大量挹注。

首先，香港人口大增。在日本佔領的短短三年多時間內，香港居民不幸死於戰火或被迫「疏散」者約有一百萬，一九四五年八月，全港人口僅存約六十萬，但日本投降後，原香港居民紛紛返回，又因大陸局勢動蕩不安而有大批人員進入香港，故總人口急劇增長，一九四七年時已達一百八十萬人，超過戰前歷史的最高紀錄。這其中包括了爲重建香港經濟所急需的各種人才及豐富的勞動力資源。

其次，內地豪門、富商巨賈攜資遷港。內戰時期，粵港成爲大陸游資逃逸的通道。國民黨統治區資本的南移和外流，萌生於一九四六年，這與內戰形勢的演化密切關聯。隨着國民黨軍在北方戰場上頻頻失利，在政治、經濟界彌漫着失敗情緒。游資移動路線亦由關外到關內，再從各處匯攏到滬、穗，最後抽逃到港台或國外。惡性通貨膨脹，也是引起國內游資泛濫的重要原因。白銀滾滾外溢，一九四六年，由廣州私運到香港的白銀估計價值四百萬美元。一九四七年初，北方巨資紛紛匯往廣州搶購黃金和外匯，國民政府雖頒布了《匯入解款限制條例》，亦無濟於事。四月中旬，游資到港高達四百餘億法幣（按當時外匯匯幣折算，大約相當於一千二百多萬港元）。據聞此後幾年內，從內地流入香港的資金約達五億美元。

復次，內地各大商家都準備遷港經營。大規模的企業南移發生於一九四七年，仍以上海和廣州兩地爲主。到一九四八年，遷港工廠已涉及棉紡，織布、絲綢、化工、樹膠、印刷、五金、搪瓷、毛織、麻包、火柴等許多行業。上海花紗業遷港有二十餘家，其中較具規模者有七八家。此外，內地華商所創辦的大新銀行，中國聯合銀行，南洋商業銀行等在港陸續開業。潮商再次大量湧入香港，如廖寶珊創辦了廖創興儲蓄銀行，陳偉南成立了星洲貿易公司，林百欣家族組建了麗新製衣公司。又如港商鉅子安子介，爲浙江定海人，一

九四八年赴港從事紡織業，其南華實業有限公司以後成爲香港同行中的龍頭老大。此類事例還有很多。在一九四九年第一季度申請登記設廠的企業家中，設有百分之六十係由內地遷來。

正是得益於及時融入內地各種資源，香港華商才得以較快地擺脫戰後初期蕭條的陰影，並爲以後的經濟起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由此可見，近代香港華商的成長與壯大，與內地移民和企業、資金。設備的源源挹注有密切聯繫。近年來，對香港歷史頗有研究的學者也認爲，近代幾次來自大陸的移民潮，帶來大量的勞力、技術和資本，這些「成爲香港經濟發展的基本因素」。也可以說，正因爲有此特定的親緣和地緣作鈕帶，使香港華商對於中華民族始終保持着「血濃於水」的情緒。

九、中西合璧的經營管理

香港是一個中西交滙的地方，華商在艱苦創業的過程中，既沿襲了中國傳統的經營作風，又注意博採西方近代管理模式，把兩個方面加以融合，在事業上取得了相當的成功。

華商資本結構

從資本的來源分析，近代香港華資企業基本上是由三部分構成，即內地華商、本港華商以及海外華僑的分別投資，其中尤以粵籍商人和買辦的投入比重為大。香港華商的形成有明顯的地緣性，根據對大量企業廣告內容的梳理，可知其相當多數都與廣州及其附近區域的工商界有直接聯繫。取得事業成功者，也以粵籍人士居多。如吳醒濂於一九三七年出版的《香港華人名人史略》所列工商人物中，查其原籍為廣府和潮汕籍者，至少要佔百分之九十以上。民國時期的幾次過港潮，使港商中的上海籍成份也大為增加，相對而言，內地其他省區所佔比重很小。

外資滲入華商企業的情況很少見，這與英國在香港的投資特點有關。因為英國只重視掌握傳統的有重要意義的企

業；如遠洋貿易、金融、保險、公共事業和部分製造工業，其餘的「次要行業」則任由華人自由經營，並不直接插手也不企圖向新的企業部門發展。據虎視眈眈的日本人觀察，認爲「這正是反映了香港英國資本的保守性和停滯不前的一種傾向」。

特別是華資工廠的概念很明確，即如香港國貨廠商聯合會向中國政府呈文所述：「僑商等雖然易居香港，但所營工廠，完全華人資本，華籍工人。」因此，華資企業在性質上可界定爲國貨商。一九三三年，中國政府提高關稅進口稅率後，曾引起香港國貨廠商的減稅運動，幾度派人返粵，籲請改善稅率，以體恤港製國貨。當時香港廠商，每有將出品貨物在港注冊者，貼上「中國製造」等字樣的商標，以利於運銷有關商埠。但與香港當局制訂的商標注冊條例相抵觸，故一九三六年，香港出入口署監督特籲新規，稱如遇有轉貼「Make in China」等商標字樣者，將立即取消其在港注冊之商標。在殖民主義統治下的香港，華資企業處於兩難的境地。

香港華資企業的組織形式，具有幾種類型。一種是「私人企業」（獨資）或無限公司，爲數不少。在一九三四年調查的小廠中，標明屬於此類的即有四十五家。在其他資料裏，大致也反映了類似情況，應該說在爲數衆多的小型企業中更是如此。

另一種是合資或股份有限公司，應屬潮流（包括獨資企業如安樂園、百家利、馬五山糖果餅乾公司等的轉變），這類企業符合近代經營規範，故其資本額，機器設備狀況、營銷額等項指標都較清晰。大中型企業多採用這種組織形式。

然而不論哪種類型，家族勢力都起着極重要的作用。如陳李濟藥行由明朝末年傳至民國，由陳、李兩大族人共傳了十二代。源吉林號始終是源氏家族的財產。梁財信、洪桂昌、榮孫氏、鄔福至堂、永安堂、先施公司、永安公司、大新公司等，都是由父子或兄弟相繼爲業。許多企業領導層都屬同姓，如柯應李、柯德昌父子分任香港汕頭花邊有限公司總經理和經理；許冠群、許冠英分任香港新亞製藥廠總經理和司理；鄧兆樞、鄧兆璋分任廣東兄弟樹膠公司港廠正副經理；黎伯敏、黎景殷昆仲合資經營光宇電池廠；關蕙農父子四人分任亞洲石印局總監督和正、副經理，……等等，不勝枚舉。其他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嘉倫兄弟織造廠，龍溪兄弟織造廠，中華兄弟製帽公司，唐拾義父子大藥局、易沃林父子藥店等，僅以其名稱即顯示出濃厚的家族資本色彩。

此外，過去香港許多商行，店舖的招牌，也是承頂內地業主世傳的字號來經營的。如陳李濟藥行、保滋堂潘務庵藥行、馬百良藥號、三多軒牋扇莊、何正岐利成記刀莊、朱廣蘭烟絲號、源和顏料舖、鄭天福銀號、張廣源罐頭食物莊等，都是源遠流長，享有盛譽的老字號招帖。

家族式企業的經營有其特點，即講人治，重感情，不主張職員組織工會和活動，而由企業主動關懷體貼，提供福利，極重視血緣和地緣關係，重要的職位都由有此種關係者擔任，當合伙經營時，合作伙伴亦多選擇親友、同學及同鄉等。

從企業的規模來講，華資企業絕大多數都是本小利少。由於其很多屬於家族資本或私人資本，故很難準確有效的調查統計。連善於搞企業情報的日本人也無奈地承認，「由於香港華人資本採取近代的投資形式活動者極少，大部分都採取匿名聯營或者個人事業的形式進行活動，所以打算看到在香港的華人投資的全面數字是比較困難的。」一九三四年香港工商日報社曾對華資企業作調查，多以其「爲無限公司，故資本額不詳」而打住，這次調查雖不詳盡，但仍可爲我們的分析研究提供基本的依據。當時全港華資工廠約有六百餘家，而按調查資本額在五千元以上者僅一百一十一家，這說明了華資企業主以本小勢弱者居多。日本人的調查也可佐證，認爲香港除了造船業較發達外，工業以輕工業爲主，而且多是中小工廠，織維工業、雜貨製造業和家庭工業佔有絕對優勢。

例如，香港織造廠常有幾百家，而其中較大者僅二十餘家，機器廠號約二百戶中，稍具規模者寥寥無幾；電筒電池業和製餅業旺時各有上百家，但大者分別只有十餘家和三四

家。倒是企業數較少的行業或比較新興的行業，如罐頭、膠鞋、搪瓷、化妝品、製罐、玻璃、製漆等業，大中型企業比例較大，較多使用機械生產。

就每廠擁有的資本額而言，香港華資工業應高於國內民族工業的水平。如一九三六年中國三十人以上的工廠，平均資本為國幣十四萬元；而一九三四年調查的香港華資百餘廠中，三十人以上，資本額也清楚的有六十七家，資本額共計一千六百萬元，平均為二十四萬港元（抗戰前國幣與港幣的比率較接近）。戰前廣州共有新式民營工廠三百四十七家，資本額國幣一千餘萬元，兩相比照，可以說香港華資工業的實力更強一些。



戰前的鴉片烟商標。（明報資料室）

華資企業資本投入的規律大

體是：早期創辦者投資額相對較大，像廣生行有限公司、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馬五山糖果餅乾公司，利國與民織造廠、永發印務公司、先施化妝品公司、陶氏大同罐頭公司、大百貨公司、銀行、保險、航運等公司，資本額都有幾十萬乃至上百萬元，是有較大影響的企業。但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後創辦的企業多了，資本金也分散開去，很少再出現投資額巨大的企業，倒是在抗戰初期，從內地遷入了一批大型企業，如來自廣州的大華鐵工廠，捷和鋼鐵製造廠等，資本額超過一百萬元。上海遷港的天廚味精廠、新亞製藥廠等，投資額更是高達二三百萬元。

華資工業生產水平

自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香港華資工業開始由手工製作向機械化轉變的過程，不斷有企業（甚至有些是家庭工場）進入機器生產，如濟隆糖薑廠、甄沾記糖果廠、龍溪兄弟織造廠等。到抗戰以前，機器使用已經普及，人們樂觀斷言道：「手工業迅而成為歷史陳迹」。儘管如此，在傳統的行業領域，仍較多地保留了手工生產、連具有一定規模的企業，如萬隆糖薑廠、廣萬隆炮竹廠、汕頭花邊公司、回春閣中藥丸廠、福安鞋廠、同益牛皮廠、李善記涼果廠等，幾乎沒有使用機器。既使在最重要的織造行業，手織機仍在盛行，羊毛織造廠所用全為手織機。因此，可以說近代華資企

業中，機器工廠與手工作坊並存，在當時，人們所指廠也並未嚴格限於機器生產，似乎也無明顯的最低資本限額。但可以斷定，隨着時代的前進，採用先進生產手段，規模宏大的企業越來越起着經濟主導的作用。

華資工廠所使用的機器主要有三類：一是洋機，比較先進，生產質量效率都比較高；二是滬機，如三羊綢廠、三光布廠，中光電機織布廠等，都是洋機，滬機各佔其半；三是本港自製機器，當時已出現了一批使用機器並頗具規模的企業，如利國興民織造公司機器價值三十餘萬元，年營業額五十萬元，金山織造廠有織機四百餘台，最多時僱工一千五百餘人，年營業額二百萬元，馮強樹膠製造廠使用最新機器，旺時僱工一千五百人，年營業額七十餘萬元，大華鐵工廠有各式機牀上百台；中華製漆公司採用新式機械，出品彩漆數十種；南針電筒廠和光寶電池廠擁有大小機械上千台，等等。

華商企業還出現了商業資本和工業資本融合的集團化趨勢，永安公司的發展即是一個典型。郭泉在其《四十一年來營商之經過》中寫道：「一九三二年香港永安公司營業最盛之時期，各戶附項共有二千六百萬元之鉅，除爲滬公司及紗廠提用及購買物業外，另存相當現金，存戶之踴躍，可概見矣。」聯號資金是一條把永安集團內部的商業資本和工業資本聯繫起來，相互利用、相互推展的紐帶。永安公司在企業

的組織和經營管理方面，比當時中國最大的紡織工業集團申新公司進步和現代化。申新是股份無限公司，永安是股份有限公司，申新是各廠分權制，永安是中央集權制。

永安集團取得成功的原因在於：一是聯號的互相協助，如永安紗廠是由母公司投資創建，在其處境最不景氣時，又靠聯號內部調劑資金，不但渡過難關，還兼併擴充至五個廠。永安下屬的香港維新織造廠所需棉紗完全由上海永安紗廠供應。二是組織的健全，永安雖爲有限公司，可實權是操於郭氏家族之手，以郭樂爲重心，弟兄子侄分掌各部門的業務，大體上保持了各房之間的利益平衡，團結而無內爭。在組織系統上，採中央集權制和部門負責制。如永安紗廠在總、副總經理之下，又分設業務經理和廠務經理；各廠設廠長、參事（相當於副廠長）、總工程師，職權劃分清楚，素有效率。三是經營管理的科學化，郭家子弟大都送出留學，習用西方經營管理方式。

香港華資企業的原料完全要仰給於世界各地，香港毗鄰中國大陸，是英屬領地，又是無稅口岸，這些條件有利於其獲取各方面的廉價原料。總的來講，香港大多數工廠要採用外國的原料，但各行業情況也不盡相同。在織造業，手織機及港製機器只適於織粗劣之紗，故粗棉紗多爲上海出品。其他原料則須依賴舶來，如電光紗、線仔紗爲英貨，人造絲爲意、荷貨。在綢緞裏，所用生絲取自廣東和蘇州。多數廠家

的原料來源是多樣化，如冠全球織造廠原料採自中、英、印、日等國；和興織造廠、金山織造廠原料取自澳、日、英、印、滬等處。有少數廠完全採用國產原料，如維新織造廠、龍溪兄弟織造廠用紗均採自上海永安紗廠。

在其他方面，樹膠業所用橡膠、帆布等原料大都購於馬來亞和英國，化妝品業原料如香料、化妝油等，大宗採自海外；捲烟葉原料是內外皆取，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所用烟葉主要靠山東、河南供給，省港烟草公司則多採用美國原料。機器製造、玻璃、製漆、餅乾、糖果、製帽等業，原料以取製國外爲多。而中成藥、炮竹、皮革、搪瓷、榨油、罐頭、糖薑涼果等業，則基本上取用國產原料。

在太平洋戰爭以前，香港華資企業的資源獲取比較便利和充足，因而得到迅速的發展。但在四十年代，海內外交通滯塞，社會金融未能安定，原料供給不繼甚至中斷，價格猛漲，遂成爲制約華資工業生產的一個嚴重問題。

華資企業的經營效益

一般講，華資企業都能維持賺取一定的利潤，當然要視各個時期和不同企業的情況而有所區別。經營效益從總體來講，表現不太穩定，特別是易受到國際環境和國內局勢的影響。

企業的最佳經營時期分別爲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和三十

年代末，最困難則是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前期和日佔期間及戰後的一段時間。

由於世界性經濟危機的波擊，一九三四年前後，香港經濟大受損害，最慘重者爲織造業，連規模宏大及組織健全之企業，亦難以維持。大量中小工廠倒閉或歇業，能開工者生產也大爲萎縮，如同茂牛皮廠、和盛祥涼果廠、萬隆糖薑工廠、廣南源皮革廠、廣興隆玻璃廠、詠鵬毛巾織造廠、南華錳鉛製煉廠等，年營業額都減少了一半以上。大批工人被解僱，如東亞、全興、南華、竟新等織造廠和嘉頓糖果餅乾公司，裁減工人均超過一半，壁亞皮革廠工人僅留職十分之一。直到一九三五年後，國際性不景氣消失，經濟逐步恢復，香港華資企業終於渡過難關，重新振作起來。

抗戰初期，由於香港所處的特殊有利地位，華資企業獲得空前發展，經營達於黃金時代，如織造業一九三八年出口總值達到創紀錄的五千五百八十三萬港元，該業入行者達八十餘家，年營業額多者有二百萬元，少者也有四五萬元。機器業年營業額大者數十萬元，小者二三萬元。就行業而論，化妝品業年營業額約四百萬元，膠鞋業年產約六百萬雙，年均出口價值六七百萬元，製漆業年營業額爲三百多萬元，製帽業爲一百多萬元，九龍糖薑業爲三百餘萬元，電筒電池業每年出口額可達五百萬元。經營額較大者主要集中於織造、食品、化妝品、樹膠、電筒電池、製藥及印刷包裝製罐等行業。

香港華資企業的產品面臨着激烈的市場競爭。港商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後，可以申領英屬特惠稅證（條件是須採用英國原料），產品在英聯邦內市場享受優待。但當時各國高築關稅壁壘，使港製品外銷如臨深淵，如中國政府關稅重徵後，香港織造業迅即失去在內地的廣大市場，製藥業只剩下往南洋一條生路。廣東當局施行糖業統製，香港糖廠營業頓時大跌，既使在南洋，要求得發展亦殊不易，菲律賓實行關稅保護政策，新加坡亦頒布了限制貨物入口法令。而日貨傾銷攻勢兇猛，使華資織造業在中國、印度兩大市場上難以招架，並大舉進入香港市場，危及港商本部。日製膠鞋曾暢銷於香港，使華資樹膠業「岌岌不可終日」。其他如化妝品、玻璃、油漆油墨等行業，都受到日貨的強大壓力，迭有倒閉者。抗戰結束後，則是美貨傾銷，連往昔最暢旺的電筒電池業、樹膠業等。其外銷市場均遭攘奪。

受無情的經濟法則支配，香港華商與內地民族資本也有着利益衝突。如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期，廣東商會聯合會反對中國政府在九龍設海關，認爲此舉「徒令外地（指香港）商業繁榮，同時適以使內地工商業凋敝。」也不同意對港製國貨減稅，謂其「影響國內工商業甚巨」。而當南洋各屬華資企業建立後，與港製產品競爭又有所加劇。在抗戰期間，「孤島」上海的貨品伸展市場，遍及各地區，也是港製品的強勁競爭對手。

香港乃一彈丸之地，資源缺乏，市場狹小，這就決定了華資企業必須尋求向外發展。他們利用英國政府對於英屬領地的商業優惠政策和香港無稅口岸，貨物可以自由往來的特殊環境，力求降低產品的成本。並發揮直接參與國際市場，緊密聯繫國內市場和海外僑胞等有利條件，採用先進的機器設備和管理技術，創製名優產品，從而提高了競爭力，擴大了影響。港製國貨流通於世界各地，但以南洋群島、泰國和菲律賓等處爲最，其次中國內地及港澳亦佔有相當市場。不過當中國政府提高進口關稅後，迫使香港華商更多地傾注於國外市場。

因華資企業是外向型的，其生產須視海外市場需求而轉移，而匯水行情，對於港製國貨在海外的售價及各商埠的定貨量都有直接影響。以電筒電池業爲例，一九三四年上半年主銷場南洋滙水低(當時星幣與港幣的兌率爲 1:1.6)，各埠辦家紛紛定貨，香港各廠加工趕製。到下半年，匯水比率是爲 1：1.4，南洋定單日益減少，各廠家生意轉爲淸淡。而一九三五年，下半年的情況與前年相比則正好相反。正是一九三五年下半年香港對外匯水市情漸趨穩定，各埠定單源源而來，推動華資企業走出了低迷。在一九三九年下半年，港製品南銷極形疲軟，查其首要因素即爲匯率變動所引發。

南洋市場對於近代香港華資企業有着至關重要的意義。當抗戰前香港工商業極度低迷時，由於南洋群島商務日興，

僑胞去者日衆，購買力增強。香港華商織造會抓住時機，組織各廠家派代表赴南洋招徠生意，在菲律賓、印尼等國打開了銷路，走出了困境。香港產品之所以能以南洋爲主銷場，離不開廣大僑胞的關心和支持。首先，僑胞是港製品的主要消費者，如港產布匹和中成藥在南洋極爲暢銷。其次，南洋僑胞致力於振興國貨，如一九三四年菲律賓華僑青年會發起倡辦國貨展覽大會，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星洲中華總商會連續舉辦了兩屆國貨擴大展覽推薦大會等，這些對於港商都十分有利。

香港華商的營銷模式

港商根據中國傳統的企業管理經驗，再借鑒近代西方的營銷方法，相得益彰，比較突出地表現有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各創本牌產品，精益求精，各企業遵循質量第一的「祖訓」，結合歷任業主的實踐經驗，大力發展本業商品，精心研製出一大批質量高、價格廉、享譽海內外的貨品。如廣生行的「雙妹牌」化妝品系列；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雙喜」、「雙金錢」、「飛馬」、「喜鵲」、「美人」、「地球」牌香烟；日昇製造廠的「醒獅牌」、「雙桃牌」電池電珠；馮強樹膠廠的「寶塔牌」膠鞋，利國興民織造公司的「雙燕牌」、「三輪牌」、「燈牌」線笠衫；中華製漆公司的「菊花牌」、「長頸牌」油漆，萬隆糖薑廠的

「鷹牌」糖薑、大華鉛筆廠的「雙箭牌」鉛筆;大華鐵工廠的「大華牌」五金、機械製品、粵生機器廠的「Y.S牌」印刷機、切紙機,甄沾記糖果廠的「柳樹牌」糖果雪糕;李成興魚露涼果廠的「金牌」、「翡翠牌」、「孔雀牌」魚露、罐頭、涼果;遠大祥製鈕廠的「戰艦牌」、「飛機牌」各式鈕扣,……等等。不少產品屢屢獲獎,如全新線衫廠的製品曾獲廣州市社會局、廣州市展覽會、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等授予獎狀。香港汕頭花邊公司產品於一九二八年獲菲律賓嘉年華會金獎,一九三四獲全國廠家出品展覽首獎等,爲港製國貨贏得了很高的榮譽。

第二,本輕利重,靈活發展。縱觀華商企業五光十色的商業廣告,無不標榜價廉物美、童叟無欺、貨眞價實。如成藥屬於高度「不透明商品」,一般消費者並不了解隱藏在膏丹丸散等名稱後面的成份與成本,可供廠商操縱的空間較大,故製銷者利潤十分可觀、診業「本少而利厚」,即爲時人所指出。以唐拾義藥局的名牌藥品瘧疾丸、久咳丸、哮喘丸爲例,起初價格相對較穩定,即每瓶一元,其獲利情況爲:瘧疾丸毛利率爲百分之六十以上,久咳丸、哮喘丸竟高達百分之八十。

根據對近四十家藥號的九十四種成藥牌價所作分等統計,可知每單位(通常是瓶、樽、盒)價格在一元以上者爲四十四種,五毫至一元者十二種,五毫以下者三十八種。按

清末民初的市值，銀一元具有較大購買力，一般民衆看病買藥的負擔是相當不輕。

在商品經營過程中，製造商總會照顧平衡連鎖店的實際利益。如永安堂給分行的貨品按七折九扣給價，另再按營業額提百分之五的廣告費。分行又給外埠代銷商按市價八折，特約經銷後再打九扣，故歷年所得利潤極高。

第三，借重廣告，改良包裝。在清末民初報刊圖書雜誌中，商業廣告已佔有相當的篇幅，因商家已認識到，「自廣告風行，凡百商貨，莫不以廣告爲開路先鋒」。一般廣告扼要地說明商品的名稱、功能、權威（祖傳秘制、名人介紹、政府獎勵、業主學識經歷、老字號等）、價格、購買方式、企業地址、業主姓名、聯繫辦法及廣告時間等。廣告的功能很多，除介紹商品外，還有不少其他用途，如店鋪的遷移、懸賞緝僞、商品加價、有獎銷售、推出新產品、節假日讓利酬賓、企業招股以及售後服務等，均可反映。

清末廣告比較簡單，主要靠文字表現。進入民國，廣告製作水平大爲提高。一是比較大型化，尤其是一些資本雄厚、頗具規模的企業，所登廣告常佔書報整版面積，出現頻率亦高。二是圖文並茂，附有照片或詩畫，製作精緻，形象生動。如「血中寶」廣告設計很有詩情畫意，其畫繪有青年男女在花前樹下相依相戀，旁配詩云：「兩情戀戀倍纏綿，葡萄花下細談言，血中寶是增情物，只羡鴛鴦不羨仙。」三

是形式多樣，變換快速，創意新穎。有些廣告文雅風趣，徵求對聯，其作法是先登出卷題上聯，不收卷資，但每卷須貼商品單紙方才有效，並注明徵聯設獎項名次及獎額，派人四處分發，造成社會轟動效應。僅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五年間，李衆勝堂即以徵賦徵聯方式作廣告四次。馬百良行也搞過詩鐘榜之類的廣告。永安堂、潘高壽、二天堂等商業廣告十分引人注目，圖像，詩文乃至奇文怪論無所不有，且時常更新，確實頗費心機。四是製作費用頗巨。如永安堂、宏興藥房僅在上海每年即花費十五萬和二十五萬元，源吉林號每年廣告費支出約佔其營業額的百分之十五。正因爲經費上捨得投入，華資企業廣告才得以大量出現在街招壁畫、報刊雜誌、掛畫、日曆、折扇以及手提紙袋上，做到街知巷聞。尤其是一批後起的企業，就是充分利用了廣告宣傳方面的優勢，才提高了企業及其產品的知名度，經營突飛猛進。

中國商品製作傳統歷來不重視裝璜，面對近代西洋製品傾銷，處於極不利的地位。故工商界有識之士，亦開始改進產品包裝，以增進競爭力。如王老吉涼茶初時包裝粗陋，傳入東南亞和美國後，包裝逐步改善，增加了精裝產品，李衆勝堂保濟丸添用圓筒厚紙盒，保無洩氣發潮，且省耗費；陳李濟藥廠包封蠟丸向用福建本曹紙，一九〇五年始改用機器紙，永安堂萬金油本爲樽裝，一九三〇年特製罐裝，攜帶利便，裝璜美觀，藥物既可久藏，還可作送友佳品。民國時

期，許多港製國貨的裝璜已相當精良。

第四，減價促銷，這是一種最常見的競銷手段，每逢節假日或企業週年紀念，擴大營業及新店開張等場合，業主均會搞特色大贈品或大減價，短則幾天十數天，長則一兩個月。如宏興藥房經營兒童專藥鷓鴣菜，每逢兒童節均特設免費茶點及玩具贈與孩童，以廣招徠。大多數企業爲酬答顧客及代理商之雅意，每屆歲末都有彩色精印壁掛日歷分贈大衆。也有連買帶贈的，如梁謙益堂港局兩週年紀念時，曾大減贈一個月，實行「買一送一」。

第五，生產嚴格保密和產品嚴厲防僞。首先是保安措施嚴，如各藥行對產品的配方和製作，向來諱莫如深，唐拾義爲保持高額利潤，對製劑配方嚴格保密，非親信不得過問。遷善堂眞方由堂主人密藏，配方亦由其親製。爲保證機密勿洩，企業用人與家族近親血緣、師徒關係爲限，總分行各主持者一般都是同姓，如源吉林號省港佛叻各埠店舖皆由源氏家族長輩控制，一切按成規辦理。潮屬華資企業的地域色彩更濃，如李成興魚露涼果罐頭廠、中國公司果子廠等，不僅經理層屬潮州人，甚至連技術人員，工人都選自潮汕。

其次是嚴厲打假防僞，清末華資商品被假冒的現象已十分嚴重，對此各企業確是絞盡腦汁以作對付。如太和堂黃祥華早在一八九四年即運用水印單紙技術，以別招牌眞僞，瑞昌商號，珍圃烏龍莊，劉馨利烟絲行，天寶華老染房等許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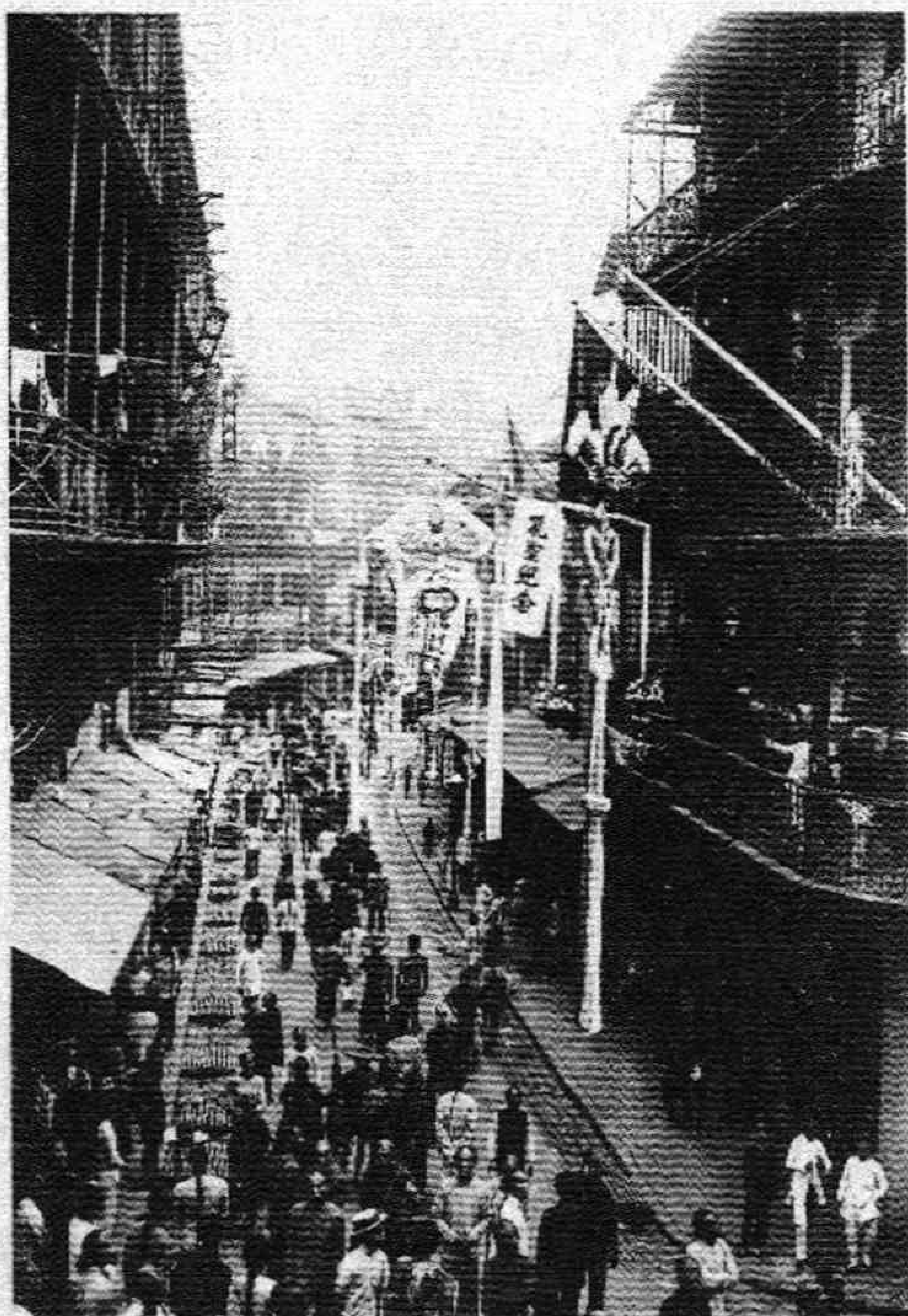
行號都在報紙上登載廣告提請人們防止假冒行爲。民國以後，華商興起利用照相技術，將本企業注冊商標及防僞標記（多爲業主眞像）作進廣告，或印於產品表面，以利顧客識別眞僞。三十年代，假冒僞劣藥品猖獗，迫使各藥行改換新裝，如李衆勝保濟丸全部改裝，外印紅色精細凹凸版，成本極爲昂貴。其他一大批藥行接連發布防僞改裝宣言，新的裝璜、封口、仿單、招紙圖形等做到設計別緻，以電版精印，不惜工本，以求有效防僞。

華資各企業經常展開打假活動，這往往會訴諸官府。如一八九五年天寶堂登報要求顧客對假冒「三鞭酒」嚴加細查並舉官究製。永安堂通過打官司，使鄭安之堂、廣恆芳、中亞藥房等因假冒侵權而被法院究辦，處以罰款和沒收貨物。在唐拾義香港分局、還附設了查緝僞藥聯合辦事處，後來又成立了消滅僞藥協會。

第六，展拓營銷網點。港商的營銷範圍遠遠超出了本埠，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大都在海內外廣泛地建立起分支機構及代理處。如早在二十世紀初，天喜堂的代售網已推及新加坡、庇能、吉隆坡、大小霹靂及澳門等地。岐生園代售處設於西貢、堤岸、石叻、舊金山、小呂宋、檀香山、澳門及國內各埠。在本書前面所講的華資金融、百貨、運輸、製造業等方面，都不乏實例。有關這個問題，下一章還將着墨更多。

十、頗具實力的聯號企業

五口通商後，近代民族工商業勃興。由於華僑大量移居海外，對外貿易的增長，香港的崛起及港粵間經濟交往的加強，大批聯號企業便應運而生。華僑以粵閩籍居多，每年出口供華僑消費的廣貨約值一億元，實為一個大市場。因此，僑辦工商業很興旺，成為港粵社會經濟一大特色。由於地理位置的毗鄰和工商業經濟的需要，港粵華商雙向發展，形成了中國近代經濟史上別具一格的企業門類——港粵聯號廠號商行。到二十世紀前半葉，隨着海內



二十世紀初上環蘇杭街景。（明報資料室）

外華人資本合作與交融的深化，這種聯合企業範圍已擴大到全國乃至全球，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可以說，近代中外經濟交往的密切和香港作爲轉運樞紐而發揮作用，是海內外華資聯號企業誕生的主因。

聯號企業的發展歷程

聯號企業是海內外華資交融的高級形成，這是一種高層次的分工協作，不但能擴大經營規模，提高經濟效益，增強應付競爭和風險的能力，還使各企業間具有內部的有機聯繫，故一般都有相當的穩固性。聯號的創建貫穿於整個華商發展史。

清末是華商聯號企業的初創階段。

聯號的建立總起來講是內外雙向發展的，但早期區域範圍基本局限於粵港間，數量則以由粵向港拓展者居多。

由於佔有地利之便，廣州附近的行商和殷戶很早即赴港設棧經營，拓展業務。如朱廣蘭烟絲號，萬隆、濟隆糖薑廠等，在香港設立了分號或分場。十九世紀末，採用機械化生產的廣東宏遠堂紙局、張廣源罐頭食物莊，一品齋鞋廠等，相繼在香港建起分局分行。由於香港和南洋一帶氣候濕熱，瘴疫盛行，以及海外華僑對祖國傳統中醫藥的需求等因素，粵中老字藥號創建了一批香港聯號，著名者有杏園春、橘香齋、太和堂黃祥華、黃愼堂、王老吉涼茶莊、德安堂等。



二十世紀初皇后大道街景。（明報資料室）

二十世紀初，因清政府實行「新政」，國人抵制美貨和收回利權運動的促進，中國內地出現了設廠高潮。許多企業、商號將業務擴及香港，如罐頭食品業的廣美香、廣福隆、印刷業的佛山英文堂書局、廣州澄天閣五彩石印機器書局；餐旅業的羊城粵華大酒店、廣東大酒店；烟草業的粵東烟草公司、鶴邑沙坪劉馨利烟絲行；烟花炮竹業的張廣泰、張祥泰、陳泰記、南昌泰；茶葉業的恆裕茶號、江門信益何福記茶店；運輸業的省港貨運倉儲致祥堂、廣州均和機器廠造船部；綢緞業的粵綸祥絲綢店；日雜業的福源和紙號、羅長泰金莊店、廣福祥號、兆昇恆號、莫禮智號、正戎隆號、永福香號；燃料業的禮昌煤號；金融業來自上海的中國通商

銀行、永年人壽保險公司；製藥業的馬百良、庶和堂、流澤堂源吉林、天喜堂、梁培基、敬修堂、黃仁庵、芝蘭軒、歧生園、梁同濟等等。

香港華商對近代企業的投資，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已見端倪，當內地企業大量向外拓展的同時，港商亦嘗試朝大陸進軍。如一八九五年七月，廣益堂收購大成紙局，試辦省港聯號並招收計股。買辦是香港華人中擁有資金最多的一個階層，到清末，他們向內地官、商企業投資，實行多種經營，橫向發展，經濟實力更為膨脹。如何來為香港置業保險船務及出入口各行商業的領袖，所屬字號遍布於國內和南洋等地；李右泉所辦企業遍及省港，曾多次擔任香港華商總會主席。

二十世紀初，香港經濟形勢比較活躍，與華南沿海沿江地帶有密切聯繫的華資航運業有突出發展，成立了四邑：兆安、中國粵港、元安、毓安等十多家輪船或拖輪公司，在廣州、江門、三水、順德、甘竹等埠設立了分支機構，主要經營省河航運，使港粵間客運暢旺。此外，源安、源盛等洋面火燭保險公司，在廣州、上海、漢口、廈門及南洋等地設立分局；宏濟烟草公司、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廣州、上海等地設立支店；光商、眞光百貨公司創立了廣州分公司，保心安製藥廠、廣生行化妝品公司、德源商號、省港造冰及貯冰凍廠、安樂汽水公司等，也在內地建立聯號。

因此，我們可以認爲，融合海內外華人資本的聯號企業在清朝末年已經廣泛地建立起來。

辛亥革命，中華民國建立至太平洋戰爭前的約三十年間，是聯號企業發展的鼎盛時段。這裏除了直接得益於前清已奠下良好基礎和民初華商勢力的較大發展外，另也有若干因素在起推動作用。

首先，是時局的影響。國內在各路軍閥統治下，長期動蕩不安，驅使大陸商民向海外拓殖，以避內亂。如廣州嘉華儲蓄銀行、新亞酒店等，考慮到國內局勢多變，尤其擔心駐軍、官府的騷擾，於是在香港政府注冊，建立象徵性的總行總店，抗戰初期，滬穗等地企業大量遷港，也壯大了聯號的陣營。當然，國際形勢的不穩定，也引起過香港華人的回鄉潮，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香港市民擔戰爭波擊，有近十萬人返回內地。

其次，中國政府實行的某些獎勵和優惠政策，吸引了港商前來投資。如一九一九年，廣州市政廳拆城築路，登報招商，港商伍籍磐等人承辦省城電車路，成立了香港廣東電車有限公司。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三年間，廣東省官產處因軍用浩繁，函需籌款，奉令將所有官產速予分批開投，應投者主要是港商和華僑商人。一九三一年三月，粵省主席陳銘樞函請周壽臣。陳廉伯等代約香港紳商赴廣州進行「實地考察、共同投資、舉辦實業」。在陳濟棠執政時，廣東局勢趨於穩

定，粵省當局對於海外投資持歡迎和扶植態度。一九三三年二月，陳濟棠邀請由蔡昌、莫應溎率領的「港澳華僑參觀團」訪穗，共商發展大計，蔡氏是大新公司總經理、莫氏是香港糖商總會會長，該團成員還有香港閩南商會會長莊成家，香港金銀貿易場主席林癸生、五邑商會主席簡織南、南北行商會董事王宇平、《工商報》總經理梁謙琥等人。此後，廣東省政府除頒布了一系列獎勵僑商投資興辦實業的法令外，還通飭各級政府切實保護歸僑，不得留難。

第三，促進聯號企業大發展的某些特殊經濟因素。如三十年代初，粵府加抽藥科進口稅，廣東許多製藥商即將工場移往香港生產。當時，中國政府推行關稅自主，實行新稅則，在關稅重徵的壓力下，又有不少港商赴內地設廠，以免輸入成品成本過高。如利國興民織造公司，馬寶山糖果公司，百家利化妝品廠，如英印花鐵罐廠，冠益食品廠，中華梘廠等，均在粵、滬等地創建了分枝行號。在投資條件方面，香港屋租過於昂貴，港府對於工作時間限制較嚴等，也使港商感覺在內地開業更為有利。

第四，香港與大陸間交通狀況的改善，也有利於聯號企業的建立。粵港間往昔運輸方式主要依靠船舶，而當九廣鐵路和粵漢鐵路先後於一九一一年和一九三六年建成通車後，華南、華中各地物產，咸集於廣州，轉運到香港出口，更形暢達；貨物運輸，行旅往來，非常便捷，大大增強了國內廣

闊市場對海外的吸引力。

基於以上多種因素的影響，華資聯號企業繼續雙向推廣，不僅數量多，行業全，所覆蓋的地域亦愈加廣闊。

大陸在港之聯號企業，以粵滬兩地最為集中。粵資仍保持着數量上的絕對優勢，很多重要的聯號都始創於此時。如工礦業的廣東士敏土廠、地利礦務公司、中山民衆實業公司、南華錳鉛製煉廠、機器業的協同和機器廠、粵生機器廠、捷和鋼鐵製造廠、鄧芬記金屬製品廠；機織業的利工民衫襪織造廠、周藝興織造廠、詠鵬毛巾織造廠、冠全球織造廠、新巧華染業公司、樹膠業的馮強、廣東兄弟樹膠公司、捲烟業的南方愛國、中華國民烟草公司、電炬業的普照、興華電池廠、日昇製造廠、食品業的香港糖薑貿易公司（由省港十一家同業組成的聯合企業）、李話梅涼果廠、李成興魚露涼果罐頭廠、印刷業的東雅印刷局、藝英電版印刷所、餐旅業的文園、南園、西園、大三園四大酒家、太平館、隨園食譜、大同酒家、廣州酒家、金融業的廣東省銀行、遠東實業儲蓄銀行、興中商業儲蓄銀行、五華實業信託銀行、羊城保險置業公司。其他還有大新皮革公司、廣東帽廠、三鳳粉莊、周遠來珠寶店、光和眼鏡公司、何正岐利成記刀莊、等等。

粵港華商成藥聯號非常吸人注目。成藥的生產離不開藥材，香港是中國藥材內銷及外銷的集中地，南北行藥材運往

南洋、金山外埠及兩廣人地各處者甚多，每年生意以千萬元計。而藥材用以製造丸散者，實佔絕大部分。「北有同仁堂，南有陳李濟」，以陳李濟臘丸爲典型的「廣藥」，在我國醫藥寶典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名字號藥行，以前多在廣州、佛山，自一九二五年工潮和一九三三年粵府加抽藥料入口稅，其多移港生產，形成於民國前期的粵港成藥聯號約有七十餘家，著名者有陳李濟、李衆勝堂、兩儀軒、梁財信行、保滋堂、遷善堂、唐拾義父子大藥房、宏興藥房、二天堂、和平製藥公司、位元堂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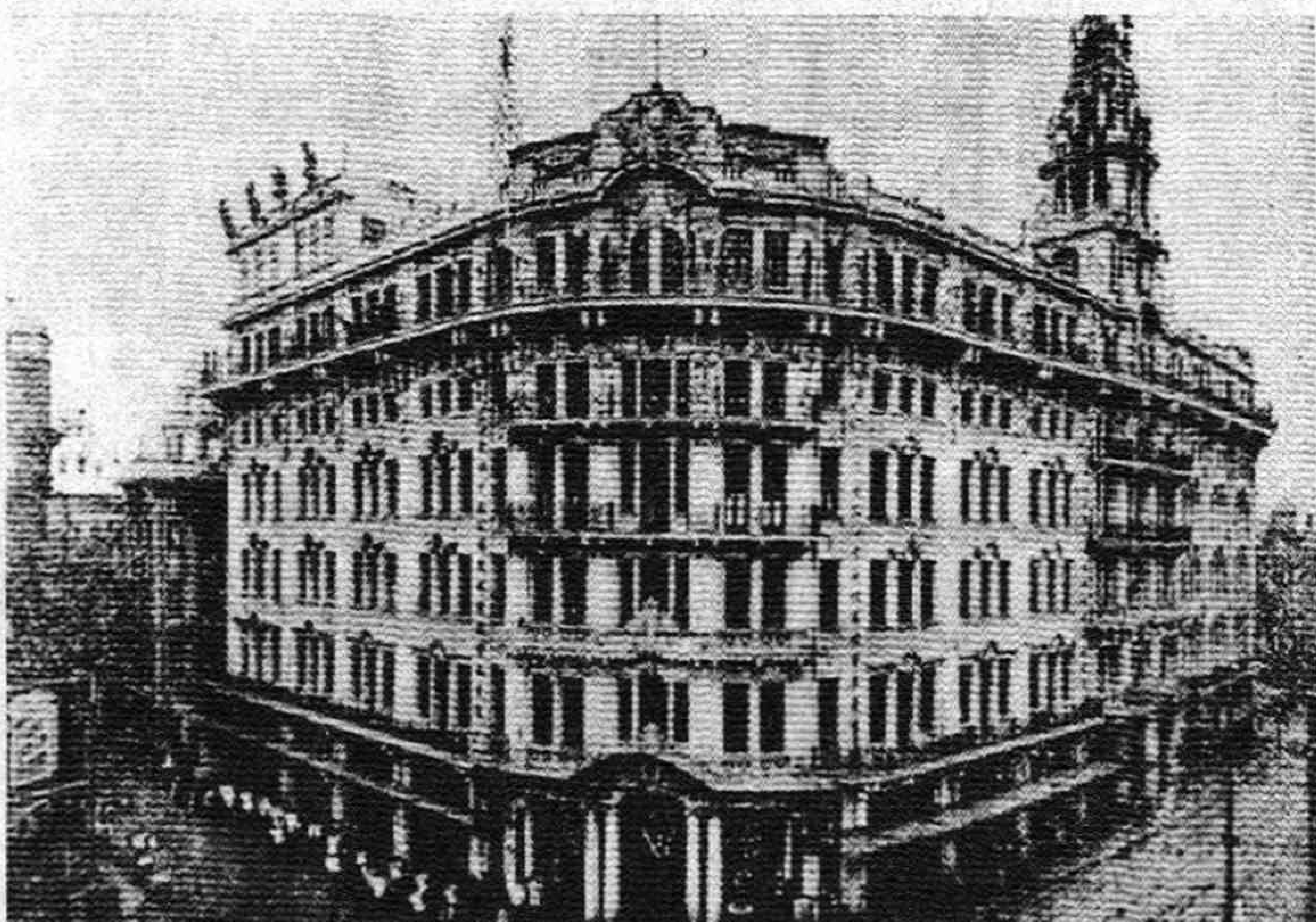
抗戰前滬商已在香港建起一批聯號企業，如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聯保保險公司、金星水火保險公司、興華製麵公司、精益眼鏡公司、華商烟公司、履新鞋莊、佛慈大藥廠、中國雷電大藥廠等。以上海爲總行的中國、交通、上海商業、中南、金城等銀行，建有香港分行。

自淞滬戰役後，中國對外貿易重心南移，由是國內銀行遷港營業者爲數激增，使香港大有成爲全國金融中心之勢。上海的大中工業社、中國植物油料廠、中國化學工業社、天廚味精廠、天寶味粉廠、世界書局、中國國貨公司及一批大藥廠，均在香港建立了分枝機構。

現回過頭來再看香港方面，二十世紀前期，華商資本有了較大發展，但本埠空間畢竟有限，已具有一定實力的港商紛紛北上開拓內地疆域，進行廣泛的投資。如第一次歐戰

期間，港澳廠商回粵大辦火柴廠，計達十九家，使鷹火柴業興旺一時。餅乾業是國內二十年代才新興的產業，起初均由香港馬五山公司：安樂園、讚美廠、黃植生廠、五山廠、嘉頓廠生產，運往廣州分行分店銷售，慢慢地廣州方面也開始設分廠生產。港商對廣東近代公共交通事業的投資比較突出，許多客貨汽車運輸公司都是由港商擔任經理。在香港與華南的航線上又增添了十多家輪船公司，所闢航線一直延伸到珠江上游的梧州等地。

國內大型百貨零售店都是由華僑創辦，如先施、永安、大新公司在廣州、上海的聯號，可直接從香港總店進貨。它們採用新式經營管理方法，帶動各地大小百貨商業的發展。



二十年代上海永安公司。（明報資料室）

香港廣東銀行、東亞銀行、工商銀行、華商銀行、國民商業儲蓄銀行、金華實業銀行、永安銀行等，業務亦多伸展到中國腹地，建有一批分行號。在內地建聯號還有保險業的中國康年人壽保險公司、永安人壽保險公司、聯安保險公司、香安保險公司、福華銀業兼保險公司；化妝品業的百家利、南華、海棠、三達化學、南方香亞等公司；鐘錶業的李占記、利安、林源豐等行店；印刷業的亞洲石印局、永生印務公司；織造業的民元電機織布廠、香港汕頭花邊公司；製藥業的延壽堂、天相堂、天壽堂、朱中興、保濟堂、百好堂、黃耀南號、永華藥廠、東方大藥行、蜘蛛藥行等。

抗戰爆發後，由於社會經濟的需要和商業利益的驅使，仍有港商不畏艱難往內伸展，如大華鉛筆廠、謙信針織廠、二友牙膏廠、茂華大藥廠、南方大藥廠、普濟藥行等，在廣州、上海、汕頭乃至桂、湘等省建立了分枝行號。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是華資聯號企業的萎縮階段。

太平洋戰爭期間，香港被日本佔領長達三年零八個月，航運斷絕，華商資本慘遭擄掠，大部分企業被迫停業，商家星散，溝通海內外貿易的南北行、金山莊業務均告停頓。如《香港商業年鑒》的所追記：「一切處在戰時狀態下，香港簡直是一座恐怖死城」。大批難民離港回到內地，也有些華資企業遷往廣州，如香港寶安實業公司、志強膠廠、膠輪公司、梁顯利輪胎廠等，接踵到廣州開業。

戰後不久，香港與大陸的聯繫得到恢復，從當時報刊雜誌廣告欄目看，往昔的不少聯號企業都已重建。另據一九四七年《香港工廠調查》等資料記載，金山織造廠、遠大祥製鈕廠、國光製漆公司、中國公司果子廠、香港烟草公司等，又在內地新建起聯號。

但隨着內戰的加劇，港商同內地的往來大受制約。因為國民黨統治區域金融波濤迭起，物價奔騰，工商百業凋零，市場日益萎縮，內地業主唯恐避之不及，港商亦視往內地投資為畏途。國民政府將難以控制的金融風暴歸咎於社會游資，並視香港為游資活動的大本營，遂採取封鎖政策，先是禁止國內與港澳的匯兌，繼之停止港幣入口結匯，演變成海內外華資正常交往渠道的危機。儘管如此，仍有企業主採取了比較靈活的辦法，如永安堂因產品入口納稅結匯，辦理出入口手續繁雜，遂於一九四七年特將原汕頭製藥廠重新恢復生產。

華資聯號企業的特點

具有近百年歷史的華資聯號企業有着非常鮮明的特點。

第一，數量衆多，涉及面極為廣泛。近代海內外華資建立聯號的現象很普遍，數量多達上千，涉及進出口貿易、百貨、運輸、工礦、金融保險、出版印刷、餐旅酒店、醫藥、日雜等幾乎所有的行業。如聯號基本上囊括了粵港藥行老字

號，爲數不下百戶。其中有的歷史非常悠久，陳李濟、保滋堂、何明性堂、橘香齋等已有二三百年創業史，百年老號也有十餘間。老字藥號多數起源於佛山，廣州附近，發展到香港後，大都還以創辦者或原堂主人的招牌作號，而且凡屬聯號其內部的聯繫都相當緊密。

聯號企業跨越廣闊的空間，實際上許多聯號都不限於個別區位，而是在不斷地拓展過程中，成爲覆蓋國內外各埠的多極聯號。根據對一些典型企業的追蹤查尋，可知聯號創建及發展的一般規律是：業主先在對象地區傳媒上登載宣傳廣告，尋求代售，經理代理或招商招股，條件成熟後即開設分枝行店。如胡文虎兄弟的永安堂，於一九二一年初從南洋延伸到香港，以港島德輔道西南興源爲總代理，翌年在省、港萬安隆設總經理；一九二九年設香港分行，後又陸續在穗汕、滬、廈、津、福州、梧州等埠設分行或製藥廠。

第二，具有多種類型，其經營活動呈雙向互動關係。筆者曾對近代聯號企業進行衆多個案研究，歸類綜合整理的結論是：雙邊聯號的產生以粵港之間最早，數量最多，尤其是總行總店在廣州（香港），分行分店在（廣州）的情況最爲典型，遍布於社會經濟的各方行業。其次是港滬聯號，在清末主要是從華南向華東延伸，進入民國後，上海企業往南拓展也是顯著增多。二十年代後，內地和香港的華資企業都獲得較大發展，相互聯繫也更爲頻繁和緊密，故聯號企業紛紛

創建，但以港粵、港滬雙關係爲主的格局仍未突破。

由於內地和香港間的企業聯繫一般都要與粵商掛鈎，故上述類型聯號相當多都是涉及到多邊的。如南洋烟草公司、大華鉛筆廠、先施、永安、大新百貨公司，東亞酒店、大東酒店、九同章綢緞莊、華美電器行……等等。都是以港粵滬聯號核心的多邊聯號，有的甚至多至六七邊以上。又由於香港是近代聯繫海內外華人經濟的紐帶，故在長期發展過程中，有相當一部分聯號成爲覆蓋國外華僑華人社區的多邊聯合企業。如馬百良藥行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成長爲佛省港汕暹叻聯號，香港廣東銀行是香港、上海、廣州、漢口、暹羅、紐約、三藩市聯號金融機構，香亞工廠先設於三藩市，後在上海創香亞有限公司及總工廠，產品精良，風行此方。一九二三年春，設南方總公司於香港，供南中國及南洋各埠所需，同年八月，廣州分行又開幕。

在聯號的發展過程中，原先的總行分行往往也會根據經營形勢而相應變遷。中國南洋烟草就是一個典型的子，它起源於香港，清末在穗、滬設立支店，民初改爲分公司。不久，由於上海的業務發展迅速，遂改爲總公司，香港部分則降爲分公司。此外，香港百貨商業的幾大公司進入上海後，營業額很快即超過母公司，成爲全國同行中的佼佼者。一般而言，港滬聯號的經營重心容易北移，這是因爲上海在近代中國具有中心地位並可爲企業提供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再如

廣東捷和鋼鐵製造廠於抗戰初在香港設分廠，得較大發展，戰後省港兩地總、分廠的位置便調換了過來，朱廣蘭號總管理處本在廣州，後因國內外分支機構增加，重心轉移，遂遷至香港。

第三，總分行相互依托，分工合作。鑒於香港和內地在市場、關稅。政府政策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異，故聯號企業在經營上有明確的分工。一般講國內部分主要負責內地市場的產銷，香港部分則分擔聯繫海外的業務。如陳李濟聯號便因合理的分工，既解決了市場的競銷問題，又避免了產品進出口關稅的麻煩，兩儀軒三蛇藥物由廣州總行生產，而港澳及國外業務則由香港總分售處辦理。由於香港是自由港，與海外聯繫便利快捷，故多數聯號都將總批發處或總發行處設在香港。

在原料和資金方面，聯號內可以相互調劑挹補。如廣州土洋染料業大戶以經營批發爲主，且偏重進口貨，因其都有香港聯號，可方便地通過其向各國洋行定貨。唐拾義香港分局負責海外推銷，雖自製藥，但主要任務還是從國外輸入原材料。大型百貨店需要較廣的聯繫面和雄厚的資金，故一般都有聯號的友持。永安紗廠之所以快速發展，運用聯號資金便是重要關鍵。龐大的永安集團聯號資金的調撥，由郭樂以總監督的地位統一安排調度，採取「內部往來」性質的「各埠永安暨分莊往來」科目處理，一般講不需辦任何手續，低

息率，無期限，也不用提供抵押品，條件特別優惠和寬鬆。

第四，商業、貿易、金融業佔有優勢。聯號工廠數量遠遠少於商業、貿易及金融等業。在聯號工業中，大都屬於輕工紡織、食品、製藥、化妝品、捲烟、小五金、印刷等門類，眞正從眞機器製造的廠商並不多。與此相對比，金融保險、貿易行莊、百貨商店、酒店賓館、商舖行店等，不僅企業數量衆多，而且資金及經營規模也比較宏大。特別是大銀行大銀號，保險公司、大百貨公司、大行商及大酒店等，投資動輒上百萬元，在國內外有相當影響。

第五，爲中國近代民族經濟開風氣之先，創建了一批大型企業聯合體。香港、廣州、上海都是中國近代最早對外開放的城市，接觸西方先進的物質文明快捷，因而在許多領域裏都誕生了一批具有開創意義的企業。如中國通商銀行是國內第一家華資銀行；華商保安公司爲中國自辦保險事業之始，國人仿製西式餅乾糖果，始於港穗，香港冠益食品公司、馬五山及馬寶山公司即是先行者；香港廣生行和先施化妝品公司，開了我國化妝品工業之先河；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與天津北洋烟草公司，同爲中國機製捲烟業之先導；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是中國歷史最久，規模最大的出版印刷企業；香港大華鉛筆廠開創了中國鉛筆工業；民族樹膠工業源起於港粵之地，香港中華電池廠中國電炬之濫觴；香港先施、光商、眞光、永安、大新公司是中國第一批百業零售商

店等。

港粵滬華資聯號企業地處沿海開放地帶，接觸西方近代工商業管理制度較早，都能循規分別向中英政府注冊。它們比內陸其他地區更有條件獲得更多的資金、較先進的技術和設備，以及優良的企業管理人才，因而能成爲民族資本中之佼佼者。由於聯號經營而形成了一批具備相當實力的企業，其中有的成爲民族資本中最大的企業聯合體，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廣生行化妝品有限公司、先施、永安、大新百貨公司等，都是其所在行業的巨擘。

中國銀行是華資金融界之龍頭，一九一九年貝祖詒調任香港分行經理後，除大力經營存放款和擴充國內滙兌外，還銳意從事國際滙款業務，進展順利，一九二一年時已推廣於南洋一帶。一九二五年，上海分行繼起仿辦，樹立起國際匯兌銀行之基礎。一九二八年，貝氏調任滬行經理，時論評價稱：從此，「港滬兩方，聲氣益通，遂獲與洋商分庭抗禮焉。」滬港華商銀行在近代中國金融業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上海是民族金融資本的大本營固無庸置疑，而在香港金融界，滬港華資銀行聯號也十分引人注目，華人銀行公會即以中國銀行港行居於首席。

華商聯號藥行繼承發揚了中成藥傳統，又開創了西藥製劑新局面，並形成了相當的生產能力。如一九三六年廣州市有製藥廠一百一十一家（其中大多數爲穗港聯號），年總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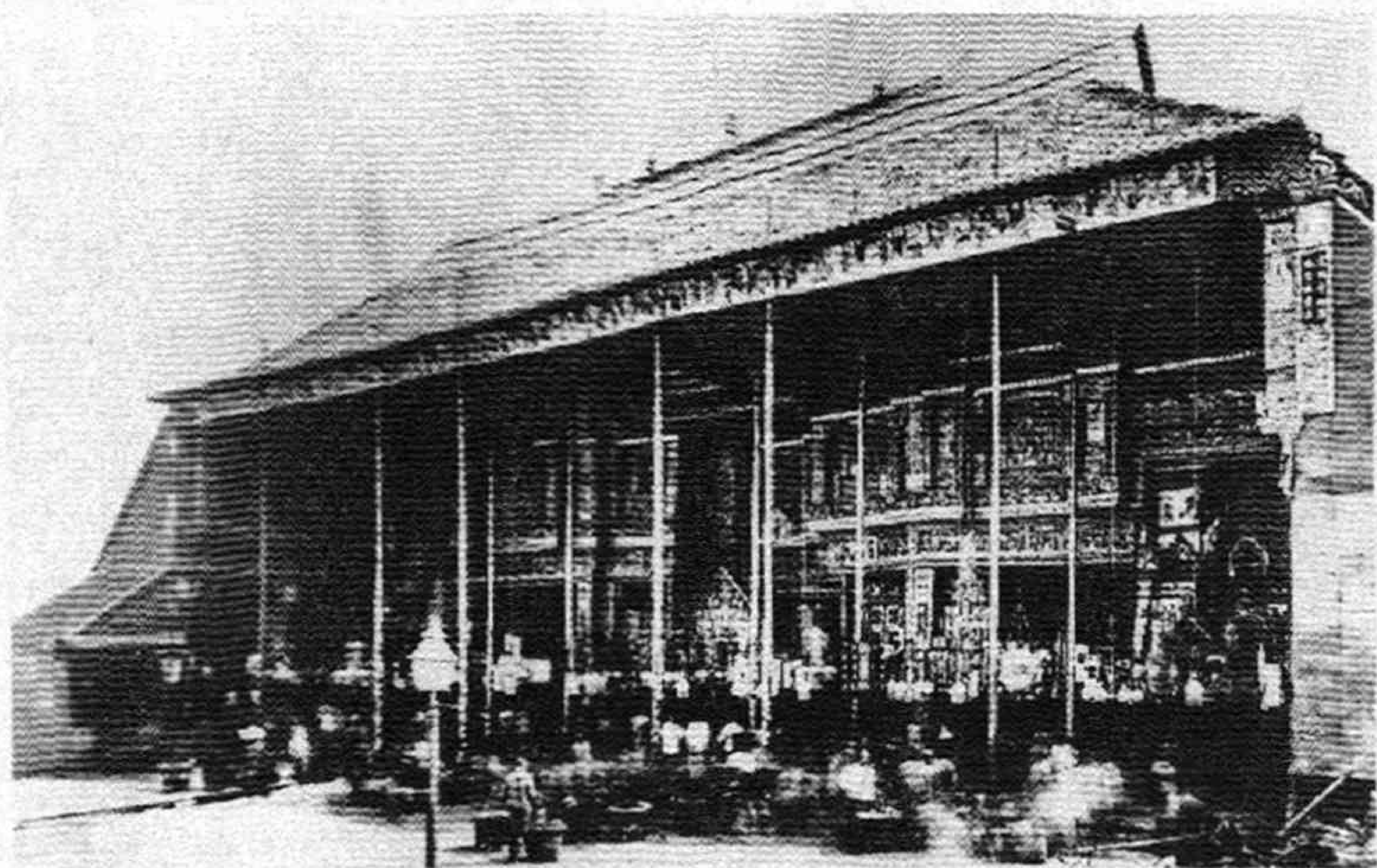
值達九百五十六萬元。陳李濟、保心安、二天堂、永安堂、和平製藥公司、回春閣、永華藥廠、源吉林等行號，僅在香港的年營業額均超過十萬港元。如此大一批企業的廠房、設備、資金、技術、營銷經驗及「祖訓」等，雖歷經戰亂，仍較完整地保存了下來。

不少聯號企業發展到很高的水平。如淘化大同罐頭公司的機械設備、管理及產品質量均不遜於西方日本同業，成爲中國首屈一指的實行科學化管理的大企業。香港商務印書館廠房按歐美最新樣式建造，內部管理科學化。華益印鐵製罐廠管理專家多爲留學生，秩序井然，效率大增。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香港工廠設備周全，有最新機器化一百四十餘部，規模宏偉。

華資聯號企業絕大部分都取得了成功，爲中國實業建設留下了寶貴的歷史經驗和相當可觀的經濟遺產。也正是由於香港所具有的特殊時空位置和優越條件，將香港華商與中國民族經濟的命運緊緊相連，它們相互影響、相互交融、一齊開闢生路，尋求共同發展。

十一、凝聚互助的華商社團

但凡天下有人群之處，則必定會有其組織。華商社團的發展是香港華商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十九世紀中葉，隨着華商勢力在港崛起，代表其利益的各種社團組織也先後創立，它全面滲入華人居民的日常生活，在香港的經貿活動、社會福利慈善事業、維護華商正當權益、加強與內地的溝通等方面，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1868 年華商展覽會。（明報資料室）

傳統組織模式

香港開埠以後，華人大量湧入。他們既無本國政府作後盾，又受英國殖民當局的歧視和欺壓，於是像其他海外華人社區一樣，自發地按照中國傳統，以親緣、地緣或業緣爲紐帶，結成諸如宗親會、同鄉會、同業公會、行會等具有自助性質的社團，承擔起保護自身利益及加強聯誼的社會職能。在十九世紀裏，香港華商社團的性質基本尙屬傳統的組織模式。

1.街坊公所

早期香港華人社會組合只以區域分別，其形式即爲街坊公所（亦稱街坊理事會或街坊會），如南北行街、筲箕灣、香港仔、鴨脷洲、新界等地之公所。而實際組織，是以附近各商號爲單位，操持歷年各種紀念活動，還負有辦理當地社會福利、慈善及排解糾紛等工作，故在職能上頗類似同鄉會。

街坊公所的主持者大都是當地的富商和買辦，如著名買辦郭甘章、梁安、何亞錫、陳錦及大商人王炳等，均曾任過一八七二年時街坊公所的主持。街坊以廟宇爲集會議事之所，其中以文武廟（建於一八四七年，一八五一年重修）規模最大，成爲華人主要聚居區的集會中心。該廟位於港島荷李活道，供奉關羽、岳飛二公，足見其崇尙威武不屈、精忠

報國，富有民族精神。廟宇一般由富商、買辦斥資建造，捐資越多者，其名聲自然也越大。因此，富有華人往往集廟宇值理與街坊首領於一身，在華人社會中具有權威和很大的影響力。

在十九世紀中期，街坊公所已發展成爲在華人社會佔支配地位的團體，充當香港華人與廣東官府之間的中介人和當地商業糾紛的仲裁者，並引起了港英當局的密切注意。

2. 商人行會

據賴連三所著《香港紀略》記載，香港開埠不久，即有華人團體組織，多由同鄉或同一行業所組成。街坊公所雖主要由商界控制，但並不是純粹的華商團體。在十九世紀，商人行會是港商的組織形式，具有傳統的意義，即以團結同業、聯絡同行、防止同業競爭、保護同行利益爲宗旨，故具有同業壟斷、自我封閉的性質。

商人行會的出現，以商品經濟的適度發爲前提。早期的街坊公所多散漫無序，有些形同虛設，於商業改進，實無裨益。十九世紀五十年代，香港華人中已湧現出一批擁有經濟實力，、被同業認同、並有一定號召力的殷實商人，他們是初期商人行會的主要發起人和領導者。一些重要行業如米行、花紗行、石行等，聯行組織陸續成立，並沿襲內地習慣，採用「行」、「堂」、「公會」、「公所」等名稱。如旅港潮人商行未成立商會以前。凡有事故發生，則以聚和堂

爲集議之所。該堂值理由南北行之元發、乾泰隆、裕德盛、元成發、承興等行號擔任。行會是沿襲傳統的業緣組織，與近代資本主義自由貿易、自由競爭的原則相悖。但隨着華洋商人之間自由交易、中外貿易的日趨發達，商人行會的組織結構和社會功能也出現了近代化的傾向。六十年代成立的南北行公所，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個。

南北行行商崛起於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自元發行和乾泰隆行取得成功後，包括潮商在內的各地華商紛紛赴港，蓋起了一座座商店。他們將中國北方各省的貨物轉運到海外，逐漸形成了若干區域性的商人集團，如廣府幫、潮州幫、福建幫、上海幫等，彼此對峙。一八六四年初，潮商元發行高楚香、廣府幫廣茂泰行招兩田等，爲避免互相爭執，便邀集同行，劃分經營范圍，組成同業團體並議定《南北行規約》，共同來遵守。一八六八年，香港第一個較具規模的華商團體——南北行公所宣告成立，其宗旨爲「策同業福利、謀市面繁榮」。同時，它還辦理同街公益事宜，如募壯勇、協助警察維持街坊治安，參加防火救災等，保留了商人會館的某些傳統特色。

南北行公所已超越了地緣關係，組織結構比較完善。該公所是南北行行商集會和辦公的場所，並訂有條理和行例，互選值理和司理（司庫），主持日常工作。其成員都是較早採用西方經營方式的商人，不同於傳統的行商坐賈及小商

販。因此，南北行公所對香港舊式商人行會向日後近代商會的過渡具有承前啓後的作用。

紳商兼福利機構

最典型的代表即東華三院（東華、廣華及東華東三醫院的合稱）和保良局，它們雖是社會福利與慈善機構，但從性質上看，卻是一種紳商組織，在香港華商社團史上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東華醫院創辦於一八七〇年，是香港地區規模較大，在海內外都頗有名望的華人非官立醫院。它是由華人集資興辦的大型社會福利機構，超越了街坊鄰里以廟宇爲集會及活動中心的傳統組織形式，打破了親緣、地緣和業緣組織的局限，在華人社團發展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

從東華醫院的經費來源和董事會構成情況來分析，可知該院實際上是以同業公會爲基礎的以慈善爲目的的社會團體。東華醫院有獨立的經費來源，這就是依靠社會各界資助，但最主要還是來自商界。據統計，在一八七三至一九〇〇年間，南北行、買辦、匹頭行、米行、金山莊、鴉片行等二十個行會的捐款數額穩定不變，佔全院所得捐款的絕大多數。

東華醫院董事會的成員，照例是由香港各行業公會分別推舉的本行業候選人組成，通常他們都是有身分的華商上層

人物或最大的施主。從醫院成立至一九三一年三院（另兩院爲廣華醫院和東華東醫院，影響遠不及東華醫院）統一管理前，東華醫院歷屆董事會共七百八十三名成員中，有洋行買辦一百一十一人、南北行商八十一人、金山莊商六十人，及其他各行業的商界人士，非商人出身的董事，實屬寥寥無幾。按董事會構成，清楚可知以買辦和南北行商人所佔席位最多，在決策過程和管理工作中起關鍵的作用。如醫院的創辦人不少是買辦，有梁安（首任主席，仁記洋行買辦）、羅振綱（滙豐銀行買辦）、伍祝（怡和洋行買辦）、蔡亞（太平洋行買辦）等。此外，羅旭和、何曉聲、曹善允、李葆葵、李樹芬、鄧肇堅、馬叙朝、李耀祥、陳廉伯等董事，他們有的是華人代表，有的是香港政府定例局議員、醫務總監委員，聲勢顯赫。這些董事中不少人還捐有官銜，當時，捐官是華人社會風氣。一九七八年二月，港督軒尼詩曾造訪東華醫院，在幾百人的歡迎隊伍中，見有「朝服頂戴者」五六十人，內有知名買辦梁安、



東華三院新舊總理交替合照（明報資料室）

陳定之、郭甘章、韋亞光、馮明珊等，佔有相當的比例。

東華醫院成立後，除施醫施藥外，還兼辦慈善救濟和教育等服務，如收容無依無靠的婦孺及老弱病殘者，資遣回籍，施賑糧食，派發寒衣，施棺殯殮，興辦平民學校等，惠及香港及大陸人民。後來，隨着醫院財產的增長，其社會功能也相應擴大。如有時它獲得港英當局授權，成爲華人社會與港府之間傳遞信息的渠道；有時董事會仲裁商務糾紛，並扮演香港華人與內地官府中介人之角色，有時又受廣東地方當局的委託，擔當起照管海外移民的責任，在聯繫海內外華人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因此，在近代幾十年中，東華醫院爲本地社會培養了許多華人領袖。特別是在過去香港政府中缺乏華人代表的狀況下，該院又曾充當過港府與華人之間的主要聯繫機構。

華人保良局，又稱保良公局。一八七八年底由東華醫院紳商籌組，主要是針對當時拐騙和販賣婦孺等突出的社會問題，以求保護婦女。保良局與東華醫院的關係非同尋常，據史料記載：「凡任保良局紳者，必先充東華總理，始得爲保良局紳。」該局實爲紳商所控制。據統計，一八八七至一八九九年間，保良局歷任總理一百一十六人中，南北行商、買辦、金山莊商地位突出，而銀號、綢緞、花紗布、洋貨店商人的影響也舉足輕重。

華商創辦保良局的本來意圖是想使之成爲獨立機構，即

仿照東華醫院成例，由立法局立案，確認該局的法人地位，賦予較多的自主權。但港英政府持有疑慮，擔心保良局成爲「東華第二」，一直拖至一八九三年才予以立案。在此之前，保良局僅爲東華醫院的一個分支機構或附屬團體。

近代華人商會

隨着時代推進，西風東漸，香港各行商業日漸擴張，人口增多、事務繁複，華商們「漸告覺悟非團結無以共存，遂有各行商會之組織，以聯絡商號」。在近代中國，商會是由商號會員或同業會員組成的不分行業的團體，始於清末，最初稱爲商業公所，商務公所或商務公會。一九〇三年，清朝政府設立商部，頒布《商會簡明章程》。一九〇四年，商部開始勸辦商會，不論政府還是商人，組織商會的目的都是爲了「振興工商」。上海、蘇州、天津、廣州等地商務總會陸續成立。進入民國後，遵照中國政府於一九一五年公布的《商會法》，全國各地的商人組織統一稱爲商會。香港華人商會萌生於十九世紀末，主要有以下幾種類型。

第一，帶有總商會性質的華商團體。十九世紀末，香港經濟實力有很大增長，各種社團十分活躍，爲了更加集中凝聚力和提高社會地位，在此時勢催化下，一個反映全體香港華人（首先主要是港商）意見和傾向，並按近代社團程序組織起來的總團體，便應運而生。

香港華人總商會的誕生經歷了一個較長的過程。最早出現的是中華會館，這是香港歷史上第一個近代意義上的華人商會，然而其創立過程卻頗爲坎坷。說起來，中華會館的創立與香港金山莊有關，當時有些美國華僑陸續回國，在香港時看到當地華人居民呈一盤散沙狀，極感驚訝，便鼓勵香胞同胞像美國華僑一樣，組織中華會館，以增強聯絡和團結，並應承捐款修建館址。於是，寶隆金山莊經理古輝山等十多名華商知名人士便熱心發起組織香港中華會館，目的在於「聯鄉誼而通商情」。

其實，早在一八八〇年二月，郭甘章、馮明珊、招雨田、王韜等人即代表「闔港華民紳商」，要求港府撥款撥地，以建立中華會館，作爲華商集會之場所，並兼充中西產品陳列館，裨「中外商人同受厥益」。同年九月，梁安、李昇、伍叙、韋玉等數百紳商聯名請求港府撥港島太平山大笪地一段作爲館址。但英國人擔心中華會館成立後，可能會成爲與港府分庭抗禮的華人代表機構，便借口館址難擇而將此事擱置下來。以後，何亞美、何啓等又組成了「香港華商會館」籌備委員會，並多次向港府交涉，但仍未能遂其願。

一八九五年，何亞美、李昇、古輝山（東華醫院首總理）、馮華川（保良局總理）等商定集資購地興建會館。翌年一月十七日，中華會館終於在般含道揭幕，由何亞美主持會務。它以香港總商會爲藍本，但會員限於與對華貿易有關

的商號和商人，故仍殘留有同業公會的色彩。中華會館成立後，在調解華人商務糾紛、舉辦社會公益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由於主持者熱心公益甚於關心會務，加以館址偏離商業區，活動不便，不久會務便陷於停頓。

也有人認為，十九世紀末成立的華商會所（The Chinese Club），是香港華商組織集團之嚆矢。它約創於一八九八年初，第二年由何東出任首任主席，如此既可淡化會所的政治形象，免受港府注意，又山一種號召作用，團結華商，何東自是最佳人選。發起組織者，除了何東外，還有關心焉、張才、謝纘泰等，以中華會館館舍為會址。會員以個人為單位，在一八七九年二月中旬舉行第一屆同人大會時，有會友七十多人，大多係從事洋行貿易生意，該會成立目的，「乃純粹商人薈萃之所，以便聯絡感情，推進我華僑商務也。」華商會所會員多時曾達二百四十人，但發展有限，後不斷地減少。

前述兩個團體所起的作用都不夠理想。一九〇〇年，買辦馮華川、陳庚虞及何澤銘、何隸五等為推進商務，增強團結，提議中華會館擴大為全港華商統一的團體——華商工局（亦作華商公局，The Chinese Commercial Union），得四百餘人響應，並集資在商業區德輔道中購置樓宇作為會所，馮華川被公推為主席。雖然港英當局以其商會組織尚不完備為由而同意注冊，但華商工局是代表香港多數華人利益的團



港商聞人劉鑄伯先生。（明報資料室）

體，其成立表明華商已形成一支政治上不容忽視的力量。

香港華商總會（The Hong Kong Chinese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是香港華人之軸心團體，其前身華商工局。一九一三年，華商工局主席劉鑄伯認爲：自辛亥以來，香港各邑商會紛紛成立，若仍用華商工局的名義，則顯不出眞領導作用。事實上各邑商會都已加入該局，故應是總商會性質的團體。倡議改名者爲劉氏，附議者還有何福、葉蘭泉、陳啓明、何棣生、陳庚虞、羅祥兆等數十人。

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香港華商總會成立，其宗旨是「代表華人，向政府方面，使下情上達，及排難解紛者。」剛開始時，會員不過六七十人，均屬殷商名流，主席劉鑄伯、司理葉蘭泉。經過幾年慘淡經營，才有行頭僑團會員參加，會務亦日益擴大。入會者達上千人，廣泛代表港商各大公司，行號及行業商會。並於一九一九年創辦「商報」

（附刊於《孖刺西報》），一九二二年始將版權出售，即改名爲《華僑日報》。華商總會另出月刊以代之，以作消息之傳播。一九二九年，又創設華商總會圖書館。

香港華商總會對於社會慈善、教育等事業，尤多協助提倡。同時，督促政府改善對於港商的相應設施。時人讚頌其「成績卓著，領導僑團，堪稱泰山北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華商總會改爲理監事制。一九五二年三月，又改爲會董制，並定名爲香港中華總商會。

第二，帶有地域性的各邑商會。清末以降，由於內地各縣邑到香港的移民人數越來越多，社會事務愈加繁複，爲謀桑梓福利，維繫宗邦，由是大邑小邑先後繼起，均有邑團之組織。這也是具有地緣關係的港商可資利用的場所，他們認識到：「當此商戰日劇，合小群則小勝，合大群則大勝，其忍令人合我分，不謀聯絡以相競爭！於是集思廣益，團結同人，作社會之楷模，聯梓里之感情，謀商業之進步，有時且可爲內地之聲援，其關係尙淺鮮哉！」

由於近代香港是一個典型的內地移民城市，故各邑商會有如雨後春筍，紛紛成立。如旅港增邑增義堂，創於清朝光緒末年，以聯絡鄉里，增進情誼，紀念先賢爲宗旨，後更名爲旅港增城商會。旅港番禺會所的前身是敦義堂，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年）由徐堯臣、黃清岩、胡佐卿等數十人發起，曾歷用番禺公所、旅港番禺工商會所等名稱。其自成立

以來，致力於敦睦鄉誼，促進所在地工商事業發展，辦理桑梓福利及社會公益事宜，成就卓然。

各邑商會尤以辛亥後成立最多，如一九二一年八月一日，旅港潮州八邑商會成立，其宗旨爲「研究商務，聯絡鄉誼，維持公益」，被時人稱頌爲。在「謀鄉誼上，是發展共同事業之總樞紐也」。該會影響很大，即標誌着香港潮商集團的正式形成，其經濟發展也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此外，諸如旅港四邑商會等類的華商組織還有很多。

第三，帶有業緣性的各行商會。二十世紀初，香港華人各行業商會陸續誕生。如廣肇客棧行廣聯商會約創於一九〇〇年左右，其目的「在聯絡友誼及維持行旅」。起初僅有店號會員十餘家，但經歷任主席致力會務，遂得逐步發展，至三十年代末，入會同行已有三十多家。普益商會也是港商中歷史悠久的團體，約成立於一九〇九年。初爲普福堂和協益商會，不久兩者合而爲一，是爲普益商會。自成立以後，辦理慈善公益事業，深得社會與論稱道。又全力爲行友謀利益，排難解紛，因此會務日益繁旺。該會主要代表香港洋貨業，最盛時入會商店達上百間。在香港商業中，米業也屬大宗，「爲聯絡各同業感情之見」，該行商人於一九一二年成立了米業商會。初創者僅蕭遠岩、陳少澄、蔡漢文等十餘人，後加入者多達百餘家，會基奠定，會務推進很快。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又創立了一批比較重要的華商團

體。如香港電器商會、柴業工商總會、果菜行工商總會及鮮魚行總商會等，均成立於一九二〇年。香港華商俱樂部、辦房聯合總會、糖商總會等成立於一九二四年。

華商俱樂部是由周壽臣、馮平山、李右泉、簡東浦、李冠春等人發起組織，其宗旨「純以聯絡感情，發展商業及辦理社會慈善事業爲鵠的」。會員皆屬殷商巨賈，在社會上享有盛譽，故人數並不多，初時只有十餘人，後盛時曾達七十餘人。辦房聯合總會亦屬俱樂部之類，其宗旨爲「振興事業，並聯絡本港中西洋行經理感情」。發起者有何世亮、譚伯紹、馮香泉、何世榮、何華棠等，會員多時有六十餘人，多屬出入口在及銀行界鉅子。糖商總會創始人爲歐匯川、陳德希、陳雲坡等。入會糖商有三十餘家，會員達二百多人。會務開展得蓬蓬勃勃，並不斷擴展，成爲香港行業商會中之翹楚。

香港中華聯商會成立於一九二七年，由程啓康、陳叔平、何少謙、譚穎才等人發起。不久後同業紛紛加入，業務大振，至三十年代，會員已增達三百餘人，在香港商界中很有影響。

一九三四年，爲了對付世界經濟危機所造成的香港工商業極度衰疲局面，並請求中國政府減徵港製國貨的關稅，港商又組織了中華廠商聯合會。該會自成立後，努力從事會務，如調查會員廠店出品內容，編輯會員廠店滙刊，出版華

資工廠調查錄，分發到國內外各大埠，以擴大宣傳。他們曾多次向中國政府開展減稅優待運動，要求港府改善香港工業條例，向荷屬東印度當局交涉改善入口證書手續。還熱心組織華資廠商參加南洋及香港國貨展銷會，如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組織港商參加第一、二次由星洲中華總商會舉辦的「國貨擴大展覽推銷大會」；至一九三七年，在香港成功地舉辦了四屆國貨展覽會。並請准中國政府經濟部發給會員廠家國貨證明書。一九三八年十月，又分函所屬各會員，參與發起倡設香港中國國貨有限公司。

抗戰爆發後，香港華商又創立了中華國貨產銷協會香港分會，得到中國政府實業部的讚許，工作蓬勃有效，會員逐漸增加，廠商會員計有三十餘單位，在短期內即參與組成港島、九龍、澳門三地國貨公司。其他還有香港藥行商會，九龍商業總會等，對於救國工作，表現熱烈，如購買國內公債、獻金運動、賑災施藥、救濟難民等，均不辭辛勞，竭力以赴。

可以說，香港華商社團的興起和發展，加強了本埠華人社會的溝通互助及其與鄉梓的聯繫。它繼承了中國人傳統注重聯絡感情（包括親緣、地緣、業緣）的因素，又採納了近代商會的組織形式，因而成爲聯繫、團結全體華商的牢固紐帶，事實證明香港華商社團是凝聚而有效率的。

十二、投身近代愛國運動

華人是香港的主體民族，但在英國的長期殖民統治下，卻受到不公正的種族歧視，在政治上無權，在經濟上受壓，因而釀成嚴重的華洋矛盾和衝突，亦激發了多數港商的愛國精神。

港英當局的種族歧視和殖民壓迫

港英政府採用的法律，主要都是沿襲英國的，因而導致了一系列的華洋矛盾與衝突。英國於一八四三年頒發《英王制誥》，這是港英當局在香港實行殖民統治的根本法，它開宗明義地宣布設置「香港殖民地」，因此決定了此後一個半世紀香港的地位和政治性質。港督據此而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在香港推行赤裸裸的殖民統治，其中最突出的表現是實行種族隔離政策。實際上，歧視華人是近代港英法律的特點之一，香港高等法院在審理案件時，也採用雙重標準，對英人百般庇護，重罪輕判，而對中國人則完全相反。爲了壓製和防範廣大華人，港英警察還長期歷行種族主義的宵禁制度、甚至將華人視爲劣等民族、進行欺壓和凌辱。在公然歧視華人的例子中，尤以一九〇四年通過的《山頂區保留條

例》爲最，正式將港島山頂一帶劃爲歐人居住區，華人未經港督特許不得於此度宿。這樣，使香港的華人和洋人彷彿生活在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裏。

十九世紀下半葉，華商的經濟實力增長很快，一躍而成爲港島的最大業主，在香港經濟生活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他們在政治上仍未抬頭，連東華醫院的董事們也被港英當局猜疑抱有政治目的，責令撫華道加以密切注意。香港立法局還通過法例，明確規定撫華道、總醫官和港督指定的其他人員有權檢查該醫院的工作。以後，當華商籌建全港統一有效率的商會時，也遇到了港英當局的刁難和有意拖延。

近代香港人口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動態人口多，流動人口總量甚至超過了常住人口。到港移民很多人並非情願在外國殖民統治下生息繁衍，他們赴港謀生，多是出於無奈，一旦有成，即生返鄉之念。即使是富商巨賈，往往也將眷屬留在內地，並不把香港視作永久棲身之處。因此，有些人口學家稱近代香港人口爲「暫留人口」，特別是抗戰前的大部分香港居民是以香港爲「暫居之地」。

香港華商的情況也是如此，英國人殖民統治下的香港並非樂土。如前所述，親緣、地緣關係和商業經濟共生關係決定了他們的基本選擇和價值傾向仍然是中國和故鄉。應該說，港英政府實行種族歧視和殖民壓迫政策，亦爲華商對香港缺乏歸屬感的極重要原因。外國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激起了

香港華商的憤怒，多數華商的愛國心，並沒有因為身處境外而改變。對此，國人作出了高度的評價：香港華商「歷來對愛國運動素具熱心」。雖然近代中國落後孱弱，但愛國華商對她仍充滿了感情和期望，這裏摘引港商鉅子何東在一九二九年底對英國記者的一段談話以證之，他說：「中國以英國有之能力，廣大之天產，及勤勉之民衆，斷無不能自致世界強國地位之理。」並預言中國「將來必達強國地位」。

香港華商投身近代百年愛國運動，有許多可歌可泣的事迹，以下擇其要者而錄之。

首次反殖大罷市（一八四四年）

英國侵佔香港後，為了對華人羈縻籠絡，在港府行政長官中，特設華民政務司（意為華人的保護者），專管華人的一切事宜，故又有「撫華道」之稱。一八四四年八月二十一日，港英當局借口港島治安混亂，令立法局通過法例，決定在華民政務司主持下對全港人口進行登記，並徵收居民人頭稅。此《人口登記條例》的本意「主要是針對中國居民」，卻裝作一視同仁，規定港島居民不分國籍，均須向總登記官領證辦理，以致引起在港中外人士的一致反對。西商認為同華人一起登記降低了身分，有失體面。而廣大華人則認為此乃變相徵收人頭稅，理所當然地要進行抵制。

這年十月三十一日（即《人口登記條例》生效的前一

天），港英政府及私人所僱用的華工率先舉行罷工，宣辦們也開會決定離港，當天離港回粵的華人即達三千以上。翌日，全港華人店鋪和街市舉行總罷工，各行各業完全停頓，食品供應中斷。同時，因港督拒絕了華人代表的抗議書，使形勢訊速惡化。據當時西報記載所描述的情形，「於是，香港的一切中國商人的業務，工匠以及中國僱員僕役的工作，全停頓了。他們並準備如果這種新法例一旦付諸實行，他們便撤退香港。」十一月二日，港府懼怕事態進一步擴大，被迫急忙發出通告，宣布新法例在修改以前暫不實施。同月十三日，立法局通過《人口登記及調查戶口條例》，作了一些修正，規定公務員、軍人、商人、專業人士以及年收入達五百元以上者均可豁免登記，其他需登記者，也主要是登記職業和地址，並且取消徵收登記費。至此，華人的要求得到了滿足。

一八四四年港島中國居民的罷工罷市，是英國割佔香港後爆發的第一次大規模反抗殖民壓迫的鬥爭，作爲華人社會主體的港商積極投入罷市，對於保證鬥爭的勝利結束起了重要的作用。

離港歸鄉運動（一八五六至一八五八年）

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香港成爲英法聯軍進犯廣州的基地，華人社會再次掀起了大規模的反侵略鬥爭。

一八五六年十月下旬，英軍炮轟廣州城，焚毀民房和舖戶，並一度闖入城內肆行劫掠。香港及鄰近地區的中國居民對英軍的侵略行徑極為憤怒，紛紛行動起來。新安縣愛國士紳集會議決嚴禁向香港提供食物，並號召凡在港開設店舖者，一概停止交易，限一個月之內返家。年底港島華人響應號召，關閉店舖或辭掉工作，紛紛返回內地，永泰、和生、萬泰等三家大米舖率先停止營業。據當時的一份探報說：「各莊口凡唐人大半告去」。

翌年十二月，英法聯軍再度攻佔廣州，香港華人的反英情緒非常高漲，不少人憤而回粵。英國領事巴夏禮迫令廣州巡撫貼出告示，催促他們返港，但並無多大效果。一八五八年春，廣東愛國紳商亦發告示，號召封鎖制裁香港，並要求香港華人歸鄉。香港同胞者奮起響應，香山、新安、番禺、東莞等縣在港的商人、僱員、工人及水手返回者，「幾於十之七八」。

成千上萬中國居民離港和封鎖香港行動給予外國侵略者以沉重的打擊，使港島食物匱乏，物價暴漲，生活環境惡劣。香港外商致函港督包令，驚呼中國人的反抗行動使其日常生活處於「完全癱瘓」的窘況。而包令亦無可奈何地承認：「我們現在正在吃着戰爭的苦果」。

反法大罷市（一八八四至一八八五年）

中法戰爭爆發後，香港華人社會反法情緒激烈，他們採用各種方法同侵略者進行鬥爭。據當時出版的《述報》評論說：「自中法開仗以來，凡我中國士民莫不志切同仇，心懷敵愾。即下至負擔之夫、工役之輩，亦皆深知大義，不肯為敵人之用。」

香港華商表現也很堅決，他們拒絕賣東西給法國人。戰爭期間，法軍經常到香港買煤，而香港煤業基本上是由華商經營的，許多煤商拒絕給法軍售煤。法國人既使開出高價，也很難採購到諸如煤、食品及軍需等物。

港英政府表面上守中立，實際卻明顯地袒護法國侵略者，為法海軍提供許多便利。法國軍艦常從香港駛出攔截中國船隻，其運輸船經常駛入香港補充軍需，在作戰中損傷的法國軍艦也常開到香港來修理。港英當局還以各種手段壓制華人的反法鬥爭，處罰甚至拘捕愛國華人。這些激起了華人的強烈不滿，反法鬥爭迅速發展成為同港英政府直接對峙的罷工罷市。一八八四年十月初，華人舉行了大罷工，西營盤一帶的商店也舉行了罷市。港府壓制罷工罷市，竟頒布《緊急法例》，並實施宵禁來應付。

針對英法的鬥爭使香港整個港口陷入停頓狀態，給了侵略者以極大教訓。事後，英國在華《北華捷報》將這次罷工

罷市形容爲「香港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一次暴動」。

抵制美貨運動（一九〇五年）

中美兩國曾於一八九四年訂立《限制來美華工保護寓美華人條約》，以十年爲期，即在十年內不許華人赴美謀生。一九〇五年，該約已滿期，美國又擬續約。爲反對此舉，全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拒約及抵制美貨運動。由於旅美華僑以廣東籍最多，故南粵的拒美運動規模大、時間長。

儘管香港政府禁止反美集會，但港商還是響應內地商界的號召，加入反美拒約的鬥爭行列。如米行經理們集會表態誓不購買美貨，有些商人還致電上海總商會，表明抵制美貨的決心。同年十一月十五日，粵港商界同人訂立《謀破美禁工例議案》，共有十五條，主要內容爲要求美國政府撤除對一切有技術及商店上下伙記人移民的禁令，並與美國人一律相待，刪除美國華人註冊之例，華人出入美境不得無故留難，刪去用驗身尺來驗度華人身材之侮辱性法例，在美華人可自由來往等。

最後，主要由於清朝政府的壓力和港英當局的干預，對美主和風成爲主流，拒約抵制美貨運動遂以妥協而告終。

抵制日貨運動

中日民族矛盾與衝突在近代史上表現得特別嚴重和持

久，故中國人民抵制日貨的經濟鬥爭也是經常性和長期進行的。

早在一九〇八年二月，發生了「二辰丸事件」，其緣由是：澳門商人柯某購買日本軍械由日輪「二辰丸」號運抵澳門海面，被清軍艦艇緝獲。日人提出抗議，粵督張人駿卒以賠償損失及鳴炮謝罪了事。廣東人民引以爲大恥，由粵商自治會發動了近代第一次抵制日貨運動，「影響所及，達於全國，極至南洋美洲各埠」。

香港商界積極響應，組織「振興國貨會」。據《申報》記者報道，港商還辦有一個「國恥會」，係由南海九江人曾某發起。當內地抵制日貨的活動已近尾聲時，香港還有抵貨激烈行動，這次運動持續達八個月，日商損失頗大。

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爆發後，全國出現了反帝愛國高潮。香港華商同省港人民的鬥爭協調一致，都在各會所集議抵制日貨，提倡國貨。許多華資企業的廣告詞都寫上：「請用土貨以救國亡」，號召同胞奮起相抗。如香港興華製麵公司的一則廣告中寫道：「處今日外交失敗之秋，而欲我國圖存，仍立於環球世界之上，非從事商戰未由。本公司敢大聲疾呼曰：請我國同胞，急用土貨以救國亡！蓋土貨興，則利權挽；利權挽，則漏卮塞。國賴以強，民賴以富矣。」反映港商利益的輿論工具《香港華字日報》也發表評論，稱讚各地罷市「爲一種秩序的統系的示威運動，實際上固隱然認此

爲國民自衛之武器。」並痛斥此次對日外交之失敗,「實由於北京當局之甘心賣國」,表示支持各省商工學各界的「討賊運動」。

在此後的歷次抵制日貨運動中,香港華商都能積極地參與。

支持中國人民對澳門的嚴正立場

清朝末年,中葡兩國就澳門界址問題發生爭端。一九〇九年,兩國政府雖開了談判,粵人積極參與,成立了廣東勘界維持總會,香港華人也設立勘界維持會,盡力支持。港商的表現也很積極,如楊瑞階等一再要求粵督在談判中不可退讓;陳席儒原籍香山,於澳門問題有切身之感,他上書廣東勘界維持總會,提議將數十年來誤設在澳門管內的拱北關辦事處移回中國管內灣仔或前山,並從界務、關稅、商務等方面來論證此舉之必要性。

積極調解省港大罷工(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

五卅慘案發生後,激起了全國民衆的反帝怒潮,各地都舉行了游行示威和罷工罷市。一九二五年六月中下旬,香港華人也開始了罷工,豬肉行、鮮魚行、茶居及酒樓的商人亦有罷市。六月二十三日,廣東各界群衆和省港罷工工人十萬人舉行反帝示威大游行,當游行隊伍行進到廣州沙基時,對

岸沙面租界的英法軍隊竟用機槍掃射，造成嚴重傷亡的又一慘案。消息傳至香港，使罷工罷市規模更爲擴大，大批華工和港商乘火車、輪船回到廣州。僅半個月內，離港人數已達十五萬之多。自七月十日起，省港罷工委員會宣布封鎖香港及新界口岸，「所有輪船輪渡一行禁止往港及新界，務使絕其搶食制其死命」。省港大罷工使香港社會頓時陷入癱瘓，一夜之間變成了「死港」、「臭港」。

省港大罷工使香港商業的損失最爲慘重，據省港罷工委員會的估計，香港方面的經濟損失每天平均達四百萬港幣。僅一九二五年最後兩個月時間內，香港破產的商舖便有大三千多間。正如香港立法局華人議員羅旭和在一份備忘錄中寫道：「這場風波已經動搖了我們經濟結構的根基」。這《倫敦郵報》也承認：「一九二五年英國尊嚴之墮落，實爲中英通商二百年來所未有」。

香港華商出於自身的經濟利益，對罷工和封鎖所造成的衝擊也非常關切。他們一開始便主張和平解決，並願參與調解，但被持強硬態度的港督所拒。港英當局還以針對商店來威協欲罷市的華商。一九二五年八月十日，香港中華總商會和二十四行召開秘密會議，商討如何應付罷工後香港的局勢，並通過了一系列秘密決議，呼籲立即採取有效措施，挽救行將崩潰的香港金融與貿易，港英政府不能無視商民的意見，在此後中英交涉解決罷工問題時，也允許港商從中發揮

一定的作用。

九月下旬，香港各邑商會聯會經港英當局同音出面調停，派出由謝樹棠、楊西巖等代表一行十七人抵達廣州，受到省港罷工委員會的熱情歡迎。蘇兆征委員長發言，表揚港商代表「本愛護桑梓的熱誠，來省調停罷二事項」，他對「代表諸君的盛意，已很明瞭，但以救護國家爲心，甚爲感佩」！並希望「工商從此聯合起來，以求我中國日登於獨立和自由之地位。」省港罷工委員會提出解決罷工的三十條政治和經濟上的條件，交港商代表帶回香港。同月，南洋烟草公司致函罷工委員會，表示對罷工「至爲欽佩」。因近天寒理應籌衣，特「認送愛國布棉衣二千五百件，共値毫銀四千元」。



港商聞人周壽臣爵士（明報資料室）

十一月下旬，應香港華商之邀請，廣州商界代表團回訪了香港。香港政府特派代理布政司弗萊徹（A.G.M. Fletcher）出面隆重接待，並趁機對外宣布：港府擬任命遮打（Paul Chater）、賓那（D.G.M. Bernard）、周壽

臣和羅旭和等四人爲全權代表，赴廣州磋商解決罷工問題，由此打破了僵局。

港英政府在與粵方的初次交涉中缺乏誠意。但商界要求談判解決罷工的聲乎很高，港府曾召集大商家開會，徵求其對於解決罷工的意見。華商還組織了「解決罷工促進俱樂部」，要求港府派代表去廣州談判。爲了遮人耳目，港英當局對外宣布，稱其不能參加對廣州政府的談判，但不妨礙華商自己籌集資金來解決罷工問題，以便推卸責任。

十二月底，由旅港各縣商會代表組成的港僑懇親團抵穗，粵方歡迎會異常熱鬧。蘇兆征演說，對懇親團遠道前來慰問，甚爲感謝，「此後省港工商感情，當日益親善」。謝樹棠的演說也很熱情，說「此次組團晉省，以期待彼此開誠相見，遇事不致隔閡。省港工商攜手合作，今已達到目的。」與此大約同時，香港華商總會，東華醫院等選派的八名代表亦到廣州，商談關於給予罷工工人經濟賠償條件問題，由於他們「無全權」，故粵方拒絕與之談判，致使其兩天後即無功而返。

儘管如此，應該說香港華商對於解決罷工問題是盡力而爲的。當然，他們對待省港大罷工的態度確有一定程度的差別，特別是中小商人對廣東革命政府比較友好，同情罷工和罷市。曾組織港商代表團，港僑懇親團及華僑參觀團，到廣州參觀，訪問並慰問了罷工工人。而富商階層則較親近港

府，對罷工工人所提之復工條件不甚讚許。

抗日捐款獻金及賑濟運動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抗日戰爭爆發。中華民族面臨空前的危機，全國人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共赴國難，香港華商表現出極大的愛國熱忱。在捐款獻金活動中，因其是有較雄厚的經濟實力，故貢獻尤大。

商會尤其起到了重要的號召和組織作用。如香港華商總會轄下有商賑會、勸募公債分會及賑濟華南難民聯席會等機構，以專責成，辦理事務，成績卓著，華商會所以建築本會所基金十萬元移購救國公債，開本港以社團名義購國債之先河，華商俱樂部設勸銷救國公債委員會，不辭勞瘁；普益商會積極參加勸募國債和長期捐薪運動，後又在獻金救國運動中出資十多萬元，鮮魚行總商會對於購買國防公債、獻金捐款、募款散賑、徵募寒衣等活動，無不參與，所費逾十萬元；糖商總會設兵災籌賑委員會，訂定徵收義捐辦法，用以散賑和購債之款共達數十萬元，酒樓茶室商會所出各款也有十餘萬元，廣肇客棧行廣聯商會在主席林培生領導下，首倡籌募義款，曾在一周內即籌得義款上百萬元。還舉行長期節食捐薪和勸銷各類公債活動，被譽為「模範救國團體」等等。

香港華商的這種愛國義舉貫穿於抗戰前期。直到一九四

一年五月，國民政府戰時公債勸募委員會秘書黃炎培赴港勸募公債，得到各界熱烈響應。香港華商總會和中華廠商聯合會以團體名義分別認購或勸募十多萬元，其他如馮強樹膠廠、南洋烟草公司等企業亦踴躍認購，各界合計共達四百一十餘萬元。

在籌募善款，捐獻寒衣，救濟傷兵難民等方面，港商社團亦不遺餘力。一九三八年十月，廣州失陷深圳棄守，內地難民不斷湧入香港新界，缺衣缺食，亟待救濟。旺角工商界發起散賑運動，爲了避免各自爲政，於是提議組合成立了新界難民賑濟會，統一辦理賑濟工作，成效頗佳。翌年一月，又組成九龍商業總會，會員增至了百餘人，會更有起色。同時，香港七十六個商團還聯合募集寒衣三十六萬件，幫助受難同胞。

東華三院戰時爲救助難尤爲出力，頭一年即爲數萬內地難民提供食宿，並資遣其返回原籍，或轉送廣州難民所安置。廣東沿海淪陷後，又繼續幫助成千上萬穿越邊界進入香港的難民，情景十分感人。

在抗戰中，香港華商還自覺地起來抵制日貨。如蘆溝橋事變後，香港電器商會率領同業舉行了兩次宣誓拒辦日貨；華商匹頭商肆約有二百多家，其效忠祖國，不肯後人，全行宣誓不營日貨，「誓辭旦旦，戴在約章」。華資工業也貢獻匪淺，如馮強樹膠廠大量生產「愛國鞋」，大華鐵工廠和捷

和鋼鐵製造廠承擔了中、英政府軍用物品（鋼盔、防毒面具、軍用水壺等）的定製任務，開我國民營工廠製造兵工器材之先河，電炬業向盟國源源輸送電筒電池等。

珠江三角洲及廣東沿海縣市，是港澳同胞大部分人的原籍所在，日本入侵以後，旅港各邑商會又發起救鄉運動，籌款賑濟，並利用香港與世界各地易於聯繫的有利條件，聯絡海外鄉親，救濟故里難民。這方面的事例還有很多，一直持續到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攻陷香港爲止。

十三、鼎力支持民主共和

香港是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民主運動的搖籃之一，華商從中扮演過非常重要的角色。

早期港商的維新變法思想

十九世紀後葉，香港華人資產階級初步形成，其主要社會基礎是以洋行買辦和轉口貿易行商爲代表的新式商人，他們也開始向近代企業投資，使商業資本與產業資本相結合，經濟實力有了明顯增長。以其爲對象和基礎的中文報紙紛紛創刊，向國內外廣泛宣傳華商的政治主張、愛國思想和經濟利益。

《循環日報》創於一八七四年二月四日，是香港第一家純由華人資本經營的報紙，特點是每日登載政論一篇，評論洋務、鼓吹學習西方之術以變法自強。近代中國著名的維新思想家、政論家王韜親自擔任該報的主筆，以《變法》、《變法自強》、《重民》、《除弊》、《興利》等爲主題，撰寫了大量政論文章，比較系統地宣傳了變法自強的政治改良主張。比起國內洋務派，王韜更有獨特見解，認爲除了學西方的船堅炮利外，還要學習外國在社會風尚、行政管理方

面的長處、對人事、軍事、教育、法律等制度進行改革。他推崇「君民共主」，高度評價英國的政治體制，否定了當時中國的封建專制。他還大力鼓吹發展實業，「令民間自立公司」。《循環日報》比較集中地反映了華商要求發展資本主義的願望，在國內外發行面很廣，在華人中產生了很大的政治影響。

積極加入革命團體

盼望中國強盛乃香港華商的世紀之夢，他們在港深受殖民當局的歧視和凌辱，在內地的經濟活動往往又遭到封建官僚和外國勢力的壓制和排擠，因而同情和支持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事業。

香港處於清朝政府的直接統治之外，而又鄰近大陸，進出方便，有利於革命黨人以經商作掩護，積極開展活動。在辛亥革命時期，興中會和同盟會都曾將香港作爲重要的工作據點。一八九五年一月，孫中山抵達香港，與當地的愛國團體輔仁文社成員合作，以「乾亨行」名義作掩護，籌建香港興中會，港商楊衢雲、黃咏商及謝纘泰等均爲骨幹。謝氏是政治改革家、商人、買辦，還做過記者，年少時即立志要以武力推翻滿清王朝。他倡議成立輔仁文社的目的，是要糾合同志、武力反清。與孫中山合作後，該社解散，並入興中會。謝纘泰還倡議成立了香港華商會所，以便於同富商階層

溝通聯絡，爭取其支持革命活動。

一九〇五年中國同盟會成立後不久，孫中山委託馮自由、李耳重等到香港，着手籌備同盟會香港分會，首次在港加盟者有約百人，其中港商李紀堂、鄭貫公、林直勉等是頗具影響的人物。一九〇九年秋，同盟會南方支部宣告成立，最初的開辦經費即由林直勉捐助。李紀堂、鄧蔭南等在香港新界開辦的農場，也常被用作革命黨人的招待所，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爲武裝起義籌集巨資

由於港商的慷慨解囊，使香港成爲革命黨人的經費籌集之地。香港史學者的研究成果表明，孫中山「第一次革命嘗試及其後的數次起義都在香港進行組織工作、革命運動又獲得香港富有華人的財政援助，這都不是歷史的偶然。」

清末，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發動的南方武裝起義，多數都靠了港商的大力支持。如乙未廣洲之役（一八九五年）所需經費臨時出了問題，幸得黃咏商和余育之兩位華商的及時囊助，才使得起義得以照原計劃進行。黃咏商毀家紓難，變賣住宅以籌軍費，余育之所經營的日昌銀號亦捐餉上萬元，楊衢雲則負責購買槍械並冒險運往廣州供革命黨使用；庚子惠州之役（一九〇〇年）浩費大約十萬元，其中十分之二三是由李紀堂承擔，起義失敗後，他又供給善後費用；洪金福廣

州之役（一九〇三年）所需軍餉經費則是由清一色的香港華人承擔，主腦人物為謝纘泰、李紀堂、洪金福，連軍裝及其他用品都是在香港備置好，然後設法運入廣州；潮州黃岡之役和惠州七女湖之役（一九〇七年），主要經費是由李紀堂、曾錫周、馬培生、李海雲等港商所籌集；廣州新軍起義（一九一〇年）原定由孫中山在海外籌集全部經費，但到起義前夕尚欠二萬元，李海雲遂將所營遠同源兌業商店之股東存款二萬元全數提出，解了燃眉之急，黃花崗起義（一九一一年）之前，黃興曾在李紀堂所提供的屯門農場居住和策劃起義事宜，整個起義的組織活動都與此農場有密切關聯。

大力捐助革命報刊

《中國日報》是中國第一份革命報刊，一九〇〇年一月二十五日創辦於香港。它實際上是興中會和同盟會的機關報，在宣揚革命宗旨和推廣革命理論方面起了極重要的作用，被譽為「中國革命提倡之元祖」。

但《中國日報》自創刊後連續不斷地出版達十三年之久的過程中，卻曾數次因遭受經濟困難而面臨倒閉危機。幸虧得到幾位愛國港商的及時支援，才免於夭折。最初幾年的辦報經費，大部分是由李紀堂個人支付。一九〇六年該報發生了倒閉危機，因有李煜堂斥資五千元款項增添入股，才安然渡過。一九〇八年再次面臨經濟破產，幸得林直勉出資認購

該報新股三千元，才將其挽救過來。

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前，尚有至少十餘種革命刊物是在香港出版的，例如《廣東日報》、《東方報》、《世界公益報》、《時事畫報》、《香港少年報》等。愛國華商捐助創辦革命報刊的經費爲數頗巨，對於堅持革命與論陣地的貢獻實在相當大。

連當時的西方報紙也注意到香港華人在辛亥革命運動中的重要作用，如一九一一年五月二十九日發行的《士篾西報》載文寫道：「熱心支持反清起義，慷慨獻出財產資助革命的人，沒有哪個地方比香港更多的了。」孫中山在總結辛亥革命勝利的原因時，曾講過「華僑是革命之母」，這其中也包含了衆多港商的無私奉獻。

熱烈慶賀武昌起義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義爆發，在全國引起連鎖反應，各省革命黨人紛紛起來響應。迅猛發展的革命形勢，在香港華人中也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他們欣喜若狂，各商店均停止貿易，到處新旗飛揚，并燃放花爆以示慶賀。

由於革命黨人長期在香港從事活動而產生的影響，和香港作爲中西文化交滙之地所受西方思想文化的濃厚薰染，大部分香港華人都同情與支持辛亥革命運動。香港英文報紙《德臣西報》於當年十一月七日報道：「斷言每一百名香港

華人中有九十九名同情亂黨（指革命黨），而且也許有百分之七十五是狂熱的、不顧一切的同情者，準不會錯。」港督盧押在給英國殖民地部大臣的報告中也寫道：「香港居民在感情上是熱烈支持共和的」。不久後，他在另一份文件中再次強調：「香港華人幾乎全部都不僅是同情革命，而且深爲強烈的革命熱誠而激動。」

廣州軍政府的財政支柱

香港華商大力支持廣東對滿清政府獨立，並採取實際行動促成了廣州軍政府的成立。

武昌起義成功後，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廣州士紳和商人社團集議，議決「應即承認共和政府」。會後，廣州方面派出代表赴港與華商會晤，港商表示支持「廣州獨立」，並認爲此乃「自保之道」，不可與「無故反叛」同日而語。在原兩廣水師提督李准投誠革命黨一事中，港商還起了特殊的作用。在李准派人赴港與胡漢民商談投誠的具體事宜時，港商李紀堂和韋玉充當了中間人的角色，爲雙方傳遞訊息，並提供會面場所。手握重兵的李准轉向，使廣東的形勢迅速明朗。十一月九日，廣東宣布共和獨立。第二天，胡漢民由港抵穗。就任粵省都督，廣州軍政府由此誕生。

當廣東正式獨立的消息傳到香港後，華人社會舉行了大規模的慶祝。據報紙記載：「每家門首高樹民軍旗，午時大

放鞭炮致敬」，據估計僅燃放鞭炮即花費了十萬港元。

同年十一月十六日，北京清政府下台的消息傳來，「闔港人民無遠無近均燃炮竹，其聲隆不絕耳」。當晚，「各商店高懸新式之旗」，先施公司，多福及各商店有數百人剪掉髮辮，艷芳影相館還高招「新漢萬歲」四字的大旗和孫中山等革命領袖的放大肖像。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孫中山被推舉爲臨時大總統，香港許多華商社團和社會名人紛紛致電以示祝賀，情景感人。

廣州軍政府成立後，接納了不少港商擔任重要職務。如李煜堂爲財政司長，何啓、韋玉爲總顧問官，李紀堂爲樞密處成員。何啓和韋玉又是香港政府立法局華人議員，他們早在革命爆發之前就得到革命黨人的信任，並參與機密，而且未向港府報告。香港總督認爲他們將同情和贊助革命的立場置於效忠港英政府利益之上，大爲不滿，曾建議英國政付從此以後不再委任其繼續擔任立法局議員。

初期廣州軍政府面臨嚴重的財政困難，因前清兩廣總督張鳴岐逃走時，將省庫銀兩席捲而去，造成銀根短缺，軍隊給養，政府開支均無來源。爲穩定人心和物價，軍政府只好向商人借款，廣州、香港商人均踴躍墊支。軍政府還在香港設立籌餉局，由港商楊西巖擔任會長，以發行債券等方式來籌款，得到香港華人的有力支援。李煜堂、楊西巖等人爲發動港商籌集巨款，立下了汗馬功勞。作爲廣州軍政府首任財

政部長，李煜堂通過港商楊西巖、陳賡虞等很快即借得款項四十萬元。

另據港督盧押致英國殖民地部大臣的信函講，廣州軍政府代表曾到香港聽取華人領袖的建議，並尋求金錢援助。據有人向港督報告，港商的捐款很快即達約一百萬元。還有資料表明，廣州軍政府於一九一二年四至五月間發起募集內債，「香港商人公舉阮荔赴日本及各埠勸募內債」。香港銀業界也致電省城，表示響應。此外，華人在香港還建立了一個強有力的委員會，表面上是爲了重建粵港貿易聯繫，由港商劉鑄伯（其在香港政府潔淨局具有正式職務）擔任主席，而其關心的純粹是中國政治。

孫中山的南京臨時政府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亦曾向港商借款約二十五萬元。正由於香港華商人士鼎力募捐贊助，一時緩和了民國初建時革命政府的財政困難。

香港愛國華商對於民主革命事業的支持一以貫之。現在華商會所接待大堂裏，還保存有一幅孫中山的照片，旁邊說明這是一九一三年孫中山出席該會所舉行的酒會後，親筆簽名饋贈的。一九二三年初，孫中山第三次在廣州建立革命政權，即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港商楊西巖、李煜堂、馬永燦、郭泉、伍學熀等，分別出任內政部次長、建設部次長、兩廣鹽運使、禁烟督辦及財政委員等重要職務。香港工商銀行初爲孫中山與華僑聯絡的機關，主要是起政治作用。香港

華商銀行款項亦曾大量用於支援國內革命政府。這年二月中旬，孫中山離開上海，途經香港重返廣州。在港停留中，便是下榻於楊西巖的私宅。孫中山曾在此住處接見香港工商代表，表示希望其今後能支持革命事業，得到了積極的反應。

十四、實業救國的海外典範

「實業救國」，是許多愛國人士創業的初衷。一八九五年濟安洋面保險公司的創業廣告中有這樣一段話，即「現海禁大開中外互市，我華商竊恐自有利源偏流傍落」，這切實地反映了早期港商的憂患意識及創業動機。

創辦實業之端因

因受濃厚愛國心所激勵，華商勤奮創業，以圖報效祖國。這樣的事例實在很多，例如：陳任國親見「清季國勢漸微，外患日迫」，故「奮然思起」，創辦了陸海通有限公司；馬五山糖果餅乾公司很早即揭櫫「實行振興土貨主義」，雷惠波則表示「欲籍以與外人角逐於商戰場中，稍盡富國富民之道於萬一」；馮平山創業亦爲「抱愛國之熱誠，具仁民之宏願」。

「振興國貨，挽回利權」，頻頻出現於企業廣告之中。如南洋烟草公司是鑒於洋烟銷華造成莫大漏卮，「欲挽回烟草之利權」而創，香港興華製麵公司呼籲人們「請用土貨以救國亡」，二天堂製藥廠主張「工業救國」，發展生產提高質量，「與外貨爭衡」。總之，華商們確認興辦實業，「步

武歐美之富強，救起同胞之貧困，皆在此舉」！

競爭強勢的國貨製品

香港華商銳意經營，提高產品質量，擴大國內外市場，抗衡舶來貨，挽回了不少利權，做出了驕人的成績。例如：

二十世紀初，港人所用化妝品全屬洋貨，以後華資企業紛紛成立，著名者有廣生行、百家利、三達化學、南華、先施化妝品公司等，所產價廉物美。到三十年代，洋貨已基本被逐出香港市場。抗戰結束後，華資化妝品甚至「大有遍及全球之勢」。

電炬業（包括電筒電池電珠製造）向居港製品主要輸出三項，其產品既比西洋貨價廉，又較日貨耐用，行銷於南洋及印度一帶，擁有穩健的海外市場。光宇廠製造的「地球牌」風燈，工精價廉，在海外極為暢銷，是德國貨品的強勁競爭對手。

廣東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是我國成立最早的民族捲烟企業之一，「自創辦以來貨色精良，風行海外」，與強大的對手英美烟草公司抗衡達數十年之久。

民國初年，國內工廠製品需罐裝者，唯購洋貨。而香港華益印鐵製罐廠創立後，製罐質量優良，價格亦低於洋罐，故銷路旺盛，其營業很快即佔有全港所需定貨的九成以上。連太古糖廠、美孚、德士古、亞細亞火油公司、屈臣氏等外

商大公司，亦前來定貨。

油漆用途極廣，早時進口量驚人，每年漏卮甚巨，華商遂起而自行設廠製煉。如國民製漆有限公司，出產中國最新的噴油漆，售價僅爲洋貨的六成，故在市場上甚爲搶手；香島製漆公司在戰後初期，亦曾佔有華南、港澳台及南洋等地的銷場。

在其他方面，如大批的華資製藥企業長期與洋藥爭衡，「亦挽回利權不少」。糖果業生產臻臻日盛，使「舶來品之市場已瞠乎後矣」；皮具製造業多屬老字號，產品在海內外有牢固的信譽，早在二十年代末已將洋貨排擠出香港市場，並大量出口到海外；膠鞋業的成就也很顯著，港產膠鞋曾一度成爲世界鞋市場的主要貨源地；藝興、粵生等機器廠生產的各式印刷機，暢銷於華南、南洋乃至非洲等地，沉重地打擊了日貨泛濫，製帽業佔據了南洋和國內廣大市場，抑制了舶來品的擴張；粵興照相卡紙公司大量生產以供應國內及南洋各埠，使洋貨爲之失色，連素稱落後的玻璃業，也利用抗戰初期國內外抵貨運動的機會，大力開拓，將日貨逐出香港及南洋市場。

香港最重要的經濟實體

香港開埠之初，以英商執經濟界之牛耳。但華商勢力很快便趕了上來，開創或佔領了許多行業領域，到二十世紀三

十年代，已發展成爲香港最重要的經濟實體。

在香港經濟史上有致關重要地位的轉口貿易即歸功於南北行、金山莊的興起。南北行是香港商業發展期最重要的行業之一，中國內地土特產和南洋貨品，大都經由其進行轉口交易，爲香港成爲轉口貿易埠奠下了基石。該行的商家長期控制着香港的米行、藥材行、瓷器行、紙業、茶葉業、涼果業、柴碳業、匯兌及僑批等行，實力雄厚。金山莊行的形成稍晚於南北行，它是隨着近代中國勞工販運和海外移民浪潮而興，兩頭聯繫着海外華人社區和祖國僑鄉，有着獨特的功能。

南北行、金山莊的相繼興起，是十九世紀中葉香港華商實力增長的突出標誌。當時，香港與中國的雙邊貿易已開始擴及全國各地，港商的足迹遍及北方。如據一八六六年海關貿易報告，天津港口有二十家中國商號在經營海上運輸（使用外國船舶），它們全是來自廣東和香港商家的分號。華資行商在不太長的時間內，積累了巨額財富，因而成爲港商的「中堅力量」。王韜曾在《循環日報》撰文介紹這個時候香港華商的崛起，寫道：「近十年以來，華商之利日贏，而西商之利有所旁分矣。即如香港一隅，購米於安南、暹羅，悉係華商爲之，凡昔日西商所經營擘畫者，今華商漸起而預其間」。連當時的香港總督也不能不承認：香港的發展是「有賴在港的華人」。

香港華人的另外一支重要的經濟力量，洋行買辦這時也通過自立行號，向商人轉化，成爲香港貿易經濟的重要支柱。到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初，華商經濟實力逐漸趕上英商。他們已是港島上的最大業主，港督軒尼詩曾對立法局議員說：香港稅收，「華人所輸，十居其九」。

大約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華人金融資本機構不斷湧現，歷史最悠久者爲瑞吉、鄭天福等銀號，它們建立了自己的組織聯安堂和金融貿易場，有店舖數百家，所掌握的資本超過千萬元。銀號是中國傳統的金融業務機構，香港銀錢業與本埠華商各行廣通聲氣，以輔助其金融流通，並對香港同內地的金融調節亦起重要作用。

二十世紀初，華商經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新式金融機構——銀行業隨之勃興。華資銀行最盛時達到二十多家（包括非香港注冊者），組織了香港華人銀行公會，以中國銀行港行居於首席。並在由中外銀行合組的香港匯兌銀行公會中佔有半數的席位。

民國前期，華商產業資本的發展也很突出，新建企業數量很多。作爲近代產業骨幹的織造業迅即崛起，工業門類趨於齊全，各行均有了一批頗有實力的大中型企業，生產水平也由手工業而轉向機械化。在工業投資方面，據抗戰前香港貿易調查委員會報告，一九二〇年時歐人對香港工業投資總額爲五千萬元（包括船塢、水泥、製糖、服裝、公用事

業），以後未作增加。同年，華商對香港工業的投資額約一七四九萬元。但一九三四年時，則已增至五千一百二十四萬元。抗戰初期，香港華資工廠突破千家，創空前紀錄。據日本人估計，由於華資工廠迅猛發展，一九三九年時的投資總額大體已達到七千四百萬元。當時出版的《香港商業年鑑》即已指出：「香港所有的工業大多數是華僑資本的。」

就整個商業而言，早在一八八一年六月，港督軒尼詩在向英國議會的呈報中講道：「香港很大的一部分商業由華人經營，華人是最富有的商人」。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末，全港商業大部分都已掌握在華商手裏。根據戰時出版的《香港華僑工商業年鑑》資料統計概算，一九四〇年時，全港一百二十餘個行業中，除洋行、銀行、保險、航運及糖業等為華洋均沾外，其餘基本上都由華商經營，估算每年營業額高達十多億港元。

經過幾代人的奮鬥，華商資本終於成為香港最重要的經濟實體。

「港商」的定型概念

香港華人資產階級是在十九世紀初步形成的，但從整體上講，那時華商資本的行業還不夠齊全，經營管理手段比較落後，獨立性尚不太強。如華商是以從事轉口貿易奠定其發展之基礎，但南北行、金山莊直至二十世紀初還未達到行業

發展史上的鼎盛階段；在商業和金融業，仍由傳統的商號和銀號佔據着主導地位，買辦對近代航運、金融、保險、工礦、電訊業的投資，較多是附股於洋行（也有些附股於內地官督商辦或一般商辦企業）的類型，自辦企業（包括獨資或合營）未居主流；一些比較重要的新興行業如銀行、百貨公司等尚未形成。此外，港商的來源地還比較狹窄，基本是就是剛到香港立足不久的粵商（辛亥以前，眞正在香港出生、成長或久居的人口很少）；華商社團以會行爲基本的組織形式，具有同業壟斷、自我封閉的性質，因此被指責「多散漫無序，作用不大」。直到十九世紀末，中華會館和華商會所相繼創設，才成爲港商組織集團之嚆矢。

二十世紀前期，香港華人資產階級發育趨於成熟。首先，華商的來源更擴大了，大陸商民及海外僑商對香港的移民或投資達於高潮。如清末南海縣海商招雨田創立祥和商號，苦心經營，逐步推廣，到其子時迅速發展至「百數十家」，其中以香港廣茂泰爲總機關，成爲著名的大商幫。日本華僑簡照南一九〇五年在香港創辦順泰輪船公司，購船往來日本，暹羅以至歐美各國商埠貿易。其族弟簡英甫也赴南洋群島經商，簡氏兄弟以此成爲商界巨頭。余仁生號的辦人余廣生、余東旋父子是馬來亞華僑，一九〇九年到港島設總店，主要業務爲制售傳統中藥，在香港及新馬等國之華人社會中知名度相當高。

其次，華資行業門類進一步拓寬，已囊括轉口貿易、百貨商業、銀行銀號、保險、航運、工礦、地產、服務業等各個領域。華商投資經營的獨立性加強了，企業經營形式多爲港商自營（獨資或合資），橫貫海內外的聯號企業大量形成。不僅多數行業經營達於鼎盛，甚至在諸多方面獨佔鰲頭，成就卓然。

第三，統一而有效率的華商社團也已確立。自香港第一個近代意義上的華人商會——中華會館成立後，資產階級工商團體陸續誕生。尤其當一九一三年香港華商總會成立，成爲港商之軸心團體。各邑商會、各行商會從此蓬勃興起，在聯絡、團結各界華商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經濟發展促使港商開始關注信息的傳播和聯絡的暢通。一九〇八年三月，馮華川、何啓、韋玉、劉鑄伯、陳宜禧、李煜堂等人聯合署名刊登啓事，希望香港各商家「踴躍玉成」，早日出版《華商人名錄》，以適應「香港及內地商務繁盛，華人營業日有加增」的必然要求，這些都反映華商一定程度上的本體意識在確立。

海內外華資在港長期交融的結果，使「港商」成爲一個定型的概念，它既是一個經濟實體，也是一種政治力量，主要代表香港華人有產階層的利益，對香港社會有很大影響，與國內政治經濟也有密切的關係。無庸諱言，在香港這塊商業氣息特別濃厚的英屬領地裏，一般華人社會的政治意識比

較淡薄。所有華商社團都明確表示不以政治活動爲宗旨，如華商總會所辦刊物，即爲「純粹傳遞消息之《商報》，不涉黨派政治意味，甚獲社會好評。」但大量史實證明，港商並非不關心政治，他們對國內重大事件自有其明確的立場和態度。

十五、熱心鄉梓建設，造福一方

在香港華僑的心目中，國與家（鄉）是牢不可破的同一概念。《香港紀略》寫道：「愛國觀念，以愛鄉爲基礎，擴而充之，以成社會而立人群。」愛國愛鄉，就是華商所講的最大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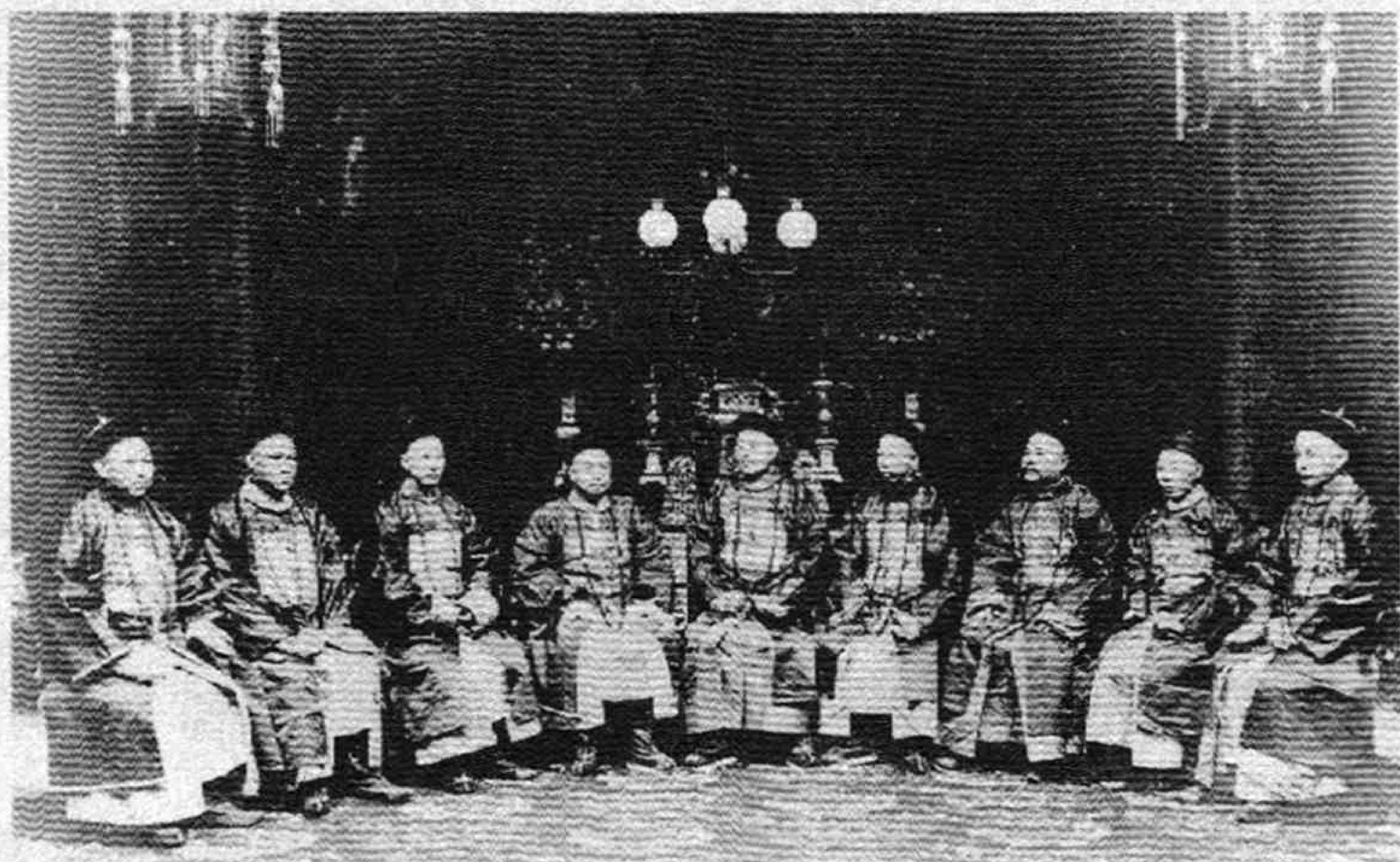
回鄉集資發展實業

十九世紀末，紮根於香港的華商已獲得初步的發展，在當時的報紙廣告中，經常可見「本港」工商企業的廣告。內地與香港華商血脈相連，港商在外艱苦奮斗，創業致富後總是忘不了回報祖國和鄉梓。

香港華商對鄉里實業建設具有相當的投資熱情。如一八八九年，李昇與大買辦唐景星、徐潤合資三萬銀兩，開設廣州城南地基公司、購置土地，建築碼頭和堆棧等設施，清政府招商集股成立輪船招商局，得到港商的響應，據外國人記載：「在香港的中國人所經營的進出口貿易業，對於中國招商局的發展，是具有重大作用的。香港的中國商人在中國招商局中持有大量股份。」

進入二十世紀後，港商回鄉投資實業的規模更爲擴大。

如一九一〇年，旅港新會商務公所及四邑商工總局，共同發起創設一公司，向全港華商集資招股，目的是將新會縣岡州開闢爲商埠。港人認股十分踴躍，據公司董事局公布，香港值理達一百六十五名，至少已集資三十萬元，遠遠超過該公司初擬的集資額。美國華僑陳宜禧創辦的廣東新寧鐵路公司，爲籌款築路，曾在香港招股，得到港商的熱烈支持。據該公司一九一五年宣布，從外埠招股近十萬元，大多是取自香港。抗戰前夕，瓊崖地方人士熱衷「建設新瓊崖運動」，發起組織瓊崖實業考察團，並聯合粵港滬三地實業、金融界鉅子和各種專門人才踴躍參加。該團辦事處設在香港華商總會內，團員初定三十人，港商佔三分之一。



二十世紀初保良局總理。（明報資料室）

有些港商在內地的投資面很廣。如何華生爲香港及南洋巨賈，以所創香港瑞昌商號綢緞匹頭店爲基礎，繼而開設廣州老威普威藥房；南寧、梧州、桂林、柳州、韶關五洲藥房；潮安、汕頭、夏門、上海會豐商店；江門、佛山中法藥房等。於是，「國內之通商大埠，皆有何君之商業」。陳蘭芳是著名的「爆竹大王」，在香港旺角擁有大企業廣萬隆公司，獨家設廠製造。一九二六年，爲開拓業務，他在澳門、佛山、廣州、東莞等地投資增設支廠支店，僱工數萬人，成爲港中有數之殷商。馮民德從二〇年代以降，大力投資內地實業，特別是在上海的金融機構、商行、公司企業等，擁有相當多的股票。

華商社團熱情捐輸

近代中國貧窮落後，多災多難，香港華商社團積極組織損輸款項，奉獻於鄉里的福利，慈善事業，成爲一貫的優良傳統。在香港僑團傳略和華資企業調查中，都大量地記載着此類義舉。

早在一八七七至一八七八年間，我國北部洪水爲患。香港東華醫院率上海及浙江慈善機構捐銀五十萬兩，賑濟災黎。清光緒皇帝曾欽賜「神威普佑」匾額予東華醫院，以彰盛德。這塊御匾一直被該院珍藏，直至一九八三年，特聘專家精工重修，箔錢眞金，並懸於文武廟，「以祈神威降祥，

普佑衆生」。

民國時期，香港華人社團組織更爲完善，在捐贈款項回鄉行善方面所起的作用愈加顯明。如香港華商總會對於社會事業，如慈善、教育等項，尤多協助提倡；華商俱樂部「以發展商業及辦理社會慈善事業爲鵠的」，其所辦理之會務，「凡屬有益社會事業，……無不襄助」；一九二二年潮汕颶災，剛成立不久的旅港潮州八邑商會一面派代表駐汕施賑，一面分函海外籲請募捐，竟得六十萬巨款，解決了大問題。該會並分設汕頭義務學校，以培育旅港潮人青年子弟；香港集木行商會對於慈善事業，「亦頗爲熱心捐助，愛國救鄉之舉，尤爲悉力捐輸慨助。」

南粵靠山面海，兩量充沛，河流縱橫，往昔常遇洪澇之苦，每需香港華人社團熱情相助。如一九一五年「乙卯大水」，珠江三角洲各縣受災空前慘重，全體港人行動起來，展開全面賑災。東華醫院開展沿門勸捐行動，僅在三個月內，即籌款近五十七萬元。其他華人團體亦爭相響應，包括九江商會、旅港順德商務局、旅港番禺公所、三水商工務局等邑團組織，各街坊救災會和各華人行業商會也十分活躍。

一九三一年，廣東三江潦水爲患，災情浩大，牽動港商之心。香港電器商會主席陳頌薇暨司理陳磐石發起募集款項，匯賑災黎。其他如普益商會等，「籌賑不遺餘力」。同年夏秋，長江及華北一帶，洪潦泛濫，災遍七省，爲禍慘

烈。普益商會乃組徵求隊，籲請各界及行友捐助，奔走兼旬，集賑款二萬餘元，匯交華洋義賑會分賑之。

一九四九年夏，西、北江洪水，粵中二十餘縣受災，崩缺堤圍一百五十多處，淹地四百七十萬畝，二百多萬人流離失所。七月十六日，香港東華三院聯合賑災辦事處在廣州成立，着手調查災情和賑濟工作。

充分發揮個人作用

據各方面史料記載，港商個人投資家鄉工商業和社會公益慈善事業，濟賑救災等方面的業績，也是舉不勝舉，衆口皆碑。

例如：何東爲港商巨富，除創辦衆多實業外，並兼任香港東華醫院主席、太平紳士及保良局紳。他樂善好施，無論「粵東洪波爲虐，華北告旱魃告災，均以義粟仁漿，撥助救濟，存活至衆」，周壽臣生於香港，曾任天津招商局、京奉鐵路局總辦，辛亥後返港經商，並從事許多社會工作，深孚衆望。抗戰時，又擔任救國公債會白港分會主任；何甘棠富甲一方，歷任東華醫院主席、潔淨局員，太平紳士及保良局紳等職。曾在省港等地多次賑災治疫。一九〇八年，廣東水患極爲嚴重，他飢溺爲懷，慨捐五萬元。並在香港提倡賣物賑災，是爲「賣物籌款第一人」。他與馮華川等戮力同心，籌募賑款共四十萬元。一九一〇年，廣東潦水又復爲災，他

再捐五萬元，並向港府和社會奔走呼號，爲難民請命益力。他還倡築堤堪，建立水閘，極有遠見；李右泉（曾任東華醫院總理、香港華商總會主席）在民國時期，曾因督賑粵省三江水災，倡賑華北旱災，而迭蒙中國政府三等嘉禾勳章、二等嘉禾章之賜，劉鑄伯曾歷任香港華商總會董事長，香港寶安商會會長，香港慈善會會長等職。一九一六年，他在家鄉寶安縣平湖墟獨資創辦「紀劬勞學校」和「念婦賢醫院」，中國政府大總統黎元洪，廣東省長朱慶瀾分別贈予「急公好義」、「樂善好施」匾額，並頒令表彰。



何東爵士。（明報資料室）

又如，大新公司的創始人蔡興「身寄異邦，心愛家國，樂於應徵，從無謙遜」。他年費巨貲，設禮和男女學校於中山故里，嘉惠兒童。又捐款逾萬，創辦岐光醫院，造福尋梓；郭泉是永安企業集團創始人之一，爲我國近代屈指可數的大企業家。他對於中山故里所作貢獻巨大，參與覩辦岐光醫院，充任中山僑立醫院董事。又倡設中山僑商會所義學、

世光學校、良都竹秀園學校，皆任校董職。並資助中山女子師範學校、歐亮學校、充中山翠亨鄉總理紀念學校董事兼司庫等，可謂不辭勞苦，盡心盡力；陳鑒坡「生平見義勇爲，歷來因慈善及教育事業輸出之款，不可勝計」，一九一六年和一九一八年，分別榮獲中國政府頒予三等、二等嘉禾獎章；陳符祥對於革命黨人和各項公益慈善事業，均不吝捐輸，「歷年匯計，當逾萬金，用是名滿國中」；唐拾義事業有成，「對於一切慈善事業，尤樂贊助」。他鑒於國人孱弱多病，萎靡不振，於是創辦改良會、戒烟會、紅十字會、廣州方便醫院、兩粵醫學校、光華醫科學院、上海粵商醫院、啞童學校、藥學補習學校、新藥業公會等，「以改良社會，及提倡衛生爲己任」。他還投入巨資在家鄉三水縣白坭坳鄉興辦學校、修橋築路及捐資濟貧，「故邑人均感大德，口碑載道」；林子豐以經營四維公司等企業而聞名，曾任旅港潮州八邑商會副會長。他對家鄉揭陽故里「倡浚新河道，以利水田；議築新校舍，以興學務」，極爲熱心擘劃；馮平山爲香港著名殷商兼慈善家，他在香港和原籍新會風州曾捐贈百



陳鑑波先生。（明報資料室）

萬元巨資興辦慈善福利文教事業，備受社會各界推崇，先後被公舉爲廣州方便醫院及善堂紳董、香港東華醫院首總理及永遠顧問、新會商會顧問等職，英國政府曾給其頒贈太平紳士榮銜；陳瑞祺家族有愛國愛鄉傳統，他經常捐巨款給新會家鄉和易受黃河水患的魯豫等省救災。從一九二九年起，按月寄錢、糧、衣物等資助鄉里數百生活困難戶，長達廿年。爲紀念其勳績，人們將陳瑞祺原籍新會陳冲鄉更名爲瑞祺鄉。

本書多次提及的李煜堂是一位影響廣泛的人物，他「儉而好施」，對嶺南、執信、青年會各學校，廣州公醫院、上海廣肇醫院、南京兩廣迎賓館、哈爾濱廣東會館、台山男女青年會、北平台山會館等，常予資助提攜。他還在國內機關團體充任要職，除廣東省財政司長外，曾爲大元師府參議、總統府參議、廣東實業團董事、中央財政委員會委員、困難會議議員等。一九三六年其逝世後，中國政府特頒獎詞，讚其「振興實業，贊助革命，輸財濟餉，籌策匡時，綜厥平生，殊堪嘉尙、特題給獎詞，以昭激勸。」

此外，港商還敢於爲鄉民伸張正義，消彌禍患。如一九一九年，潮州駐軍任意勒捐，益形暴斂。潮安人士，救助於旅港同鄉者。方養秋發抒議論，爲鄉人贊同、公推晉省。他向粵當局訴以駐軍不能各自抽捐之理由，侃侃而陳，最終使得省長莫榮新不得不電令駐潮軍隊制止；柯應李是香港汕頭

花邊公司創始人，曾受孫中山大元帥委充潮梅善後委員會委員。一九二二年八月，汕頭抽紗同業公會因交涉免稅事，請他爲代表赴北京稅務處請願。結果取得成功，「同業受益非淺」。

十六、「扶危解困，壺中春煦」

這幾個字是梁啓超爲香港著名醫館藥號提寫的，用以表彰其施醫贈藥普濟衆生的德積。醫藥與人類的日常生活、身體健康密切相關，尤其是在社會經濟尚不發達、人們常爲各種疾病所困擾的時代，則更是如此。香港是近代中國藥材內銷及外運的集中地，而號稱「廣藥」的嶺南（以粵港聯號藥行爲代表）膏丹丸散，在我國醫藥寶典以及海外華僑醫藥界中，均佔有極重要的地位。



中藥材舖。（明報資料室）

香港成藥商行大都與廣東同業結成聯號，其發源地主要集中於佛山和廣州兩地。如黃祥華太和堂、黃愼昌、黃世昌、李衆勝堂、芝蘭軒、源吉林、庶和堂、黃仁廣、遷善堂、梁謙益堂、利群軒等，其祖舖和總行都在佛山，清末民初業務發展逐漸轉向省港一帶。而廣州更是藥行濟濟，如陳李濟、馬百良、王老吉、兩儀軒、天喜堂、保滋堂、梁財信、橘香齋、位之堂、廣芝館，林來安堂、奇和堂、天相堂、天佐堂、陳六奇、必得勝、百昌堂、劉詒齋、靈芝藥房、歐家全、朱長春堂、唐拾義父子大藥房、梁培基、榮孫氏……，等等，不勝枚舉。從整體上講，粵港成藥聯號產生於清末，興旺於民國前期。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香港製藥界中之蠟丸營業極盛，以陳李濟港行首屈一指。凡名字號之工場，原多在廣東，此時因國內不靖，故紛紛移往香港。

港粵華商成藥聯號是手工作坊與機械工廠並存的。一般的規律是，傳統中成藥多以手工製作，西成藥則多使用機器生產；粵省方面多爲家庭手工作坊，香港的行號則大都是具有一定規模的近代企業。如唐拾義藥局港行創辦後不久，即採用新式製藥丸機器，產量隨之激增，擴大營業範圍，並翻新廠房，僱用工人一二百名，陳李濟香港製藥廠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其佔地五千平方呎，有數十部機器，價值約五十多萬元，抗戰前每年的營業額可達約三十餘萬元。

不少字號歷史非常悠久，如陳李濟、保滋堂、何明性堂

等源起於明末清初，已經歷了幾百年的滄桑變化。百年老號也不鮮見，它們絕大部分都是以創辦者（或堂主人）的個人名稱或別名作號，因而廣為社會熟悉，也深得仍保留生病即看中醫吃中藥習慣的海外華僑的信任和喜愛。

在經營過程中，華商藥行非常講究質量，注重信譽，各創本牌產品，力求精益求精。各行號根據「祖傳秘方」、「民間配方」，結合歷任主持者的實際經驗，大量發展招牌產品。一般企業均能製銷多種藥物，馬百良、保滋堂等所出品更多達上百種類。藥物產品名牌輩出，如陳李濟追風蘇合丸、李衆勝保濟丸、梁財信紅花跌打丸、天喜堂老牌調經丸、馬百良百勝珍珠散、遷善堂琥珀八寶鹽蛇散、保滋堂珠珀保嬰丹、橘花仙館紫血丹、奇和堂茄楠氣痛散、源吉林萬應甘和茶、楊松竹林百草藥油、靈芝藥房十靈丹、位元堂養陰丸、太和堂黃祥華萬應如意油、潘人和婦科毛鷄藥酒、唐拾義久咳丸、梁培基發冷丸、宏興藥房鷓鴣菜、二天堂血中寶、保心安油膏……，等等。其品種之多，藥效之好，傳布之廣，在國內成藥界實為少見。

要創名藥，選料必須上乘。如兩儀軒三蛇藥酒以上藥瓦裝舊酒浸出，歷時半年，楊松竹林百草藥油「採選百草，配以上品藥科分析其原質，提取其精源，按陰陽配合之法製成」；集蘭堂自辦四川打箭爐麝香創製正三蛇膽藥品秘製熊麝珠珀膏，揀選參茸玉桂正地道藥材精製各項膏丹丸散；位

元堂養陰丸的原料來自粵桂川滇魯豫晉甘等八省。

各藥商製藥務求精工、如李衆勝堂保濟丸的製作工藝十分嚴格，爲保證丸粒不霉變，陰雨天從不製丸。爲減少藥物中芳香物質的揮發，所有原材料揀洗後必須經陽光照射，自然乾燥；陳李濟藥行奉行「工藝雖繁必不減其工，品味雖多必不減其物之宗旨」，製成多種古方正藥。該廠保存了一塊超逾百年的木質楹聯，上面刻載道：「火兼文武調元手，藥辨君臣濟世心」，足見其傳統製作之獨特，質效要求之嚴格。

除了按「祖傳秘方」或「遵古炮製」外，各藥亦注重推行新法。如華陀中藥房特聘醫生專家，用科學方法將當歸裏所含補血成份提出，另配以黃芪川芎等藥製煉成芎歸精，「功效尤速」，公正藥行止痛專藥自然散乃以最新科學方法製成，不含麻醉劑，服後僅幾分鐘即立止疼痛，保心安藥廠的「保心安油」，係經廣東醫院及英國皇家化學師考驗獎給優等文憑稟准注冊。

正是由於各牌各藥配製得宜，製作精細，才能做到「對症施用，效如桴鼓」，風行中外數十年乃至上百年而經久不衰。

港粵及南洋一帶氣候濕熱，蚊蟲繁衍，瘴氣彌漫，易生疾病。每逢氣候驟轉，疾疫盛行時，香港各藥行都及時廣告宣傳，提醒人們注意防病，購藥預備應急。此中固然有賺錢

促銷的商業動機，但確也有利於減少疾病的發生和民衆的痛苦。上百家藥商創製的各類藥品多達成千種，並且不斷改良，其藥效高，攜帶便，成爲人們家居旅行不可不備之物。

爲了便利人們購買和服用，一般藥物都分開大、小包裝，分別計價。在藥丸藥酒形式上，根據實際情況，也不斷地有所改進。如辛毓賢堂婦科萬應丸向來俱製大丸，未免難於進食，後遂特製小丸，以便婦女吞服。亦無苦味，適應了婦女心理；潘人和號始創馳名毛雞藥酒，但酒樽較重且易碎，於是特製毛雞丸，俾遠方各界旅居海外者易於攜帶；唐拾義在三十年代初，改良其名藥防癆久咳丸，使之見效特速，「口含溶化，漸漸嚥下，藥僅到喉，痰消咳止」等。這些改進都大大滿足了消費者的需要，並適應了變幻莫測的激烈市場競爭。

華資藥行還進行派送或贈飲，如楊松竹林藥號派員分赴內地適中地點，省港輪船及回鄉輪渡，進行派送後，每日銷數，較前驟增十倍以上；源吉林甘和茶常用的手法是深入農村推行贈飲，擴大了影響，故能在業務方面蒸蒸日上，唐拾義藥廠的產品主要銷往農村，其所聯繫的字號，遍及窮鄉僻壤，多至數以萬計。

香港成藥商的經銷範圍遠遠超出了南中國，經過幾十年的不斷開拓，其大部分都在國內外廣泛地建立了分支機構及代售處。如陳李濟產品在十九世紀隨着出國謀生華人，被引

銷至南洋一帶。據稱，「國外凡有華僑之埠，無不有陳李濟字號之臘丸售賣」。清末，天喜堂的代售網已推及新加坡、庇能、吉隆坡、大小霹靂、澳門等埠；岐生園的代售處遍設於西貢、堤岸、石叻、舊金山、小呂宋、檀香山、澳門及國內各埠。

由於廣東大部分藥行尚未直接在國外建立分支行號，故主要是通過設在香港的聯號或代理商（比較著名的有梁國英報酒藥局、瑞昌西藥行、新世界大藥行及先施、永安、大新等大百貨公司的藥品部等）來推行海外業務。因此，香港在中外成藥貿易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抗戰前，新加坡約有二百家中藥店，大都在香港設有分行，也有由香港辦莊負責進貨的，少部分從河內、廣州灣輸入，可見其貨源主要是來自香港。

醫館藥號治病消災，提高了社會的衛生狀況和民衆的健康水平，同時也增進了自身的經營。如近代廣東人赴南洋謀生者日衆，順帶「王老吉」涼藥備用。此某主治四時感冒，消毒解暑，生津止渴，去濕消滯，功效顯著，凡飲過者交口稱讚，因而先後傳入東南亞各國乃至美洲，銷途大開；源吉林號大力推銷和贈飲「甘和茶」，因其能疏解清熱，對遏制病疫起較大作用，故很多地方贈送牌匾作爲鳴謝，前後收到數十塊。又因此某對生活在南方和亞熱帶地區的人們頗有裨益，故在南洋群島華僑中，更將之作爲日常的防病飲料；患



廣州利來藥行外貌。（明報資料室）

腳氣病者，以南洋人們居多，僑胞患此而致命者，吃此皆是。辛毓賢堂以家傳秘方所製「腳氣症散」，對患者確有證驗，傳開以後，通函定購者還紛至沓來。

每逢災難降至，醫館藥號機危解困，也贏得了社會的讚譽。如一九一五年春，粵西海康，郁南等地疫症橫行，死亡枕籍。李衆勝堂慨然捐藥十餘箱，拯救了無數生靈，因而得到省港澳救災公所的登報鳴謝。同年，恆春堂捐藥賑濟水災，得喜堂社會公共賞識，蒙廣州總商會呈部注冊給照，並廣東勸業道暨南海縣出示保護，粵巡撫還頒予其四等獎章。一九一六年夏，廣東戰事發生，更值天氣炎熱，地窄人稠，酷暑燻蒸，病疫盛行，李衆勝堂將所售丸油茶等減贈一個月，以賑患者。這年十月，澳門發生霍亂嘔痾多賴朱中興堂供應救時普濟水，據戴：「所救活者，尤爲不少」。一九三二年夏，廣東流行霍亂症，協和藥行推出專治新藥「神仙水」，有效地抑制了疫癘的蔓延。一九三五年，宏興藥房爲

贊助兒童年，懸賞徵求兒童健康照片參與競賽，海內外同胞踴躍應徵，參賽嬰孩總計達十萬餘人（均曾食用過該藥房獨家出品的兒童專藥鷓鴣菜），評選結果有三百一十名分獲各獎，在港穗滬各報大幅登載，轟動一時。

近代以來，鴉片嚴重地危害國人精神和健康，港粵即有相當一批藥號特製戒烟藥。如甘白齋梁天保自清末創製檜松戒烟餅，在省港澳廣設分行號及代售點，歷幾十年之久。愼德堂何熙明曾製銷過「槍上戒烟丸」。其他如何明性堂、鄔福至堂等，也都製銷戒烟丸。

往昔社會性病泛濫，故藥商亦大量生產白濁花柳各症藥丸，以供市面亟需。如黃愼堂的白濁丸、扶元搜毒藥膠；天壽堂的花柳搜毒丸散；七寶齋的百珍花柳搜毒丸；庶和堂的淋濁止痛丸；朱長春堂的花柳搜毒丸等。梁培基製銷培元搜毒汁，號稱「花柳大王」。黃仁庵號創出性病藥丸六種，而益安堂花柳傳染各種解毒藥更多達三十種。

華人醫館藥號得到內地官府及社會名流的褒揚或提攜，大大地提高了企業「合法性」的權威。如保滋堂曾得清兩廣總督贈題「養和樹德」之牌匾，馬伯良也接受過官紳所贈刻有「金液銀丸」、「仁人利善」等讚辭的十一塊牌匾；唐拾義曾醫癒「南天王」陳濟棠女兒的疾病，得到陳所贈匾額懸掛於廠內，故能鎭住一般官僚政客；香港名醫張雲飛很得朝野名人推崇，如江朝宗爲其親題「青囊壽世」，岑春萓題

「九宇春回」，梁啓超題「壺中春煦」，葉恭綽題「丹爐春融」，溫宗堯題「藥到回春」，伍朝樞、林虎、章士釗等十九位名人聯題「五液神漿」。其他如莫榮新、魏邦平、程璧光、張錦芳等也都揮毫題詞助興，極大地提高了該醫館藥號的聲譽和權威。

十七、國際華人經濟圈的紐帶

五口通商後，香港逐漸成爲遠東地區新興的商業中心之一和中國對外貿易的重要轉運站，也是聯繫海外華僑和中國大陸的橋樑。內地人口外移、多經由香港出洋。許多企業主赴港設立分支機構，向海外拓展業務；而海外華僑華人資本也需要加強與國內市場的聯絡，以謀求得到更多更大成功的機會，實現「實業救國」的夙願。香港華商資本就是這種內外聯繫和交流產物，也是在此過程程中成長與壯大。它既溝通了國內和海外的華人市場，又融和了海內外華人資本的力量，在近代我國民族經濟史上佔有獨特的地位。

港商成分的國際化和多元化

在近代百年的發展過程中，香港華商實力不斷壯大，其成份來源愈趨複雜化，匯聚了國內外華人資本家的各路精英，其中又以粵商、滬商、僑商三大板塊作爲骨幹。

由放濃厚的地緣性和親緣性，在港商的籍貫裏，粵籍者始終是居於主流。特別是在早期，香港的華資企業幾乎全部都由廣東商人投資，從中也反映了時代的特徵。十九世紀以來，得近代開風氣之先的廣東湧現出大批從商的傑出人物，

他們經過數十年卓有成效的經營，積累了雄厚的資本和豐的經驗，加以對香港所佔天時地利人和的特別有利條件，使得他們首先取得了成功，並能將這種優勢長期保持下去。筆者所掌握的大量華資企業資料，證明了其絕大部分都和廣東及粵商有很深的淵源。吳醒廉於一九三七年出版的《香港華人名人史略》一書中，只要稍作留意或統計，就可以發現這些名人有百分之九十都是廣東移民或祖籍是在廣東。在民國時期內對香港華資企業的幾次全面調查中，可以看到淘氏大同罐頭公司經理黃篤修、大華鐵工廠總經理徐季良、香港新亞製藥廠總經理許冠群、香港天廚味精廠業主吳蘊初、三星織業廠創辦人沈吉春等屬外省籍人士，但和粵籍廠商相比，其人數確實相當地少。即使是在抗戰時遷港的上海企業中，也有不少是交由粵籍人員經營，如天寶味粉廠、粵昌和粵興照相卡紙公司等，均是如此。

港商成分中以粵籍者居多，這是一個特點。從投資單調和人才配置來看，則會產生一定的局限性。但這種現象，隨着時代的前進、香港城市的近代化和國際化而得到顯著的改變。

滬商勢力到港是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剛開始時主要限於醫藥、保險、銀行及一些貿易商號，經過抗戰初期和戰後的兩次遷港大潮，使港商中的滬籍成分大為增長。上海和香港都是五口通商後崛起的城市，各扼長江口和珠江口，

成爲中西交匯。華洋雜處之地。經過數十年的發展，一個成爲近代中國最大的工商業中心，一個成爲華南金融貿易的樞紐、聯繫海外華僑與祖國大陸的橋樑。這兩地的華商一直保持着密切的經濟聯繫，由於相互溝通發展的需要，產生了一批有相當影響的聯號企業。

港滬華資聯號企業數量僅次於粵港方面，涉及工商、金融保險、航運、百貨商業、埠際貿易、印刷出版、酒店服務等衆多行業，並呈雙向互動關係，聯繫面極其廣泛。從大量史料分析來看，聯號發展初期，以華南向華東伸展爲多，這是因爲歷史與地理的因素，使港粵成爲近代中國開風氣之先的地方。十九世紀中葉以後，隨着外國資本勢力向北擴張和上海經濟地位的迅速上升，原在粵港地區活動的大批買辦和華商亦赴滬發展，使港粵滬三地的社會經濟聯繫日益緊密。應值得注意的是，在香港和上海的經濟交往中起「穿針引線」作用的華商中，也有不少是粵人。如上海聯保水火險公司、上海金星水火保險公司、上海唐拾義製藥廠、上海宏興藥房等的創始人，都是廣東人或粵籍港人。進入民國後，滬商往香港的發展也顯著地增多。

港滬華商在長期的合作發展過程中，突出了其特色，在近代中國社會經濟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當時民族資本中的具有全國影響的大型企業，幾乎都與上海、香港這兩個城市有關。如輪船招商局、南洋烟草公司、永安、先施、大

新百貨公司、廣生行化妝品公司、中國銀行、上海商業銀行、廣東銀行、永安銀行、永安紡織印染公司、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等，港滬對於它們都具有最深的淵源。

滬港華資聯號企業是連接江浙和華南民族資本，溝通海外僑胞和祖國經濟聯繫的紐帶。以上海為中心的「江浙財團」構成了民族資本最強大的陣容，以港粵為中心的「華南財團」則以外向型發展而非常突出。由此可以說，早期粵港華商是不可分割的，而港滬華資聯號企業實際上是把地處江浙和華南的民族資本緊密地結合起來。

清朝末年，華僑回國投資形成第一個高潮，早期流往海外的華人，部分也攜帶資產，回港定居。他們更具經濟發展條件，充分利用香港所具有的特殊的地理、交通位置和優越的港口、商貿環境，大展拳腳。如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創辦人簡氏兄弟是粵籍旅日華僑，為五山糖果餅乾公司創辦人是粵籍南洋華僑；先施、永安、大新三大百貨公司創辦人馬應彪、郭樂、郭泉、蔡昌、蔡興等，均是中山籍旅澳華僑，中南銀行創辦人兼董事長黃奕杜是閩籍南洋華僑；廣東銀行發起者陸蓬山是粵籍旅美華僑；香港東亞、工商、華商、國民商業等銀行均為著名的僑資金融機構；二天堂藥行是由越南華僑投資創辦；永安堂創辦人胡文虎，胡文豹兄弟是閩籍南洋華僑；新亞、大東等酒店主要也是由僑資創辦。

民國初期，海外華僑又掀起回國投資熱。如在美洲經商

多年的陳孔英、周湛光、黃仰堯、羅厚甫分別創辦了香港榮興織造廠、九江電機織布廠、星洲織造廠、國光電機布廠；南洋華僑岑崇輝、吳兆騰分別創辦了藝生織造有限公司、光明電機織造廠；澳洲歸僑鄺吉堂創辦了中光電機布廠；美洲歸僑甄秉均創辦了國民製煉油漆有限公司；美國華僑林坤在紐約募集僑資二十萬元創辦香港中華製漆有限公司，等等。香港華資工業由此而得以迅速發展。

香港是華僑商人投資經營的理想場所，他們因在香港擁有宏業或長期經營，成爲港商中之佼佼者。華僑與港商確有不解之緣，由於近代香港是英國的領地，在概念上也屬「海外」的範疇，而華僑商人祖籍多隸屬粵閩，並常經由香港北上投資，故內地人們習慣上將其同港商視爲一體。但實際上兩者在嚴格的理論意義上仍有區別，只有在香港投資經營後，華僑才具有或兼有了港商的身分。如前所舉，在近代史上，華僑資本的大量投入，更加壯大了香港華商隊伍的陣容。

香港華資企業和華人資本家是在中國大陸和海外華僑之間架起了一座經濟橋樑，民族資本的這三個部分相互協作與融合，各屬其長，在諸多領域開了風氣之先，建成了一大批工商實業，推動了我國近代化的進程。同時，擴大了華人資本在國際上的影響，香港華人資本也成長爲本埠經濟之主幹。

海內外華人資本的聯繫紐帶

作爲英屬佔領地的香港所具備的客觀條件，使之必然充當了我國近代民族資本進出海內外尋求發展機遇的基地和紐帶。

首先，國內的企業要走向世界，特別是要開闢海外廣闊的華僑市場（民國時期，每年僅供海外華僑消費而出口的廣貨價值即達約一億元），首先會尋求在香港這個遠東新興的國際貿易樞紐建立一個立足點，以此爲依托，進一步邁向海外。如上海新亞製藥廠創立香港公司，目的就是將之作爲向南洋發展的跳板。唐拾義創設香港分行號時，主要考慮的是以此爲基地，向南洋推銷製品並輸入國外原材料。汕頭李成興魚露涼果罐廠設立港廠，就是因爲更有利於僑胞採購。在許多內地企業家眼中，香港交通便利，貨物來往自由，非常適合作爲一個開闢海外市場的橋頭堡。

其次，華僑商人爲了實現其「實業救國」之夙願和在中國發達之抱負，一般也是先到與他們素有地利人合因素的香港落腳，奠定基礎，然後再圖北上。對於雄心勃勃的商人來說，大陸市場具有極大的誘惑力。事實證明，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先施、永安、大新公司等，選擇了一條最佳的創業道路。在香港興起並具有一定經驗和實力後，銳意進取，由南到北，插足全國經濟中心的上海，由此而達到了其事業巔

峰。

最後，香港華商在海內外華人經濟交融中所起的作用也是非常突出的。如前所述，香港華商的起源和壯大本身就是近代海內外華人經濟大合作與大交流的結晶，國內商民和海外僑商從南北方向不斷湧入香港，與在港紮根經營的華商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支十分具有實力的資本家隊伍。其所經營的行業涉及轉口貿易、金融保險、百貨商店、交通運輸、房地產業、工礦企業及飲食酒店服務業等，成就斐然。

香港是一個與華僑關係接觸頻繁的海港城市，隨着出國華僑的集中香港，首先是各式各樣的與之相關的服務機構大量創立，如南洋莊、金山莊、僑批局（廣東華僑衆多，經營僑匯大有利可圖。沿海一帶華僑在外較多的地方，遂發展成爲僑批局。香港是華南地區的匯兌中心，廣東僑匯大都透過香港銀號進行。香港又是廣州寄往國內各省和國外地區的匯票票據交換中心，故粵省內僑批業，亦以香港作爲中心）、供華僑暫時寄宿和搭伙的小客棧，爲華僑和歸僑置備各種小百貨商品的店舖等，都應運而生。

近代中國內地的土特產和南洋貨品、海外華僑華人市場的需求等，大都是經由香港華人行商來進行轉口貿易。此外，當華資工業興起後，港製產品又成爲面向海內外市場的重要國貨供應源之一。如香港華資織造品早先以汕頭、廈門爲主銷場，三十年代中國政府實行關稅重徵後，多轉銷往南

洋、美洲及非洲等地；中成藥主要供應南洋群島和美洲華僑華人消費；港製國貨捲烟深受海外華僑歡迎；電筒電池主銷南洋和英國，糖果餅乾罐頭銷往內地閩粵、港澳、東南亞、印度及歐美各埠；炮竹蚊香廣銷於美洲、南洋、印度及澳洲等地；其他如化妝品、皮革製品、機器機械、膠鞋、糖薑涼果、帽子、玻璃製品、漆製品等類，都暢銷於海內外市場，爲華人消費者提供了多種多樣的選擇和價廉物美的享受。

在抗戰初期的特定歷史條件下，我國民族資本精華慘遭摧殘，香港遂成爲國內實業重要的托庇處之一和新興的工業品供應基地。如戰爭爆發後，數以百計的企業從滬穗等地遷移香港，其規模宏大，涉及面寬廣。在此推動下，香港華資企業「蓬勃情形，更較前發達」。中國政府經濟部頒布戰時國貨條例，港產銷場突暢，各廠家均加開夜工趕製，就利甚豐。尤以生產適應國內戰時亟需品的五金機器業各廠，製造各式工作母機、兵工器材、礦山用具、防毒面具、鋼盔、水壺飯盒口杯等，貨品極爲搶手。其他如膠鞋、藥品、電池電筒、電器製造等業，生產形勢極爲暢旺，產品大量供給國內市場。

從歷史與現實的角度來看，香港都是中國對外的重要門戶。在廣泛地聯絡中國與海外僑胞方面，港商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由於香港華商的孜孜努力，增強了華僑對於中國和民族的向心力、親和力及融合力，從而形成了一股強大的

凝聚力。香港華商本身就是近代國際華人圈內外交流過程的結晶，正因爲如此，她才顯示出頑強的生命力。

附錄：

參考書目舉要

①報刊雜誌

一八九五至一九三九年《香港華字日報》。

一九三四至一九四一年《香港工商日報》。

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年《星島日報》。

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一年《大公報》。

《香港華商總會月刊》第一、二卷（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七年）。

②圖書

《百年商業》，香港光明文化事業公司一九四一年版。

吳醒濂：《香港華人名人史略》，香港五洲書局一九三七年版。

姚啟勳：《香港金融》，一九四〇年出版。

《香港華資工廠調查錄》，香港工商日報社，一九三四年版。

《香港工廠調查》，香港南僑新聞企業公司，一九四七年版。

《香港商業年鑒（一九五一年）》，香港華商總會編。

《香港華僑工商業年鑒》，香港一九三九年版。

《香港商業錄》，香港美藝印刷所，一九四八年版。

《香港商業年鑑》，香港新聞社，一九四九年版。

王韜：

《弢園文錄外編》，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版。

《先施公司二十五週年紀念册（一九〇〇——一九二四年）》。

《香港九龍商業分類行名錄》，香港一九三九年版。

余繩武、劉存寬主編：《十九世紀的香港》，中華書局，一九九四年版。

余繩武、劉蜀永主編：《二十世紀的香港》，香港、北京，一九九五年版。

李宏：《香港大事記》，人民日報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霍啟昌：《香港與近代中國》，商務印書館（香港），一九九二年版。

鄧開頌、陸曉敏主編：《粵港澳近代關係史》，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

金應熙編：《香港史話》，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劉澤生：《香港古今》，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陳謙：《香港舊事見聞錄》，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潮商俊彥·廣東文史資料第七十六輯》，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

高添強編著：《圖片香港今昔》，三聯書店（香港），一九九四年版。

《香港一瞥·廣東文史資料第四十四輯》，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陳鏸勳：《香港雜記》，暨南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

賴連三：《香港紀略》，暨南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

鍾紫主編：《香港報業春秋》，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廣東省檔案館編：《省港大罷工史料》，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

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科學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

聶寶璋編：《中國近代航運史資料》第一輯，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姚賢鎬編：《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版。

後記

筆者近年來兼作香港經濟史的研究，累計已發表了論文和文章二十餘篇，並在大學開設了《香港華商史》專修課程。現根據講稿簡編成書，注意將學術性與知識性相結合，以奉獻給對早期香港華商發展史關心和有興趣的讀者。因本書不採用注釋法，故在書後附錄中列出《參考書目舉要》，以備檢索。

本書基本採用往昔的圖書、報紙、期刊、歷史檔案、回憶錄等材料寫成，同時，也參考和吸收了近年內地和香港同行的研究成果，將在此說明並向有關專家、學者致以衷心的感謝。

張曉輝

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於廣州暨南大學歷史系

香港歷史文化小百科系列

總 策 劃：潘耀明

執行策劃：林翠芬、吳國源

香港歷史文化小百科⑩

香港華商史

作　　者：張曉輝

責任編輯：翁曉珊

封面設計：李尤颯

出　　版：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發　　行：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嘉業街 18 號

明報工業中心 A 座 15 樓

電話：2595 3215　傳真：2898 2646

明報網址：http://www.mingpao.com/mpp/

電子郵箱：mpp@mingpao.com

新加坡、馬來西亞總代理

——商務印書館新加坡分館

版　　次：一九九八年九月初版

ISBN　：962－973－166－5

承　　印：亨泰印刷有限公司

金融風暴席捲全球，無形的破壞不遜於有形的天災，如何於世局動盪中自保及互保？理性與經濟方面的分析以外，不妨參照一下前人的經驗。

本書運用大量彌足珍貴的歷史資料及相片，追溯港商的起源、別開生面的各行各業、獨特的營銷模式；探討香港如何由謐靜的漁村發展爲工商業繁興的大都市。當中不乏華商的進取精神與堅忍的毅力。

全書內容翔實，圖文並茂，融知識性與可讀性於一體。







HK10

HK$ 64